

0094813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史

朱宝庆 李南征
王成业 徐旧韶 著

2523/20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史

朱宝庆 李南征

王成业 徐旧韶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长安南路吴家坟)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蒋家寨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43千字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000

ISBN 7—5419—0325—6/B·5

定价：1.50元

自 序

本书为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宝贵遗产，繁荣我国军事理论研究而写。我们采用史论结合、以论为主的方法，力求在叙述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的同时，概括出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过程。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论述了军事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性质和特点；论述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性质和特点，及其与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关系。第二至第六章，分五个时期，叙述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介绍了各个时期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和逻辑关系，指出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经过了系统化、具体化和方法化三个逻辑阶段，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又从理论到实践的过程，从而在军事哲学理论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两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一些军事院校现行的“毛泽东军事思想课”教学，一般都采用专题叙述的方法，其不足之处是缺乏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内在联系的说明，且脱离思想形成的历史条件。这样就容易把具体的观点或结论抽象化，或只见结论、而不能学到毛泽东研究军事理论的方法，极易丢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活的灵魂。本书以讨论毛泽东研究军事的方法为主，寄愿于对上述不足有所弥补。另外，本书重方法论的研究，对于非军事工作者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并从中得到启发，可提供一定的方便。

在本书修改过程中，得到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赵喜民同志的热情指导和帮助，我们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编写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史尚无先例，加之著者水平有限，不妥以至错误在所难免，恳求读者给予指导。我们旨在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好的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史著作的问世。

著 者

1987年10月

目 录

自 序.....	(1)
----------	-----

第一章 绪论.....	(1)
-------------	-----

第一节 军事哲学的性质.....	(1)
------------------	-----

第二节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	(5)
--------------------	-----

第三节 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目的和 方法.....	(8)
--------------------------------	-----

第二章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产生与形成.....	(14)
--------------------------	------

第一节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产生的条件.....	(14)
-------------------------	------

第二节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产生.....	(22)
-----------------------	------

一、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形势和毛泽东的军 事实践活动.....	(22)
-----------------------------------	------

二、关于革命与战争、军事与政治的关系的 思想.....	(25)
--------------------------------	------

三、关于弱小的革命力量如何在强敌面前存 在和发展的思想.....	(28)
-------------------------------------	------

四、游击战术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萌芽.....	(32)
------------------------	------

第三节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指导反“围剿” 战争的实践中全面形成.....	(36)
--	------

一、反“围剿”与长征时期的形势与毛泽东	
---------------------	--

的实践活动·····	(36)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条件论的形成·····	(38)
三、运动战的实践经验与战争运动的辩证法的形成·····	(43)
四、遵义会议的《总结决议》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形成的意义·····	(49)

第三章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理论化和

系统化·····(54)

第一节 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与毛泽东军事

哲学思想的成熟·····(54)

一、革命战争转变时期的形势与毛泽东军事

哲学思想成熟的条件·····(54)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毛

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56)

三、成熟期的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特点·····(57)

第二节 科学、系统的战争观的建立·····(59)

一、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的战争研究

方法·····(59)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本质观·····(60)

三、全面的、综合的战争条件论·····(61)

第三节 以弱胜强的辩证法与战争运动理论的

系统化·····(63)

一、以弱胜强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

核心·····(63)

二、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进攻与防御关

系的辩证法·····	(64)
三、以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为核心的兵力使用 及战果要求的辩证法·····	(65)
四、以运动战为核心的人地得失关系的辩 证法·····	(68)
五、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	(70)
第四节 以解决主客观矛盾为中心的战争指导 方法论的形成·····	(71)
一、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战争指导中的基本 矛盾·····	(71)
二、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的辩证过程·····	(72)
三、战争实践对战争指导能力的决定作用与 战争实践的基本原则·····	(74)
第四章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和具体化·····	(77)
第一节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具体化的条件和 代表著作·····	(77)
一、抗日战争的特点与军事哲学思想具体化 的条件·····	(77)
二、军事哲学著作的繁荣与《论持久战》在 军事哲学思想具体化中的意义·····	(80)
第二节 战争研究方法 with 战争观的具体化·····	(84)
一、战争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与具体化·····	(84)
二、对战争本质二重性的揭示与战争概念的 具体化·····	(86)
三、社会政治条件对战争的决定作用·····	(90)

四、主观能动性在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中的决定作用·····	(95)
第三节 敌后战争的辩证法与战争运动理论的具体化·····	(97)
一、敌后战争思想的根据和理论意义·····	(97)
二、战争后方理论的辩证法·····	(97)
三、作战线理论的辩证法·····	(100)
四、由局部向全局转化的辩证法·····	(101)
五、从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发展的辩证法·····	(104)
第四节 战争指导方法论的丰富与发展·····	(106)
一、主动性与战争指导的根本原则·····	(106)
二、计划性与灵活性是争取和掌握主动权的必要条件·····	(108)
三、造成和利用敌人的心理缺陷是战争指导的重要手段·····	(109)
第五章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方法化的巨大成就·····	(113)
第一节 解放战争的特点与对军事哲学思想发展的客观要求·····	(115)
一、解放战争的特点·····	(115)
二、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发展的客观要求·····	(120)
第二节 无产阶级战争观的丰富和发展·····	(122)
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122)

二、用战争消灭战争的彻底革命思想·····	(125)
第三节 战争运动理论的方法化和系统化·····	(128)
一、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灵活运用和发展···	(128)
二、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方 法化的结晶·····	(131)
三、歼灭战思想的系统化·····	(142)
第四节 战略进攻理论的提出和完成战争运动 全过程的思想·····	(148)
一、关于适时转入战略进攻，促进战争历史 转折的思想·····	(150)
二、关于战略决战，实现战争力量根本转化 的思想·····	(152)
三、关于战略追击，彻底消灭敌人的思想···	(160)
第五节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战略决策 的光辉范例·····	(163)
一、被动中的主动·····	(164)
二、打敌要害，弱处开刀；周密部署，密切 协同·····	(166)
三、全局在胸，统筹兼顾·····	(168)
四、慎重初战，掌握关键·····	(169)
五、能动性在战争中·····	(170)
第六章 建国后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继续发展	(172)
第一节 建国后武装力量的建设及其规律·····	(172)
一、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 作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的客观要求·····	(174)
二、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	(177)
三、加强民兵建设是武装力量建设的重要内容·····	(179)
第二节 抗美援朝战中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	(181)
一、抗美援朝战争的特点及其规律·····	(182)
二、抗美援朝战争中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184)
第三节 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毛泽东的东军事哲学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成功运用和发展·····	(191)
一、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和发展·····	(191)
二、新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着眼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客观实际的科学预见·····	(193)
第四节 实现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195)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想·····	(195)
二、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辩证统一·····	(197)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军事哲学的性质

对于一门正在形成中的交叉性学科来说，对它的性质作出准确无误的规定，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但是，对一个学科的性质置之不顾，就无法对它的内容进行逻辑的或历史的论证。所以，在讨论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对军事哲学的性质问题作一点分析，以表明自己的观点。

从形成过程来看，军事哲学是哲学与军事学相结合的产物。军事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是在现代的军事理论研究中出现的，但它的内容的形成和发展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哲学与军事学的结合，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优良传统，这两个思想部门以理论形态出现的时候，它们就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中国古代军事理论的开山之作《孙子兵法》，就是一部充满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著作，而较孙武子之后的杰出哲学家老子，在他的《道德经》中则把战争作为哲学研究的重要对象，提出了“柔弱胜刚强”的辩证法思想。在近代资产阶级军事家中，拿破仑集中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思想；库图佐夫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由退却转入进攻的思想，都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则标志着把德国古典哲学——唯心主义辩证法运用到军事领域。克劳塞维茨

第一次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中揭示了战争的本质。被列宁称为“一位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总之，凡是从理论上研究军事问题的人，是无法回避哲学问题的。否则，就会失去研究的观点和方法，理论的研究就无法进行。而且，哲学也在与军事问题的结合中丰富与发展，检验其真理性与普遍性。马克思主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观察战争现象，总结历史上的军事思想和战争经验，使科学的哲学思想与正确的军事理论达到了有机的统一。但是，历史上的军事哲学思想是作为一个部分包含在军事思想中的，与具体的战略、战术，以至技术思想混为一体，并没有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现代军事科学，尤其是现代军事技术科学的发展，一方面要求军事科学细致而严格的分工，众多的新学科不断从浑沌状态的军事思想中分化、产生出来；另一方面，又要求军事科学各学科之间的联系和系统化，使之成为一个内部结构高度严密而有机的完整体系。这种趋势，宣告了古典的军事思想的终结，以思辩的方法把握军事规律的形式将为以数学、计算机技术、经济学、社会心理学等科学的方法把握军事规律的新形式所代替，军事思想这个概念将同自然哲学、历史哲学一样，进入人类思想史的领域。然而，军事科学的精细分化和系统要求，又必须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理论基础，所以，在军事思想中分化出各门军事新学科的同时，也分化出了作为军事科学的理论基础的军事哲学。军事哲学是哲学与军事学相结合的必然产物，也是军事思想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军事哲学的产生是对军事思想的扬弃，它克服了军事思想的朴素性和浑沌状态，成为科学的战争观和战争规律认识论。它不仅不会妨

碍，而且会促进各门军事科学的发展，因而它将焕发出更加强大的生命力，获得更为普遍的意义。当然它也要随着军事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

从研究对象和内容看，军事哲学是军事科学和战争经验的哲学概括，是关于战争运动的一般规律的科学。任何一门科学，它的性质主要是由它的研究对象，进一步说是由它的研究对象所包含的矛盾的特殊性所决定的。没有对象的科学只能是一种伪科学。军事哲学直接研究的是军事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矛盾关系和军事思维的规律，间接研究战争现象与人类社会的矛盾关系，以及战争运动的一般规律与战争指导之间的矛盾关系。军事哲学与各门军事科学的关系，在逻辑上不是把哲学的一般理论强加于战争运动，去规范军事科学的研究。而是从各门军事科学的研究成果中揭示战争运动的一般规律，从个别中揭示一般，对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进行哲学概括，并从军事活动中认识物质运动，尤其是社会运动的一般规律。军事哲学理论作为战争运动的一般规律的最高反映形态，其基本特点就是它在战争史上的普遍性。战争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频繁的社会运动形态，作为战争规律的反映的军事理论也随着战争形式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因此，用“纸上谈兵”或循规蹈矩的军事教条主义观点指导战争是异常危险的。但是战争运动并不是相对主义统治的领域，它同一切物质运动一样具有着一般的、普遍的规律性，历史上的军事理论和战争经验也不是随着旧的战争形式的结束而作废或对指导现代战争毫无价值的东西，问题是要把其中的军事哲学思想同受时代限制的军事理论区别开来。各时代的具体的军事理论将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失去其现实意义，但其中包括的

军事哲学思想则是“青春常在”，只有哲学思想才对各个时代的战争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如从古代战争中产生出来的哲学原则“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有备无患”、“量力而行”等，就是适用于一切战争的东西。军事哲学就是战争运动的一般规律的最高反映形态。

从认识论和实践意义看，军事哲学是关于战争运动中主客观矛盾关系的学说，是军事规律与军事艺术相统一的理论，是指导战争实践、指导军事科学研究的方法论。正确地认识和有效地利用战争规律，是军事哲学研究的根本任务，而这一任务的理论表达就是解决战争中主观与客观之间的矛盾。战争中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即战争认识与战争规律之间的矛盾是各门军事领域的基本矛盾，需要各门军事科学的共同努力才能解决。各门军事科学怎样才能互相协作，构成解决这一基本矛盾的整体条件，是军事哲学研究的主要课题。军事哲学研究战争中主客观矛盾运动的基本过程和规律，研究各门军事科学在战争的主客观矛盾运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任务。主客观矛盾的解决，不仅是一个认识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而在战争实践中，不仅需要指导与行动的正确，而且需要指导与行动的高明。因此，军事哲学不仅研究战争指导与战争行动的科学性问题，而且研究战争指导与战争行动的艺术性问题。科学性解决符合客观的问题，艺术性则解决如何改造客观和如何丰富客观的多样性内容的问题，战争指导的精华，在于其艺术性的表现。哲学上要求真、善、美的统一，这一要求表现在军事哲学中，就是军事科学与军事艺术的统一。在军事上把科学与艺术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对的。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战争指导上军事科学研究的最基

本的方法论基础。在军事技术上，武器的设计不仅要求符合战争运动中的各种自然规律，而且要求便于使用，消耗少、效能大，利于隐蔽和机动等。在战术上，战斗计划不仅要求正确反映敌情、我情和地形等条件，而且要求在兵力不变的情况下，减少敌的战斗能力，增大我的战斗力。在战略上，战争方针的确定，不仅要求符合国家的经济、政治情况，而且要求有利于胜利条件的生长，并促进敌人内部矛盾的发生。军事技术、战术、战略，从其本质上讲，是以艺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意识形态。所以，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军事哲学的基本原则之一。

上述分析，虽然对于科学的规定军事哲学的性质是不够的，但是可以作为我们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一个基本线索，以便从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概括出他的军事哲学思想，认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发展的基本过程和规律。

第二节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

在军事哲学思想史上，毛泽东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以中国革命战争为典型对象，以战略防御中以弱胜强的理论和方法为核心内容的，关于战争本质和战争运动的普遍规律的科学。它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包括战争本质观、战争运动规律论和战争指导方法论三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建立，对于军事哲学理论的系统化，对于军事哲学研究对象的确立和研究方法的科学化都有着巨大的意义。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毛泽东不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之一，而且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领导人。他的军事哲学思想是在他指挥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产生出来的，是中国革命战争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关于革命战争的认识论。实践性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根本特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其他特点都是同这一根本特点相联系的。首先，实践性决定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特点。毛泽东军事哲学理论是寓于他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各阶段的具体论述之中的，并受到各历史阶段特点的影响。如土地革命战争的防御性质决定了同时期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内容上的丰富性和系统性，因为防御战争比进攻性战争包含着更多的矛盾和更全面的内容。抗日战争的全国规模与复杂程度，决定了同时期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具体化特点。解放战争的战略进攻性质，决定了同时期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歼灭战方面的充分发展。其次，实践性决定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批判性特点。战争实践引起了不同的军事思想的激烈斗争，军事理论要为战争实践服务，就必须在不同思想的斗争中提高自身的真理性，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对战争实践的影响。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系统化就是在全面清算军事教条主义的斗争推动下实现的，其具体化又是在批判亡国论和速胜论等错误思想的斗争推动下实现的，毛泽东的主要军事著作，几乎都是为着批判错误的军事思想而写的，这是他的军事著作具有深刻的思想性的重要原因。其次，实践性决定了毛泽东军事哲学理论的具体性。战争实践是全面的和具体的，这种特点以理论的形式再现出来，就是理性的具体化，即辩证矛盾性与内容的全面性。实

践的具体性不断以经验教训的形式对军事哲学理论发生作用，促使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不断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实现了内容与形式、客观性与全面性、理论性和方法性的统一，使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成为辩证的战争矛盾论。最后，实践性决定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方法化。毛泽东研究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指导战争实践，而战争实践的强烈的现实性要求军事哲学理论的方法化。在军事哲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它不仅高于经验的方法，而且高于理论本身。所以，由实践性决定的方法化的特点，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高于其它军事哲学理论的重要标志。总之，实践性特点说明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它的其他特点都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特点在理论上的反映。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具有同步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首先是同革命战争实践的结合。作为结合之产物的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和指导，首先也是对革命战争的研究和指导。所以，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作为主要内容被包含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之内，并与毛泽东哲学思想同时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从时间关系看，不是先有毛泽东哲学思想，然后再把它运用到战争研究之中去，形成军事哲学思想，而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同时形成。作为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成熟标志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与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成熟标志的《实践论》、《矛盾论》，成书时间相差不到半年，而且在思想上是互相贯通的。当然，这种形成过程

上的同步性，并不排除二者在逻辑层次上的关系：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化，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军事哲学思想研究具有指导作用。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高成就。毛泽东军事思想包括军事哲学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等内容。其中，军事哲学思想除作为研究战争的方法论表述之外，大量是作为一般规律寓于战略战术的个别结论之中。在具体表述中，军事哲学思想与战略战术思想是不能截然分开的。我们只能用抽象的方法把大量的军事哲学思想从战略战术思想中提取出来。但军事哲学思想确实不同于具体的战略战术思想。它是作为本质、一般规律或灵魂渗透在战略战术之中的。直接地看，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关于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或关于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方针的理论。而本质地看，其中则包含着对军事哲学理论的系统论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书。既可以看成是军事著作，也可以看成是哲学著作。总之，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内容广泛的概念，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其中处于最高层次的、以哲学思维的形式出现的部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提出，是从哲学高度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结果。

第三节 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

的目的和方法

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直接目的是指导军事理论建设，促进各门军事科学的发展、为国防现代化服务。其间接

目的是沟通和加强军事科学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诸学科的联系，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事业，提高全民族理论思维的水平。

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对于提高军事指挥员的军事思维能力，加强军事理论建设和促进军事科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胜利和中国人民武装力量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科学体系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但是，长期以来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研究缺乏科学的方法，把其中的军事哲学思想同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方针、原则和结论混为一体，产生了一些不良的研究倾向：或者局限于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战争各阶段的具体思想，忽视毛泽东研究军事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致把许多受历史条件限制的特殊结论教条化，使军事理论内容停滞在解放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不能适应现代化国防建设的需要，甚至在军事上搞“传统”主义，如用游击战争的方法指导战术训练和国防力量布局等，造成军事科学研究和军队工作中的落后、僵化局面。或者根据现代战争的新特点，提出毛泽东军事思想“过时”、“无用”的观点，把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同他的一些不再适用的特殊的军事结论一起抛弃，结果丢掉了建设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适应当代发展的军事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使军事理论研究变成对现代军事建设的抽象议论。这些倾向，都是把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和历史性的军事结论混为一体，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缺乏深刻理解，从而缺乏科学的方法论指导的表现。另外，由于历史的原因，许多军事指挥员缺乏必要的理论修养，在军事工作中重经验而轻理论，在军事建设上没有—一个科学、稳定的指导

思想，形成治军无本、治军无法的现象。一个人一套办法，指挥员的更换常常引起整个工作的大变动，引起军队建设的盲目、混乱的局面。这些都说明了研究、学习军事哲学的必要性。毛泽东之所以能在巨大的历史变动中顺时趋势，指挥中国革命战争不断走向胜利，领导人民武装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除客观条件外，主观上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能够从哲学的高度着眼研究军事问题，注重军事理论，尤其是方法论的建设，不断根据历史条件的变化发展军事理论，排除各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军事观点的影响，从主观与客观、全局与局部、现状与发展的统一上解决军事方针和战略战术问题。只有认真研究和学习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才能使我们的军事指挥员养成良好的理论思维的习惯，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全面地运用军事科学知识指导军队建设；也只有认真地研究和学习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才能建立起一个适合中国国情和适应时代要求的军事科学体系，搞好现代化国防建设的宏观控制，使我国的军事决策科学化、完善化。

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解决政治、经济、文化等其它社会活动的方法论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军事哲学抽象地看，也可以说是强化思维的哲学、使用力量的哲学和竞争（趋利避害）的哲学。从这个意义上看，军事哲学可以广泛地运用于军事以外的各种社会活动，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般哲学的意义。在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中，很多论点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般理论。如关于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关系的论述，关于实践经验和认识的辩证过程的论述和关于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具

有决定作用的论述，都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毛泽东关于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等思想，对于生产活动、经济活动等也有着现实的指导意义。战争是一种高度强化了的社会物质活动，所以，军事思维的训练对于社会管理人员、经济工作者、教育工作者都是大有益处的。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有助于提高人们利用客观条件和发挥主观作用的能力，调动和使用财力、物力的能力，进行政治、外交斗争的能力和进行生产、商业竞争以及体育运动比赛的能力，等等。总之，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精神武器，也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精神力量。

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产物，要从根本上理解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就必须深入地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历史的实践经验中揭示和认识军事哲学思想的内涵和普遍性价值。毛泽东正是用这样的方法写出了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我们当然应当用同样的方法研究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对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缺乏深入的研究，就不可能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有深刻的理解。但是，研究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只是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基础性的工作，而更主要的工作则是弄清毛泽东是怎样从实践到理论，对战争历史经验进行逻辑概括的，要完成这一工作，就必须下功夫系统地学习和研究毛泽东的全部军事理论著作，尤其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集中

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十大军事原则”等，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及其研究方法，基本上都是在这些著作中表述出来的。因此，这些著作可以看成是毛泽东军事哲学的经典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经验，系统研究上述著作，是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最主要的方法。在军事哲学的研究中，要切忌把哲学教科书的体系简单照套在军事哲学上，用以规范军事哲学的体系，做出削足适履的事情，抹煞军事哲学的特点。军事哲学的体系应当根据战争运动的内在的逻辑过程来确定。另一方面，也要防止给具体的军事原则冠以哲学的术语，抹煞军事哲学与具体的军事理论的区别，降低军事哲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军事哲学虽然以战争运动的历史规律为基础，但直接地讲，它不是研究具体的军事现象的科学，而是研究军事思维的方法的科学。军事哲学并不提供任何具体的战争实践原则，用军事哲学去解决具体的军事问题或把具体的军事问题作为军事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军事科学不发达的表现。在军事科学已经充分发展的今天，军事哲学的研究如果越界干涉专门的军事问题，就会妨碍军事科学的发展，会使人们误认为军事哲学是一门多余的科学。其实，军事哲学具有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就是解决军事思维的方法问题，须知思维方法的革命，在军事领域和在一切社会实践领域一样，是一个永远不会陈旧的课题，在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时，这是必须注意的。

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还应坚持由抽象到具体和矛盾分析的方法。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形成、发展的过程是一个由理性的抽象上升到理性的具体的过程。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是随着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毛泽

东论述军事哲学问题所使用的范畴、概念和命题，只有在发展的比较中才能全面、深刻地认识其内涵和意义。而各种范畴、概念和命题发展的基本趋势，就是愈益全面、深刻，愈益展示出更深层次的矛盾性，也就是不断由抽象到具体。理性具体的核心是概念蕴含的矛盾关系的不断展开，所以，抓住矛盾分析的方法，就抓住了理解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钥匙。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从本质上讲，就是关于战争运动的矛盾系统的学说。只有坚持矛盾分析的方法，才能从本质上掌握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

研究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也是一项十分艰苦的工作。我们应当学习毛泽东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精神和作风，为发掘和继承毛泽东留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遗产。繁荣我国军事科学事业，促进现代化的国防建设而努力。

第二章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 的产生与形成

第一节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产生的条件

一个思想体系的产生，通常需要两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思想史的条件，即传统思想或外来思想的影响；一是现实社会的条件，即思想体系依赖产生的实践基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产生，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军事理论为直接的理论来源，以中国革命战争实践为现实基础，并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兵家哲学的重要影响。

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包括军事在内的各门科学的研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批判地吸取了资产阶级军事理论的合理成分，第一次对战争现象作出了科学的说明，为指导革命战争提供了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原则。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从生产力和军事技术发展出发，说明军队和战争条件的发展，从而提供了观察战争和军事现象的正确方法。马克思指出：“随着新作战工具即射击火器的发明，军队的整个内部组织就必然改变了，各个人借以组成军队并能作为军队行动的那些关系就改变了，各个军队相互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① 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363页。

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①恩格斯是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他对战争史和军事史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和研究，揭示了战争和军事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为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他研究了战争在历史上的二重性作用，指出：“在杜林先生看来，暴力是绝对的坏事，……暴力在历史中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②列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典型对象，对战争的社会本质进行了深入地研究，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和无产阶级的军事策略。列宁充分肯定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揭示了战争的社会本质。他指出：“战争对私有制基础并不是矛盾，而是这些基础的直接的必然的发展。”^③“决定战争的性质的是战争所继续的是什么政治……战争是由哪一个阶级进行的，是为了什么目的进行的。”^④列宁指出了消灭战争的条件，指出了消灭战争与进行战争的辩证关系。他说：“只有在我们推翻、彻底战胜并剥夺了全世界的而不只是一国的资产阶级之后，战争才不可能发生。”^⑤还说：“社会主义者如果还是社会主义者，就不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

③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0页。

④ 《列宁全集》第3卷，167页。

⑤ 《列宁全集》第23卷，第76页。

反对一切战争。”^①此外，马恩列斯对战争运动的基本规律和战略战术的辩证法也进行了充分的论述。所有这些思想，都为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理论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指导作用。在毛泽东的军事理论著作中，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反复强调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战争实践的重要意义。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②这里所谓“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军事理论具体化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方法论。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又指出：“到今天为止，我们可以自信地说，中国共产党在十七年的斗争中，不但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而且锻炼出来了一条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路线。我们不但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政治问题，而且会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决战争问题；不但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党会治国的有力的骨干，而且造就了一大批会治军的有力的骨干。”^③在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理论得到了全面的运用和很大的发展，如他把唯物论和辩证法运用于军事，提出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坚持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等考察战争的基本方法；他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列宁的战争观思想，进一步揭示了战争的起源和社会性质，提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和

① 《列宁选集》第二卷371页。

② 《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下同）第170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513页。

用战争消灭战争的辩证论断；他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运用于战争，揭示了战争运动中的主客观矛盾和认识战争规律的辩证过程，充分肯定了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他把以对立统一规律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运用于战争，提出了分析战争矛盾的科学方法，揭示了战争的社会政治本质与军事本质之间的矛盾关系，把运用战略战术的辩证法发展到炉火纯青的程度。总之，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军事哲学理论的系统化。

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理论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时候，十分重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他坚决反对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和战争机械论，强调坚持有的放矢和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他批评第二次国内战争中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列宁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我们的这些同志恰是忘记了这一点。”^①这就明确地指出了离开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特点去研究马克思主义，就等于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一九三九年，毛泽东总结了十八年建党的经验，指出：由于我们的干部更多地学会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我们党就进行了胜利的十年土地革命战争，创造了坚强的武装部队，学会了战争的艺术，而凭借着党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更加深入的更加统一的理解，就不但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进行了伟大的抗日战争。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还明确指出：“十大军事原则，是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171页。

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中国革命战争是一个由同一的主体进行的，包括三次性质相异的国内革命战争和一次民族反侵略战争在内的，历时二十多年的复杂的战争系统。这个复杂的战争系统，始终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始终与复杂的国际政治、军事背景相联系，除最后一、二年之外，又始终处于敌强我弱的军事关系中。总之，它以新的内容和形式出现在中国战争史上，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很少见的。毛泽东参加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亲自缔造了人民的军队，亲自指挥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指挥这样复杂的战争，必须处理好战争与革命、国内战争与国际战争、军事条件与社会条件、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战略与战术以及敌、我、友之间的一系列复杂关系。因此，必须对战争进行哲学的思考，认清战争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处理好战争中的各种关系。而且，战争本身也为解决这一任务提供了条件。毛泽东正是应战争实践的客观要求，利用战争实践提供的条件，创立了他的军事哲学思想。可以说，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就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孕育、成熟和发展的土壤，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就是中国革命战争史的逻辑形态。

我们的祖国，以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闻名于世，兵家哲学思想则是其中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频繁、剧烈的古代战争，强烈地影响着人们对世界的认识。任何脱离实际、违反客观规律和消极死板的思想，都会遭到战争实践的批判。战争实践给人们的思想提出了客观、全面、灵活的要求，这种

要求，使古代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形成了尚理求实的优良传统，他们重视对战争进行理性的或哲学的思维，并特别注意作为这种思维结果的军事哲学理论对战争实践的实用性。这种传统的发扬与贯彻，产生了大量的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的军事理论著作，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部门——兵家。兵家哲学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产生有着重要影响。名列兵家之首的《孙子兵法》，集中了兵家哲学的全部优点，不仅为后世历代军事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给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以深刻的影响，《孙子兵法》一开始就把战争与国家的生死存亡联系起来，并指出得“道”或君民同心是战争胜利的首要条件，触及到了战争的社会本质问题；对敌与我、兵与谋、攻与防、强与弱、虚与实、合与分等矛盾范畴进行了系统、深入地考察，揭示了战争运动的基本规律，全面论述了战争胜利的因素和条件，说明了认识战争和运用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因和方法。有的学者评述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先秦兵家辩证法说：“中国辩证法应溯源于兵家，从而具有不同于概念辩证法的特征：A 高度冷静的理智态度，B 迅速抓住关键的二分法方式。C 直接指导行动的具体实用性。”^① 这种特色在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两次引证孙子关于“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论述，用以说明学习战争规律与使用战争规律的关系以及战争规律的可知性，并指出“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② 可见，孙子的这一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页。

^②《毛泽东选集》（四卷合订本一下同）第458页。

思想是毛泽东关于战争认识论学说的重要来源之一。与《孙子兵法》相联系的是古代哲学名著《老子》。《老子》与《孙子兵法》相比，具有更强的抽象性，它是一部典型的哲学著作。孙子以“兵”为基本范畴，老子以“德”与“道”为基本范畴。但《老子》的思想内容与“兵法”之密切是毋庸置疑的。《老子》关于兵有许多精辟的论述，如“不以兵强天下”（三十章）；“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三十一章）；“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三十三章）；“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三十六章）；“知止不殆”（四十四章）；“以奇用兵”（五十七章）；“重积德则无不克”（五十九章）；“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六十七章）；“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用兵有言：‘吾不为主而为客户，不敢进寸而退尺’”；“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六十七）；“兵强则灭”（七十六章）；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等等。概而言之，《老子》提出了后人用兵，以德取胜，柔弱胜刚强的军事哲学思想，这对以有理有利，后发制人，积极防御，以弱胜强为特点的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有影响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还引证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观点，说明了战争防御中丧失土地与消灭敌人，恢复、扩大土地的辩证法。中国古代兵家哲学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影响，通过对孙子和老子的分析，即可得到典型的说明。然而，毛泽东对中国古代军事哲学思想的合理继承，还有一个重要的渠道，就是对中国古代战争史和著

名战例的研究、运用。毛泽东早在青少年时期，就熟读过包含着丰富的军事思想和战争史料的《史记》、《资治通鉴》、《左传》等书。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引证了历代著名的战例，说明积极防御，后发制人和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以弱胜强的道理，其中，最主要的是《左传》的影响。《左传》是与《孙子兵法》同时或稍后形成的史学名著，也是一部包含着极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的春秋战争史。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全文引证了《左传》关于齐鲁长勺之战的记述，说明后发制人的道理，并作了详尽的评论，指出：“虽然是一个不大的战役，却同时是说的战略防御的原则。”《论持久战》中，还引证了《左传》中晋楚城濮之战和楚宋泓之战的例子，前者说明以弱胜强的道理，后者批评宋襄公的反军事的：“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总之，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具有明显的尚理求实，重后发制人，重主观作用的风格 and 特点，这是与中国兵家哲学的思想影响分不开的。

在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朱德、刘伯承、周恩来等中国现代的许多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创立，从主观上看，不仅在于毛泽东个人伟大的军事天才条件，而且在于他及时、正确地吸收和概括了指挥中国革命战争的全体将帅们的集体智慧，战争是由敌我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运动，因此，对军事理论的哲学概括，本质上是对敌我双方的智慧进行综合的结果，总结敌人的军事经验，有批判地向敌人学习，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国民党

和日本侵略军在战争指导上的经验和教训，都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和总结。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指出：“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① 总之，只有把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看成是革命战争的指挥者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和对敌我双方的军事智慧的综合，才能真正理解它在现代中国军事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和它的科学性之所在。

第二节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产生

一、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形势和毛泽东的军事实践活动

土地革命战争（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从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古田会议”前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起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创时期，也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萌发和产生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第一次革命战争。国民党反动派对革命的背叛和北伐革命战争的失败，使共产党人认识到掌握军队和进行武装斗争的重要，党的“八·七”中央紧急会议批判了陈独秀取消工农武装斗争的错误，确立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方针，提出了准备和领导农民的总暴动，改造雇佣军队，武装工农，造成新型革命军队的任务，确定了秋收暴动的基本战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一九二七年八月到一九二九年底前后，在全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510～511页。

范围内爆发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一百多次武装起义，开始了对国民党新军阀的武装斗争。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工农革命武装找到了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和农村游击战争的正确道路，创建了湘赣、赣南、闽西、湘鄂边、洪湖、鄂豫皖等十几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克服了党内“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粉碎了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建立了工农政权和新型的人民军队，打开了土地革命的局面。

毛泽东作为一个清醒的马克思主义者参加和领导了土地革命战争，并在实践中为开创正确的革命道路和建设新型的革命军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八·七”会议上，他对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严厉地批评，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英明论断。会后，他做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为起义制定了正确的战略。一九二七年九月九日爆发的秋收起义，第一次公开打出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武装起义的旗帜，建立了工农革命军。起义受挫后，毛泽东及时改变攻打长沙的错误计划，率领起义军转向井冈山地区，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向井冈山转移的途中，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整编，创立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的建军原则，为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基础。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积极开展重建党组织，建设民主政权和群众武装的工作，开创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一九二八年四月朱、毛所部在井冈山会师后，毛泽东和朱德等指挥工农红军进行了胜利的军事斗争，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的多次“进剿”和“会剿”。一九二九年，毛泽东率领红军第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创建了闽

南、闽西革命根据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底，毛泽东主持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著名的古田会议。并亲自为会议起草了《决议》，从思想上和组织上系统地提出了人民军队的建军纲领。总之，毛泽东在土地革命初期的实践和努力，从实践和思想两个方面都为整个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就是在上述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革命实践中萌发和产生出来的。土地革命战争以工农武装起义、创建人民军队为起点，以开辟和建设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为基本任务，无产阶级领导的土地革命决定着战争的社会性质，以弱小的红军在局部地区粉碎强大敌人的“围剿”，是这次战争在军事上的主要特点。进行这样一场性质全新的战争，必然使人们遇到许多新问题，如战争的本质是什么？人民革命为什么要进行战争？战争有没有规律？战争的挫败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弱小的军队能不能战胜强大的军队？等等。这些新问题的提出，对于认识战争的本质和规律，促进军事思维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正是在探索 and 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早在北伐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写出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阐明了中国革命的阶级基础、领导力量和主要同盟军等重大的理论问题，为党由城市斗争向独立领导土地革命和农村武装斗争的转化奠定了理论基础。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总结

了发动工农武装起义和开创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和教训，写出了《在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八·七会议）上的发言》，《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第一批军事著作，以经验性议论的形式，揭示了革命与战争、军事与政治、强与弱、集中与分散、失败与胜利等重要的军事范畴之间的辩证关系，解决了武装斗争，人民军队建设，根据地的开辟和巩固，革命发展战略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产生了最初的战争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思想。

二、关于革命与战争、军事与政治的关系的思想

北伐大革命的失败，使党内许多同志认识到革命与军事的密切关系，毛泽东就是从这一问题中引出正确意见的代表。他在党的“八·七”会议上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介石、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是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哲学概括，它实际上指出了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国革命的基本道路。武装斗争是革命的最高形式，人民的政权是由枪杆子创造出来的，放弃军事就等于放弃了革命。在重视军事这一点上，革命者应向反革命学习，革命运动就是革命的军事运动，在这一点上书生气是要失败的。这一思想，后来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中，毛泽东从理论上进行了充分的论述。一九二八年十月，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毛

泽东更明确地指出：“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① 这里从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特殊国情出发，说明了武装斗争与中国革命的必然性联系。把武装斗争或革命战争看成中国革命的一个“特征”，充分肯定了革命战争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毛泽东十分强调革命武装和军事斗争对土地革命和革命政权的基础作用，政权不仅从枪杆子中产生，而且靠枪杆子来维持。“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一齐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那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② 还说：“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是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③ 总之，革命和战争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革命必须是武装的革命，战争又必须是革命的战争，武装革命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进行武装革命，必须有一支革命的军队，军队是武装的核心。在准备秋收起义的时候，毛泽东就指出：发动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作骨干，否则起义难免失败。后来，毛泽东又指出：“若只有地方性质的赤卫队而没有正式的红军，则只能对付挨户团，而不能对付正式的白色军队。”^④ 而要有一支坚强的革命军队，就必须解决好革命军队的建设问题。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全

①②③《毛泽东选集》第78、62、50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0页。

面地论述了工农红军的建设问题，尤其是围绕政治与军事的关系这个根本性的问题，提出了红军思想建设的科学理论。毛泽东运用唯物主义历史观和辩证法的观点，阐明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性质，批判了形而上学的单纯军事观点。他指出：

“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① 这一论述包含了毛泽东关于军队本质和作用问题的基本思想，揭示了军事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把军队及其军事任务——打仗同革命、群众、政权、政党等基本的政治范畴有机地、辩证地统一起来，这就为揭示一切军队的本质提供了科学的方法。军队从其直接性上、或从形式上看是一个军事的组织，而从其本质上或内容上看，则是一个政治组织；同样，军队的作用和任务，从直接性上或形式上看是军事的，而从本质上或内容上看是政治的，一句话，军队就是一个以政治为内容的军事形式。这是一切军队的共同本质，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军队则自觉地把这一本质贯彻到了自己的建军原则中去，使军队明确自己的历史任务。为了提高军队对红军性质和任务的觉悟，毛泽东对单纯军事观点进行了系统地批判，并指出了“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和“纠正的方法”，论述了军事与政治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单纯军事观点“认为军事政治二者是对立的，不承认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② 这种观点的来源在于红军的政治水平

①《毛泽东选集》第8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84页。

低和雇佣军队的思想影响，对革命军队的性质缺乏认识和不懂得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因此，必须提高党内的政治水平，加紧官兵的政治训练和俘虏的教育，消除旧军队的影响。在党的革命路线上，毛泽东强调没有军事就没有政治（即革命），在红军的建设上，毛泽东又强调没有政治就没有军事，即离开政治任务，“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把这两个方面联系起来，就看到了毛泽东关于政治与军事辩证统一的思想，也就间接地看到了处于萌芽状态的毛泽东的科学战争观。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提出了系统纠正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任务，并且把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放到军队建设的首位，这也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军队的组织建设与思想建设关系的辩证思想。

三、关于弱小的革命力量如何在强敌面前存在和发展的思想

关于弱小的红军如何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生存、发展和革命如何走向胜利的问题，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作了精辟的分析。

关于“中国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一国之内，在四围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和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地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①这种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有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战争。’^②‘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

①《毛泽东选集》第4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6页。

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有些同志在困难和危急的时候，往往怀疑这样的红色政权的存在，而发生悲观的情绪。这是没有找出这种红色政权所以发生和存在的正确的解释的缘故。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① 这一利用敌人方面的矛盾，求得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思想，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首先，毛泽东对战争现象进行了深层次的矛盾分析，不仅看到了敌我之间的矛盾，而且看到了敌人方面内部的矛盾；第二，他又从军阀之间的矛盾看到了作为这种矛盾的深刻背景的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及作为这些矛盾存在条件的中国分散的自然经济的基础；第三，他指出了在红色政权产生初期，军阀之间为争夺统治范围和帝国主义之间为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比他们同红色政权之间的矛盾更加剧烈，因而军阀之间的战争具有持续不断的必然性，这就为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找到了根据。毛泽东把战争放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联系之中去考察，从而找到了弱小的红军在强大的敌人面前生存和发展的根据和条件，这种方法包含了军事辩证法的两个极重要的原则，就是从战场之外看战争和从敌人方面寻求战胜敌人的方法。“买办豪绅阶级间的不断的分裂和

^①《毛泽东选集》第49页。

战争”的条件，后来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被毛泽东概括为中国革命战争的第一个特点的主要内容，即“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毛泽东的上述论断，在实践中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广州起义就利用了从属汪精卫的张发奎同桂系军阀黄绍竑，支持蒋介石的粤系军阀陈铭枢之间的三角战争造成的广州城内兵力空虚的条件。一九二九年三月爆发的蒋介石同桂系军阀李宗仁争夺两湖的蒋桂战争，同时使赣南、湘鄂边、鄂豫边、江东、琼崖等革命根据地的开创和扩大都得到了有利的时机，从而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一九二九年五月到六月，利用蒋桂两派爆发粤桂战争，闽西军阀开赴东江同桂系作战，敌人力量空虚的有利时机，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二次入闽，解放龙岩，攻占永定，创立了闽西革命根据地，而一九三〇年五月，蒋、冯、阎之间爆发的大规模军阀混战，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减轻了对南方各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使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实现了工农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第一次军事战略转变，为争取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总之，利用敌人方面矛盾而发展自己，是以弱敌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毛泽东关于以弱敌强思想的另一个特点是坚持用全面的观点看待战争条件。他不仅看到了敌人方面的分裂和战争对于红色政权的意义，而且指出：“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1）有很好的群众；（2）有很好的党；（3）有相当力量的红军；（4）有便于作战的地势；（5）有足够给养的经济力。”^①从这里可以看到，革命战争

^①《毛泽东选集》第56页。

不仅需要敌人方面的条件，还需要有自己（主体）方面的条件；不仅需要军事的条件，还需要政治的、经济的和地理的条件；在政治条件中，不仅要有党的条件，还要有人民群众的条件。毛泽东后来提出的综合的、全面的战争条件论，在这时已经萌芽了。

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弱小的红军存在与发展的条件，而且指出了由弱小走向强大，走向胜利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命题本身就包含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辩证发展的深刻道理，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总规律。为了正确地认识这个革命道理，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提出了一条认识革命形势，分析敌我力量的科学方法，他说：“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①这一方法告诉我们，认识敌我力量和战争形势，必须解决现象与本质之间的矛盾。不能离开现象又不能满足于现象，而需要借助对现象的分析，抓住本质。只有本质才是我们制定战略战术的根据。毛泽东还运用这一方法，具体地分析了敌强我弱的现象和我弱敌也弱以及我会很快发展壮大的本质，告诉我们既不要小看了反革命力量，也不要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这是一条科学认识革命战争发展规律的重要方法。这一思想，后来被毛泽东发展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著名的战略战术原则。

从上述的论述可以看出，以弱胜强的思想从一开始，就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中的一个主要内容。毛泽东军事哲学

^①《毛泽东选集》第96页。

思想从其主要特点看，就是关于以弱胜强的哲学思想。

四、游击战术中的军事辩证法思想萌芽

毛泽东最初的战术思想，是从战争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具有明显的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灵活多变的特点。这种战术思想原则，包含着自发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性质。所以，毛泽东的军事辩证法思想，最初不是从书本中学来的，而是从实践中学来的。

坚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灵活多变的原则，就能在战争实践中及时地发现和改正错误，采取新的正确的战法。如秋收起义刚爆发，毛泽东就从实践中发现了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和进攻城市的错误，及时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选择了向罗霄山区进军，开展土地革命和游击战争的方针，从而找到了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的正确道路。一九三〇年十月，他又根据敌情的新变化，及时改变红一方面军进攻南昌、九江的错误计划，为粉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创造了有利条件。

坚持从实际出发，量力而行，灵活多变的原则，就能在实践中找到保存、发展自己和消灭敌人的正确战术，一九二九年四月，毛泽东在前委给中央的信中说：“我们三年来从斗争中所得的战术，真是和古今中外的战术都不同。用我们的战术，群众斗争的发动是一天比一天广大的，任何强大的敌人是奈何我们不得的。我们的战术就是游击的战术。大要说来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很大的群众’。‘这种战术正

如打网，要随时打开，又要随时收拢。打开以争取群众，收拢以应付敌人。三年以来，都是用的这种战术。”^①这段话是对土地革命战争初期三年游击战争中战术思想的总结。首先，毛泽东指出了游击战术产生的基础，游击战术的性质和意义，这就是从作战实践中学来的、只适用于自己的特殊性的战术，敌人既无法利用又无法摆脱，所以是红军的成功之术。其次，概述了游击战术的主要内容和核心思想。这核心思想就是分散与集中的辩证法。毛泽东的总结，不仅概括了湘赣、赣南和闽西的游击战术的来源和思想，而且概括了其他各根据地游击战术的来源和主要思想。如周逸群领导的鄂西特委一九二九年五月和十二月采取和提出的游击战术是：

“你来我飞，你去我归，人多则跑，人少则搞”。“随时是进攻的，不是保守的”，“只有不断的向着敌人弱点进攻，不断的发动群众向外扩大，才能得到胜利”。“不攻坚，不打硬仗，但决不是逃跑主义”。“应绕到其侧面或后方去袭击”。“没有胜利把握的，我们不应冒险去打”。争取群众和争取敌人兵士。“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就是要在集中指导下分散游击去发动群众，集中力量去打击敌人”，等等。鄂豫边特委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提出的游击战术是：“（1）集中作战，分散游击；（2）红军作战尽量号召群众参加；（3）敌情不明，不与作战；（4）敌进我退，敌退我进；（5）对敌采取跑圈的形式；（6）对远距离的敌人，先动员群众扰乱敌人，次采取突击的方式；（7）敌人如有坚固防御工事，不与作战”。闽北红军一九二九年形成的作战原则是：“出敌不意，攻敌不备，声东击西，避实击虚，集中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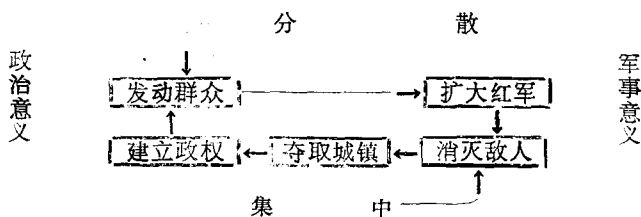
^①《毛泽东选集》第100—101页。

力，争取主动，打不打操之于我，……吃得下就吃，吃不下去就跑。”这些战术思想，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而其大同的主要基础就是共同的实践。所以，老老实实地、自觉地做实践的学生，是在游击战争中获得自由的要诀。游击战争的实践就是孕育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母体。

在毛泽东的游击战术思想中，已经包含了许多军事辩证法思想，如积极防御，诱敌就范；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人民战争；进退自由，在运动中创造克敌制胜的条件等。有些辩证的战术思想，则是通过战例表现出来的，如一九二九年二月，毛泽东指挥红四军在大柏地抓住追击之敌第15旅孤军突出的弱点，利用有利地形，歼敌近两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八百余人，取得进入赣南的第一次胜利。这个战例就体现了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先打孤立之敌的原则。同年六月，毛泽东指挥红四军在闽西采取诱敌深入和以假乱真等战术，主动撤离龙岩后，造成向江西撤退的假象，待敌陈国辉部开入龙岩后，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向敌进攻，二千余敌全部被歼，并重新占领龙岩。以上战术思想和战例都说明，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已经初步形成了关于攻、防、进、退、强、弱、虚、实、军、民、集中、分散等对立范畴的辩证观念，从而为游击战术向运动战的战略战术的转变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毛泽东的初期战术思想中，集中与分散的辩证法得到了尤其充分的论述。因为游击战争的任务，一方面是从群众中吸取力量，发展自己；另一方面是消灭来犯敌人，保存自己。第一方面需要分散，第二个方面需要集中，所以集中与分散的关系就成了游击战争中需要解决的最基本的关系，成了制

定和运用游击战术的前提。早在一九二八年十月以前，毛泽东就提出了“集中红军相机应付当前之敌，反对分兵，避免被敌人各个击破。”^①这是毛泽东对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思想的最早的表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又指出：“兵力集中的积极的理由是：集中了才能消灭大一点的敌人，才能占领城镇。消灭了大一点的敌人，占领了城镇，才能发动大范围的群众，建立几个县联在一块的政权。”^②这里不仅提出了集中兵力的直接的军事意义，而且指出了集中兵力的间接的政治意义。这两种意义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这一概括是从实行分散兵力，多次遭到失败的实际教训中得出的。但是，毛泽东没有把这种观点片面化和绝对化，他同时又指出了一定条件下近距离分兵，以至远距离分兵的必要性。即“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至于远距离的分兵，则要在好一点的环境和在比较健全的领导机关两个条件之下才有可能。因为分兵的目的，是为了更能争取群众，更能深入土地革命和建立政权，更能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如果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那就无疑地应该分兵，因为在这两个条件下，分散比集中更有利。”^③这些论述，对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作了全面、辩证的说明：



①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51、100—101页。

总之，毛泽东在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初期，就已经体现出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而且在某些方面达到了很高的成就。虽然从总体上看，还比较朴素，但这些思想已经表现出一种统一的、很有特色的风格，即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和注重思维的具体性（即辩证矛盾性和全面性）的风格，这是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思想在后来取得伟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第三节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指导

反“围剿”战争的实践中全面形成

一、反“围剿”与长征时期的形势与毛泽东的实践活动

反“围剿”与长征时期，从一九三〇年五月红军实行第一次战略转变开始，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的直罗镇战役为止，是中国工农红军以正规兵团进行运动作战的时期，也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指导正规战争的实践中全面形成的时期。

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的近三年的游击战争中，工农红军已发展到十万人，十几个军，创建了十一个省的十几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一九三〇年五月，爆发蒋、冯、阎军阀混战，减轻了敌人对南方各根据地的压力，造成了革命发展的有利时机，六月，红军主力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和方案，开始整编，组建了正规军团，统一和健全了编制，从组织上实现了红军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红军的战略转变，虽然受到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在进攻大城市的战略行动中使红军受到很大损失，但仍不失为人民军队历史上的一次大的进步，为粉碎敌人对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围剿”

创造了有利条件。从一九三〇年十月到一九三四年十月，蒋介石先后向以中央苏区为主的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胜利地进行了三次反“围剿”战役，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在朱德、周恩来的指挥下也取得了胜利，但是，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排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红军被迫开始了战略大转移——长征。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党中央在长征途中的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失败的教训，重新肯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作战原则，并确立了毛泽东对红军的指挥权。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红一方面军经过四渡赤水战役，摆脱了敌人的尾追堵截，于一九三五年十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十一月，中央红军发起直罗镇战役，歼灭敌一个师又一个团，为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心向陕北的转移奠定了基础。

毛泽东在反“围剿”与长征时期始终是正确的军事路线的代表，在中央苏区前三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中起了核心作用。这一时期是毛泽东亲自指挥正规兵团同敌人进行大规模作战的第一个时期，也是他的军事哲学思想体系成熟之前的一个丰富的实践期，没有这一时期的坚实的实践基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不可能在一九三六年底达到成熟的。由于频繁的战争行动，毛泽东在这一时期较少进行理论研究，但他的处于朴素状态的军事哲学思想在正反的实践经验作用下，却迅速地发展起来和全面地展开，从而进入了由产生到成熟的过渡期。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军事

哲学思想是在许多著名的战役中以物化（即战史战例）的形态表现出来的。毛泽东亲自指挥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战役，对第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和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也进行了实践的考察和研究，后来又亲自指挥了四渡赤水战役和直罗镇战役。研究这些战役，是了解这一时期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所必须采用的重要方法。

毛泽东不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而且更主要的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家，所以他总是把战争放到整个革命运动中，以至放到整个社会的体系和过程中加以考察，他经常利用作战之隙，深入根据地农村进行社会调查，了解和研究生产、生活等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及其与战争的关系。一九三〇年九月到一九三四年，他先后写了《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多篇农村调查报告和《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研究根据地经济建设、土地革命和群众生活的著作，这些调查分析对于毛泽东的历史唯物主义战争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形成的重要条件。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条件论的形成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战争运动是建立在社会的经济运动和政治斗争的基础之上的，人民群众是战争力量的真正源泉，所以，经济状况、政治斗争和人民群众是战争运动的最基本的社会条件。毛泽东在反“围剿”时期的著作，联系革命战争的实际，对上述思想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初步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条件论。

关于革命战争的经济条件。一九三三年八月，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充分论述了经济建设与革命战争的辩证关系，说明了经济条件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意义。他说：“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过去有些同志认为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那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因此见到谁谈经济建设，就要骂为‘右倾’。他们认为在革命战争环境中没有进行经济建设的可能，要等战争最后胜利了，有了和平的安静的环境，才能进行经济建设。……抱着这些意见的同志，他们不了解如果不进行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不能有保障，人民在长期的战争中就会感觉疲惫。……有这种意见的人，也常说一切应服从战争，他们不知道如果取消了经济建设，这就不是服从战争，而是削弱战争。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才能顺利地开展我们军事上的进攻，给敌人的‘围剿’以有力的打击；才能使我们有力去扩大红军，……使我们的红军减少自己找给养的这一部分工作，专心一意去打敌人；也才能使我们的广大群众都得到生活上的相当的满足，而更加高兴地去当红军，去做各项革命工作。”① 这里指出，经济建设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没有经济建设，仅仅靠老百姓出钱出粮，坚持长期的战争是不可能的。同时，毛泽东又指出：“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那种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5～106页。

以为经济建设已经是当前一切任务的中心，而忽视革命战争，离开革命战争去进行经济建设，同样是错误的观点。只有在国内战争完结之后，才说得上也才应该说以经济建设为一切任务的中心。……当前的工作是战争所迫切地要求的一些工作。这些工作每件都是为着战争，而不是离开战争的和平事业。”①认为战争时期不能进行经济建设的观点和把经济建设看成中心工作和和平事业的观点都是错误的，他们都把战争和经济建设对立起来，用孤立、片面的观点看待二者的关系，毛泽东通过对这两种观点的批评，阐明了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辩证关系，指出经济建设是革命战争的物质基础，革命战争又是经济建设所服从和服务的中心任务。

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对人民战争的思想从原则上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说：“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②“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们，我们却要打破反革命。在革命政府的周围团结起千百万群众来，发展我们的革命战争，我们就能消灭一切反革命，我们就能夺取全中国。”③他从革命战争的社会性质引出了进行战争的根本条件，指出了在战争中动员和依靠群众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事实也证明，离开群众的拥护和支持，革命战争是无法进行的。一九三四年一月毛泽东指出：长冈乡十六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09、12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25页。

407人，出外当红军做工作的320人，上才溪乡的同龄男子552人，出外当红军的485人，分别占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八十八。由此可见人民对革命战争做出的伟大贡献。那么怎样才能实现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战争这一中心任务呢？毛泽东通过分析动员、依靠群众和关心群众生活的关系，对此作出了具体的回答。他说：“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①“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②毛泽东看到了要群众参加战争，就必须提高群众的觉悟，而利益是群众觉悟的基础和出发点，要群众提高觉悟，就必须关心群众生活，代表群众利益。从利益到觉悟，从觉悟到热情和行动，这是革命战争获得群众条件的一条逻辑，这逻辑是对人民群众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的结果。

关于革命战争的政治条件。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通过对革命与战争，军事与政治的辩证关系的论述，已对革命战争的政治条件作出了说明，如注重提高红军官兵的政治觉悟，克服各种错误思想等。一九三四年一月在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从红军建设的角度，对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122~123、124页。

革命战争的政治条件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述。毛泽东指出：红军“走上了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道路，这表现在于：（一）成份提高了，实现了工农穷苦群众才有手执武器的光荣的权利，而坚决驱逐那些混进来的阶级异己分子。（二）工人干部增加了，政治委员制度普遍建立了，红军掌握在可靠的指挥者手中。（三）政治教育进步了，坚定了红色战士为苏维埃斗争到底的决心。提高了阶级自觉的纪律，密切了红军与广大民众之间的联系。（四）军事技术提高了。……（五）编制改变了，使红军在组织上增加了力量。所有这些，大大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成为不可战胜的苏联埃武装力量。”提高红军战斗力，使红军成为铁的正规的革命武装队伍的五个条件中，有三条属于政治条件。这些政治条件概括起来，就是一个军队的阶级成分，一个军队的阶级觉悟。而这两条，又与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和苏维埃政府对人民的动员分不开。因此，毛泽东指出反“围剿”战争的光荣胜利，首先是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区红军能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的行动。还指出：“苏维埃的基本任务是革命战争，是动员一切民众力量去进行战争。”这里，构成战争运动的政治条件的各种主要的要素都被明确地指出来了，即党的领导，军队的政治成分，军民的政治觉悟等，再加上人民的拥护和敌人内部的矛盾两个条件，战争的政治条件理论就全面地提出来了。

除上述战争运动的社会条件之外，毛泽东还十分重视军队即直接的战争条件的建设，如强调对军队的军事训练和加强军队的组织建设等。

战争条件是战争胜利的基础。离开上述各种条件，战争就成了无米之炊，以弱胜强就成了一句空话。红军的四次反“围剿”战役的胜利，正是上述诸条件发挥作用的结果，而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放弃、破坏或没有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的缘故。

三、运动战的实践经验与战争运动的辩证法的形成

1.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和四渡赤水战役的经验中包含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反“围剿”与长征时期，毛泽东关于战争运动的辩证法思想是通过他指挥的一系列战役体现出来的。其中，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和四渡赤水战役是两个最突出的战例，分析这两个战例，对于理解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形成，具有典型的意义。

第三次反“围剿”战役从一九三一年七月一日开始，至九月十五日结束，红军以一当十，以三万人粉碎了敌人三十万人的进攻，歼灭敌人十七个团，毙伤俘敌三万余人，扩大了根据地，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开始了中央苏区的全盛时期。

“第三次‘围剿’时的情况是：（一）蒋介石亲身出马任总司令，……（二）‘进剿’军三十万人。……（三）‘进剿’战略是‘长驱直入’，大不同于第二次‘围剿’之‘步步为营’，企图压迫红军于赣江而消灭之。（四）第二次‘围剿’结束至第三次‘围剿’开始，为时仅一个月。红军苦战后未休息，也未补充（三万人左右），又绕道千里回到赣南根据地西部之兴国集中，时敌已分路直迫面前。在上述情况下，我们决定的第一个方针，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富田一

点，然后由西而东，向敌之后方联络线上横扫过去，让敌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之地，定此为作战之第一阶段。及敌回头北向，必甚疲劳，乘隙打其可打者，为第二阶段。此方针之中心是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但我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被敌发觉，陈诚、罗卓英两师赶至。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回到兴国西部之高兴圩，此时仅剩此一个圩场及其附近地区几十个方里容许我军集中，集中一天后，乃决计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塘、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第一天乘夜通过了蒋鼎文师和蒋、蔡、韩军间之四十华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三天打上官师为第一仗，第四天打郝梦龄师为第二仗，尔后以三天行程到黄陂打毛炳文师为第三仗。三战皆胜，缴枪逾万。此时所有向西向南之敌军主力，皆转旗向东，集中视线于黄陂，猛力并进，找我作战，取密集的大包围姿势接近了我军。我军乃于蒋、蔡、韩军和陈、罗军之间一个二十华里间隙的大山中偷越过去，由东面回到西面之兴国境内集中。及至敌发觉再向西进时，我已休息了半个月，敌则饥疲沮丧，无能为力，下决心退却了。我又乘其退却打了蒋光鼐、蔡廷锴、蒋鼎文、韩德勤，消灭蒋鼎文一个旅、韩德勤一个师。”①

从毛泽东关于战役的简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一些基本思想，这时已经全面形成，（1）积极防御思想与攻防关系的辩证法。通过五次战斗或战役的进攻战，达到战略上防御（反“围剿”）的目的。（2）诱敌深入、避敌主力与敌我兵力变化的辩证法，在第一次反“围剿”战役时，红一方面军总部就下达了“诱敌深入赤色区域，待其疲惫

①《毛泽东选集》第202～203页。

而歼灭之”的命令，可见当时毛泽东诱敌深入的思想已十分明确。诱敌深入的目的在于分散敌之兵力和避敌主力，改变敌我强弱关系，即通过大规模的运动，使敌之兵力在空间上高度分散。并摆脱敌之主力，使其十个师只能以一个师对我，同时造成敌之疲惫、孤立、立足不稳和由强变弱，造成我对敌的战术优势和歼敌的有利时机。（3）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速战速决，各个歼敌。我主力始终保持集中，每战均在一天内解决战斗，整团整旅整师地消灭包围之敌。（4）初战必胜与局部全局关系的辩证法。从全局出发安排初战，保证初战旗开得胜，又以局部影响全局，使整个作战过程贯通一气，善始善终。（5）尊重客观与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辩证法。在敌情变化的情况下，及时放弃原计划，改变战术。通过主观能动性的高度发挥，在敌人眼皮底下和结合部东而复西，使敌人处处扑空，处处挨打，疲不堪命。总之，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基本思想在这次战役中都体现出来了。可以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以理论形态表述的东西，在这次战役中就已经以血与火的形式表述出来了。

四渡赤水战役是在比第三次“围剿”战役更险恶的环境下进行的又一次以弱胜强的典型战役。这次战役在军事上的意义，相当于遵义会议在政治上的意义，是一次挽救中国革命的关键性战役。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于一月二十九日西渡赤水河（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在四川与四方面军会合，并开辟新的根据地。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蒋介石调集一百五十余个团的兵力，对红军进行围攻，其以川军十二个旅在长江沿岸堵截，以薛岳兵团、黔军、滇军等部

共十一个师零四个旅由东、南向西、北急进至川滇黔边境，对我形成南北夹攻之势。红军根据敌人主力云集川黔边境，黔北敌兵力空虚的情况，突然掉头东进，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仅用五天时间，进行了遵义战役，在娄山关、遵义等地歼灭敌两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人，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大大增强了战役的主动性。是役后，蒋介石飞往重庆，亲自策划新的围攻，企图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南守北攻的战法，围歼红军于遵义、鸭溪地区。红军伪装在遵义徘徊，吸引敌人，在其重兵逼近时，转兵西进，于三月十六日三渡赤水，摆出渡江姿态。蒋介石急调各部聚集川南。当敌向赤水河以西集结时，红军秘密东渡赤水（四渡赤水）向南急进，渡过乌江，跳出敌人合围圈。尔后，红军以一部兵力向湖南方向移动，同时，主力直趋贵阳。飞到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大恐，急调滇军赶往贵州“保驾”，并调其主力向黔东开进，防止红军进入湖南。红军与滇军相对而进，经过兵力空虚的云南，在滇西北之绞平渡渡过金沙江，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战略大转移中的决定性胜利。四渡赤水战役包含了与第三次反“围剿”战役基本相同的思想内容。尤其突出的是，揭示了主观能动性和运动战在战争中的意义。根据敌情变化，以极大的自觉能动性调动敌人，是由被动转到主动地位的重要方法。是役第一次把敌人引向川南，在渡江不成的情况下，利用贵州敌兵力空虚，及时转兵东向，抓住战机歼敌一部，将敌吸向贵州，而后以佯动又将敌引向川南，主力则乘贵州空虚直趋贵阳，又以近逼贵阳，将云南之敌调出，而一仗未交过了云南，渡江北上。总之，靠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从强大的

敌人手里接过了主动权。运动战是这次战役在形式上的主要特点，而且在高度的运动中以空间换取了力量，使敌之优势消耗在无谓的运动中。

以上两次战役都是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它全面体现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基本内容，充分显示了辩证法在战争运动中的巨大威力。

2.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教训，从反面证明和丰富了战争运动的辩证法。

事物和思想，只有从它们的对立面才能得到关于自身的全面的规定性。作为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的，不仅有红军打胜仗的经验，而且也有红军打败仗的经验。他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就是从起义军进攻城市遭到失败的教训中产生出来的。而从反面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形成起了系统作用的，就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

一九三三年五月，蒋介石开始准备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经半年准备，调集一百万大军、二百架飞机、自任总司令，对各根据地发动全面围剿。直接用于进攻中央苏区的兵力达五十五万人。鉴于前几次的失败教训，蒋更加强强调“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方针，在军事上争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一九三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乘红一方面军分离作战之机，向黎川发动进攻，开始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在敌人准备新“围剿”的同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者则提出红一方面军实行分离作战，一部组成中央军，在抚河流域活动，一部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实行“两个拳头打人”。东方军酷暑远征，虽曾胜利，但损失重大，中央军也未能阻止敌碉堡封锁线的逐步完成。这种错

误战略的实行，丧失了准备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围剿”开始后，王明路线的领导者，拒绝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提出“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口号，企图收复被敌占领的黎川，并首先向白区之敌人巩固阵地攻击，结果十月九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先后发起三次进攻，均不克。冒险碰壁后，又实行处处设防，节节抵御的军事保守主义方针，在广昌至泰宁一线构筑防御工事，规定红军以阵地防御结合短促突击，迟滞敌人的进攻。十一月二十日，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并与红军订立抗日反蒋协定，蒋介石急调十一个师入闽，反“围剿”出现有利形势。但王明路线的领导者不懂得利用敌人内部矛盾，而认为“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揭露福建人民政府的“欺骗性”，致第十九路军孤军作战，而将红军主力调到西线进攻敌人堡垒阵地，同敌人拚消耗。一九三四年一月底，第十九路军完全失败，蒋介石将入闽部队组成东路军，进一步完成了对中央苏区的四面合围。同时红军的实际领导权被控制在错误领导者的手里，在敌人向广昌推进时，他们调集九个师的兵力保卫广昌，提出“不让敌人侵占寸土”，“胜利或者死亡”等拚命主义口号，使红军损失严重。七月，敌以三十一个师的兵力，从六个方向向根据地中心区全面进攻，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又采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方针，同敌人硬打硬拚，给敌人造成各个击破的机会。十月二十一日，红军发起突围战役，在逃跑主义的指导下，红军主力又开始了搬家式的转移，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终告失败。

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从主观指导上看，就是

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的失败。它全面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唯物辩证法的军事指导思想，而代之以军事主观主义、军事冒险主义、军事平均主义和军事保守主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当着敌人改变其军事原则使之适合于同红军作战的情况的时候，我们队伍中却出现了回到‘老套’的人们。他们主张回到一般情况的方面去，拒绝了解任何的特殊情况，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取的反动的新原则视若无睹。结果，是丧失了除了陕甘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降到了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降到了几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①这段话，揭露了错误军事路线的思想根源就是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机械论。这种错误的系统性和后果的严重性从反面深刻地证明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正确性，对于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由经验形态向理论形态的飞跃，起到了重要的启发和促进作用，这种作用几乎贯穿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全部内容中，所以，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经验在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遵义会议的《总结决议》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形成的意义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作出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②。对第五次以至对整个革命

^①《毛泽东选集》第171页。

^②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编》第三卷，第305～322页。

根据地进行反“围剿”斗争的经验和发生在反“围剿”时期的两条军事路线的大争论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而否定了错误路线的意见。”①《总结决议》的直接目的是清算和纠正王明路线的领导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的错误，然而，“消极的批判变成了积极的批判”，对错误的军事路线的揭露变成了以正误对比的形式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的军事理论和路线的正面叙述，因而成为系统地论述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第一部文献。《总结决议》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军事路线是特定军事领域内的方法论原则，是制定战略战术的思想基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既然主要是军事上的错误路线决定的，那么，纠正这一错误就必须开展军事思想上的斗争，用唯物辩证法的路线代替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路线。

《总结决议》详尽地比较了两条军事路线的对立，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基本点作了充分地说明。其（四）指出：“国民党蒋介石以及他的帝国主义的军事顾问等，经过四次‘围剿’失败后，知道用‘长驱直入’的战略战术同我们在苏区内作战，是极端不利的。因此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的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

①《毛泽东选集》第154页题注。

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这就使敌人持久战与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达到了他的目的。应该指出，这一路线，同我们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这段话对敌人的战略和红军内部两条军事路线进行了概括，指出当敌人由错误走向正确的时候，红军则由正确走向错误，在军事上把真理和主动权拱手交给了敌人。从积极防御路线的基本要点和消极防御路线的要害可以看出，两种军事思想体系对立的焦点就是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对立。其（五）进一步分析了两种防御及其作用对立的实质，提出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的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的防御。”说明了积极防御就是实现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统一的防御。“单纯防御可以相当削弱敌人力量，可以在某一时期内保持土地，但最终的粉碎敌人‘围剿’以保卫苏区是不可能的，最后胜利的前途是没有的。只有从防御转入反攻（战役的与战略的）以至进攻，取得决战的胜利，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粉碎敌人、保卫苏区，发展苏维埃革命运动。”指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积极防御的内涵之一。在内线作战下，当敌人以绝对的优势兵力向我们前进时，红军的退却与隐蔽，是以疲劳敌人，使敌人骄矜懈怠，发生过失与暴露弱点，这就是创造了转入反攻取得决战胜利的条件。……为了求得胜利，即使暂时放弃一部分苏区土地，甚至主力暂时离开苏区根据地，都是在所不辞的，因为我们知道，只要我们能够消灭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我们不但能恢复放弃的土地，而且还能够扩大苏维埃领土。”指出积极防御的进攻性决不是只进不退，

它不仅不排斥、而且要求必要的退却。指出了退却中用丧失土地换取消灭敌人，并换取恢复、扩大土地的辩证法。其（六）指出了集中优势兵力和各个击破敌人的必要性，论述了优势与劣势、外线与内线、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役）的辩证矛盾关系。“为了求得决战的胜利，在决战方面，集中优势兵力是绝对必要的。在目前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占优势，……然而这对于我们不是可怕的。由于敌人是处于外线，战略上采取包围和分进合击的方针，这就是成了我们各个击破敌人的机会，使我们在战略的内线作战下，能够收到战役的外线作战（局部的外线）的利益，即是以我军的一部钳制敌人的一路或数路，而集中最大力量包围敌人一路而消灭之，用这种办法去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围剿’。”其（七）指出“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是我们工农红军的特长。”批评消极防御路线“在目前技术条件下”，“常常轻易的强攻堡垒，其没有任何效果，是不足为怪，因为这是把战争当儿戏。”其（八）批判了“以为只有战术上的胜利，才能转变为战役上的胜利，然后由战役的胜利才能引起战略上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把局部和全局割裂开来的片面观点。其（九）提出“战争的持久战与战役的速决战”的思想，论述了保持有生力量的重要意义及其与保卫苏区的关系。指出“必须反对那种把保持有生力量与保卫苏区相对立起来的理论。……须知只有保持有生力量，我们才能真正的保卫苏区。”批判了不顾保存自己的拼命主义。指出要反对军事保守主义和军事冒险主义两种倾向。其（十）提出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思想。“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的内部裂痕，是我们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

是我们粉碎敌人“围剿”的重要战略之一。”

总之，《总结决议》第一次把反“围剿”斗争中以物化形态揭示的军事哲学思想以理论的形式表述了出来。所以，《总结决议》的产生，标志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也说明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总结革命战争正反经验的产物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三章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 的理论化和系统化

第一节 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总结与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成熟

一、革命战争转变时期的形势与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成熟的条件

毛泽东军事哲学的基本思想，在反“围剿”与长征时期已经形成。但是，作为一个理论体系的成熟（即理论化和系统化）是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以后，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过程中完成的。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是土地革命的后期，也是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过渡的时期。日本帝国主义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开始，向中国发动侵略战争，三个多月占领全东北。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又发动了对上海的进攻，从此，民族矛盾日益加剧。一九三五年，日寇又向华北地区发动新的进攻。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一方面对日寇消极妥协，一方面猖狂进攻红军，镇压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十二月十九日，北京爱国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掀起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在民族

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于十二月十七日召开了瓦窑堡政治局会议，确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军事战略方针。为巩固、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为抗日和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作准备。一九三六年二月至七月，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东征、西征作战。十月，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会宁等地胜利会师。十二月十二日，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抗日的“西安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促进下，得到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共同抗日的局面初步形成，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进行充分的准备。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曾占居统治地位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消极防御的军事路线，不仅导致了革命战争的失败，而且对红军的战略战术和指挥方法造成严重的影响，遵义会议后，错误的军事路线虽然在实践上基本得到纠正，但是，要使正确的军事路线掌握广大红军指挥员，并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还需要做极大的努力。另一方面，新的战争危机告诉人们，敌强我弱依然是未来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主要特点，如果不能树立正确的战争指导思想，就可能重新发生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的错误。虽然战争特点起了变化，但是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总结两条军事路线斗争的哲学教训，对红军指挥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哲学理论的教育，使之在新的战争中有一个科学的指导思想，仍然是一项十分严重和迫切的任务。这些任务和需要构成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成熟的重要动力。党中央和红军到达陕北，出现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这也为毛泽东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工作提供了条件。为了总结经验，训练干部，毛泽东在到达陕北以后，便以极大的努力进行理论工作，继续深入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和

中国古代的哲学、军事理论，先后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重要理论著作，使这一时期成为毛泽东思想体系的奠基时期，军事思想和哲学思想在这一时期首先成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军事理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成熟的标志

一九三六年秋开始，毛泽东在系统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军事理论的基础上，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并在陕北的红军大学讲授了这本书的内容。根据著者说，“本书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这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内在军事问题上的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①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的第一部成熟的军事理论著作，也是第一部成熟的军事哲学著作，它的发表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达到理论化和系统化的主要标志。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一部土地革命战争历史与军事哲学理论相统一的著作，它首先作为一部优秀的内战史论，对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总结，同时又从哲学的高度全面论述了战争和军事的基本问题，批判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军事观点，初步建立了军事哲学的理论体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得到了系统的论述，它通过揭

①《毛泽东选集》第154页。

示战争现象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地位，说明战争运动的条件和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创立了科学的战争历史观和战争胜负观；通过揭示战争运动的基本形式及其转化规律，说明战略战术的方法论基础，创立了科学的战争运动规律论和精湛的战争艺术论；通过揭示认识战争与指导战争的辩证过程，创立了科学的战争指导方法论。

三、成熟期的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特点

成熟期的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具有土地革命战争实践留给它的突出特点。

首先，战争的防御性质使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一创立就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土地革命战争在军事上的基本特点就是敌我力量强弱悬殊，并由此规定了整个战争的战略防御性质。毛泽东说：“十年以来，从游击战争开始的一天起，任何一个独立的红色游击队或红军的周围，任何一个革命根据地的周围，经常遇到的是敌人的‘围剿’。”“红军的行动，采取了反‘围剿’的形势。所谓胜利，主要地是说反‘围剿’的胜利，这就是战略和战役的胜利。……十年的红军战争史，就是一部反‘围剿’史。”^①他还说：“敌人是全国的统治者，我们只有一点小部队，因此，我们一开始就是和敌人的‘围剿’奋斗。我们的进攻是密切地联系于打破‘围剿’的，我们发展的命运全看我们能不能打破‘围剿’。……所以，战略防御问题成为红军作战中最复杂和最重要的问题。”^②这些论述说明，土地革命战争是防御性质的战争，战略防御构成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基本研究对象。而防御战争

^① 《毛泽东选集》第176—17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81页。

要胜利，就必须研究战役战斗的进攻问题和向战略的进攻转化的问题。所以，防御性的战争包含着比进攻性战争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多的辩证因素，如进攻与防御的辩证法只有在积极防御的形式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防御战争是一个庞大的矛盾体系，这就使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一创立就包含着丰富的内容。

其次，土地革命战争主要在南方的几块局部地区进行，空间范围的限制，使每次大战役与战略具有同一的意义，一次反“围剿”战役的成败，同时也意味着战略上的一次胜败，局部和全局密切联系，第五次反“围剿”战役的失败，即是红军和南方革命根据地的失败。这就决定了毛泽东对军事哲学的表述往往把个别与一般结合起来，通过个别说明一般，使其军事哲学思想的表述带上了生动具体的特色。

第三，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在总结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过程中成熟的，所以带有战史研究或总结性的特点。这种总结性，使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具有体系和内容上的高度完整性。战争现象的社会本质和历史地位，战争的客观运动与主观指导，都得到系统地说明，使军事哲学思想成为战争整体的理论化，而不是对战争问题的片面议论。完整的战争实践过程与系统的战争理论有机统一，使实践成为理论的客观基础，使理论成为实践的逻辑再现。胜利、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犯错误的教训互相映衬，从正反两面充实了军事哲学理论的内容。但是，由于仅仅是对一次战争的总结，对许多问题的哲学概括还比较抽象，一些基本概念的内涵还缺乏理性的具体。

第二节 科学、系统的战争观的建立

一、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的战争研究方法

建立科学的战争观，必须具有研究战争和军事问题的科学方法，解决好“如何研究战争”的问题。对此，毛泽东作了充分的论述，首先是一般与个别相统一的方法。他指出“我们应该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也应该研究革命战争的规律；最后，我们还应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因为，中国革命战争“在一般战争和一般革命战争的规律之外，又有它的一些特殊规律。如果不懂得这些，就不能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打胜仗。”^①这是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在军事研究中的具体化。毛泽东还批评“只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就得了”的观点是“削足适履”的方法。为了有效地研究个别战争的特殊规律，他又提出了“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的方法，指出：“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②这就进一步说明，一般与特殊的统一，应以特殊为基础，而不能以一般为基础，一般应服从特殊，为特殊服务。关于如何分析战争特点的问题，毛泽东引证列宁的话说：“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地情况。”^③毛泽东结合中国

① 《毛泽东选集》第1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57—15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71页。

革命战争的特点说明，对具体的情况进行具体地分析，就是要分析具体战争内部的特殊矛盾。他分析土地革命战争的特殊矛盾说：“经过了一次大革命的政治经济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强大的敌人，弱小的红军，土地革命——这是中国革命战争四个主要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这两方面同时存在着，即是说，既有顺利的条件，又有困难的条件。”^① 这里用矛盾分析的方法，把四个特点概括为一对矛盾，即“中国革命战争的两方面，”从而抓住了战争的本质。这些方法是统一的和层层深入的，从战争规律的一般与特殊的统一，到着重分析战争的特点，从一般地分析战争特点，到分析战争的特殊矛盾。毛泽东运用这种科学的思维方法，从理论根源上彻底清算了机会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建立了具有中国革命特色的、科学的军事哲学体系。

二、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本质观

毛泽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揭示了战争的起源、本质和历史地位。首先，他把私有制、阶级和阶级斗争看成战争现象的基础，说明战争的起源和本质。他说：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斗争形式。^②

^① 《毛泽东选集》第17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5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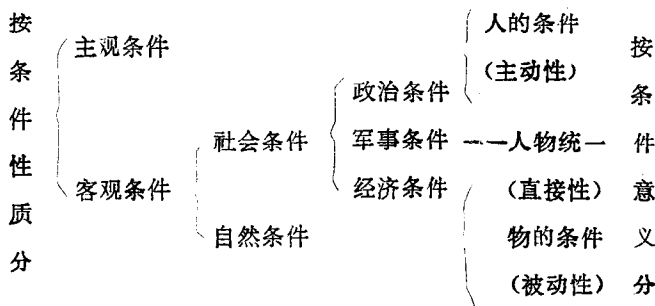
把私有制和阶级作为战争发生和发展的根源，就是把战争现象的发生归之于社会经济基础的内在矛盾，从而使战争的本质和历史作用得到了科学的说明。其次，他揭示了战争的社会性质的矛盾性。揭示了战争的历史作用和用战争反对战争的辩证法。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只有通过革命战争，才能消灭一切战争。消灭战争是我们进行战争的目的。最后，他指出消灭阶级和消灭国家是消灭一切战争、实现人类永久和平的历史前提。从而与战争起源的理论基础相统一，说明了战争现象的历史地位。他说：“人类社会进步到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国家，到了那时，什么战争也没有了，……这就是人类的永久和平的时代。”①“解铃还须系铃人”，战争既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彻底消灭战争当然就必须首先消灭阶级。总之，毛泽东的战争本质观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在战争问题上的具体化。

三、全面的、综合的战争条件论

战争的胜负条件问题是战争观的重要方面和进一步具体化。全面性和综合性是毛泽东战争条件论的主要特点。战争条件论与战争胜负观是统一的，战争运动的条件就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在战争条件问题上，长期存在着全面、综合的观点与片面、静止的观点的对立。这也是土地革命战争中在胜败问题上的主要教训之一。单纯军事观点就是只看到战争的直接条件即军事条件，而看不到战争的社会政治条件和群众条件。第五次反“围剿”战役中，错误路线的领导者到处去进攻敌人同敌人搞阵地战，就看不见根据地的地理条

①《毛泽东选集》第158页。

件、群众条件的意义，看不见战争指导上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意义，而拒绝利用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给红军带来的有利条件，又是看不见来自敌军内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毛泽东关于战争条件的早期思想中就有全面、综合的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则对此作了理论上的概括。他指出：“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① 据此，可以对战争的条件作出一个简要的分类：从条件自身的性质看，可分为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客观条件中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社会条件中又包括政治条件和经济条件。从条件在战争运动中的意义看，战争条件又可分为人的条件（主动性条件）和物的条件（被动性条件），前者包括主观条件和政治条件，后者包括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军事条件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或统一，也是人与物的结合或统一，是战争运动中最直接的条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6页。

这些条件，综合地表现在战争、战役以至单兵行动等战争运动的各层次和各方面。战争的胜败，就是这些条件的综合结果。这种全面、综合的战争条件论，是唯物辩证法全面、联系的观点在战争胜负观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在对战争条件进行全面分析中，特别强调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他说：“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观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①这段话生动而又科学地说明了战争运动中客观规律、物质条件与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这一点，在后来的《论持久战》中，作了更加充分而深入的论述。

以上内容说明，毛泽东关于科学战争观的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已明确地以理论的形式表述出来了。

第三节 以弱胜强的辩证法与战争 运动理论的系统化

一、以弱胜强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核心

以弱胜强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根本特点，也是毛泽东关于战争运动的辩证法的核心内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紧紧围绕这一特点。对战争运动中各方面的辩证法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以弱胜强作为一种战略方针，是以敌强我弱的战争形势为基础的。毛泽东把“敌人的强大”和“红军的弱小”作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四个特点的两个，并指出这两个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6页。

特点规定了战争的持久和可能的失败。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中国革命战争必须走以弱胜强的道路。红军的各种战略战术都是根据这个根本的战略要求制定出来的。以弱胜强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要求，这个战略要求是通过战略与战术之间、即全局与局部之间的一系列矛盾转化关系来实现的。这些关系，就构成了毛泽东战争运动理论的基本内容。

二、以“积极防御”为核心的进攻与防御关系的辩证法

进攻与防御是战争运动的两种基本形式，二者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和互相包含。“积极防御”思想正是根据这种攻防之间的矛盾关系提出来的。毛泽东指出：“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①这说明，“积极防御”是一个包含着矛盾的具体概念，防御内部包含着自己的对立面——进攻。防御的积极性质是从对立面——进攻中得到规定的。毛泽东批判了“只知进攻不知防御”和“消极防御”两种形而上学的攻防观。他说：“敌强我弱，原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可是人们不愿意想一想，一味只讲进攻，不讲防御和退却，在精神上解除了防御的武装，因而把行动引到错误的方向。许多游击队因此失败。了”^②这里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说明了单纯进攻或“战略进攻”论的错误，他们在理论上不懂得积极地战略防御是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是以弱胜强的战略方针所需要的，因而在行动上失败了。因为攻防关系是受强弱关系制约的，攻防关系在战略上的改变，“依靠于敌我力量的总的变动”。在“红军的力量

①《毛泽东选集》第18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81—182页。

超过了敌人时，那么，一般地就用不着战略防御了。那时的方针只是战略的进攻。……到了那时，剩下的防御手段，只是局部的东西。”①毛泽东还说：“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这是战争中的过失。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我们应该坚决地反对它。”②这里指出了消极防御的理论根源“是保守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并通过古今中外的军事思想说明，保守主义即形而上学的思想与战争运动是水火不容的。总之，单纯进攻和单纯防御的观点都是用孤立、静止的观点观察攻防关系的结果，只有积极防御的观点才正确地揭示了攻防关系的辩证法。而要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就必须采取集中兵力打开灭战的方法。

三、以集中兵力打开灭战为核心的兵力使用及战果要求的辩证法

战略上即全局上的强弱关系是客观存在的，但这种强弱关系在各个局部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主观的努力加以改变的。战略上的以弱胜强，正是通过战役战斗的以强胜弱而实现的，善于集中兵力就是实现战役战斗中以强胜弱的根本方法。只有集中使用兵力，才能造成在局部地区对敌的绝对优势，争取作战的主动权。毛泽东说，“主动地位不

①《毛泽东选集》第18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82—183页。

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是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要在防御战争中争得主动，集中兵力在诸多条件中“是首先和主要的”①。在这里可以说，坚持集中兵力，就是坚持战争运动的唯物论，因为军队是战争中最直接、最主要的物质基础。毛泽东说：“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是为了改变敌我的形势。”“第一，是为了改变进退的形势。”“第二，是为了改变攻守的形势。”“第三，是为了改变内外线的形势。……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的许多个别的小围剿。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进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将自己战略上弱者的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②从哲学角度讲，集中兵力就是改变敌我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的主观条件。

要集中使用兵力，就必须批判和克服平分兵力的“军事平均主义”。根据红军战争史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尤其要注意在实践中克服平均主义，他说：“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

① 《毛泽东选集》第206—20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07—208页。

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①毛泽东对分散兵力的问题不是简单地加以指责，而是重在分析分散兵力的认识论根源和主、客观原因，以帮助指挥员克服“军事平均主义”的毛病。

集中兵力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所以集中兵力从战果要求上看，就是歼灭战。毛泽东说：“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②弱军对强军实施歼灭战是最困难的，然而又是最必要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的“‘拚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只有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打破‘围剿’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因给敌以杀伤而给我以消耗。又因给敌以歼灭而给我以补充，这样就不但抵偿了我军的消耗，而且增加了我军的力量。”③可见，歼灭战在以弱胜强的战争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只有歼灭战才能消灭敌人，只有歼灭战才能壮大自己，一句话，只有歼灭战才能根本改变战略上的敌强我弱的形势，达到以弱胜强的目的。

“集中优势兵力”和“歼灭战”在理论上是以“有生力量”这一概念为基础的。有生力量就是有活力的军队，它既是战争运动的主体、又是战争运动的对象，战争运动在本质上就是有生力量的运动。有生力量是战争运动的生命力所

①《毛泽东选集》第20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2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20页。

在。集中优势兵力，就是充分调动和活跃我之有生力量，打歼灭战，则是翦灭或否定敌之有生力量。紧紧抓住有生力量这个概念，是军事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之一。

四、以运动战为核心的人地得失关系的辩证法

实行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方法，需要具备其他方面的必要条件，其中基本的条件就是空间的条件和时间的条件。从空间形式看，就是要明确以运动战为核心的人地得失关系的辩证法。事物的变化是在运动中实现的，弱军要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也只有在高度的运动战中才能找到时机和创造出条件，运动战是以弱胜强的重要条件。运动战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作战方向与作战线的不固定。而“作战线的不固定，影响到根据地领土的不固定。时大时小时缩时伸是经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发生。这种土地的流动性，完全来源于战争的流动性”^①，承认领土的流动性，就必须正确地看到领土的得失问题，而要正确看待土地得失关系，首先又必须正确地看待人地得失关系。人与地相比，人是主要的，失地往往是为了保存人（即有生力量），或者为了消灭敌人（敌之有生力量）而保存了人，就能最后地得到或保住土地。土地的得失关系是以人地得失关系为内容的。毛泽东说：“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加扩大土地，这样赚钱生意。……我们在敌人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蚀本正因为这一点。不愿意丧失一部分土地，结果丧失了全部土地。”这里，充分揭示了土地得失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死守土

^① 《毛泽东选集》第212—213页。

地的军事保守主义造成的严重后果。另外，还有走与打、运动战与阵地战、游击主义的局限性和必要性等辩证关系，通过这一系列关系，具体地说明了运动战的内在的矛盾性和它对于实现以弱胜强的战略目的的重要意义。关于走与打的辩证关系，毛泽东指出：“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的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在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首先承认必须的打的条件之下。”^① 这里说明运动战概念所包含的基本矛盾就是走与打的关系，而核心是一个打字。“不好打的情形”就是走的理由和根据，走的目的就是要把不好打的情形变为好打的情形。以上所谓“不好打的情形”，都是不利于歼灭战，走的目的就是为歼灭战创造条件。阵地战是运动战的对立面，运动战与阵地战的关系是理解运动战概念的又一个基本问题。运动战与阵地战相比较，具有“游击主义”的性质，但这种“游击主义”在敌强我弱的形式下是必要的。阵地战是作战的高级形式，所以，“基本的是运动战，并不是拒绝必要的和可能的阵地战。”运动战还要准备发展到以阵地战为主的高级阶段去。从运动战的理论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关于作战形式的研究，既坚持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根据敌我关系的基本特点，反“围剿”时期以运动战为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214页。

以游击战和阵地战为辅的各种作战形式的横的联系，又坚持了历史地发展的观点，看到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之间的历史、纵向的联系。

五、持久战与速决战的辩证关系

从时间形式上看，以弱胜强的战争则需要处理好持久与速决的关系。以弱胜强的战争要求在战略的防御中进行战役与战斗的进攻战，这种要求表现在时间形式上就是在战略的持久战中进行战役与战斗的速决战。毛泽东指出：“战略的持久战，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这是一件事的两方面，这是国内战争的两个同时并重的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①毛泽东从历史发展观的高度揭示了国内战争中战略持久的原因：“因为反动势力的雄厚，革命势力是逐渐地生长的，这就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②他批评了在战略上“灭此朝食”的急性病。另一方面，他又从历史与现状两个方面说明了战役战斗上争取速决的道理和在特殊情况下采取持久方针的必要性。毛泽东特别重视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所需要的具体条件：“主要的条件是准备充足，不失时机，集中优势兵力，包围迂回战术，良好阵地，打运动中之敌，或打驻止而阵地尚不巩固之敌。不解决这些条件，而求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是不可能的。”③这也说明了坚持唯物辩证法的联系观点和条件论。最后，他还论述了力求速决与反对急躁的关系。

总之，“以弱胜强”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核心内容。它作为一个概念，不仅揭示了以强胜弱这一战争运动的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21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218—219页

一般的、抽象的规律，而且揭示了以强胜弱这一战争运动的特殊的、具体的规律。在“以弱胜强”的概念中，包含着军事辩证法的一切要素。毛泽东不是简单地去给“以弱胜强”下定义，也不是抽象地去论证“以弱胜强”的哲学意义，而是重在揭示实现以弱胜强的条件及其内在联系，从而使以弱胜强中包含的全部辩证法要素充分地展现开来，实现了战争运动理论的系统化。

第四节 以解决主客观矛盾为中心的 战争指导方法论的形成

一、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战争指导中的基本矛盾

指导战争与解决战争中的主客观矛盾是对同一个意义的不同表述。毛泽东说，“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事情要求比较地会办，军事上就要求比较地多打胜仗，反面地说，要求比较地少打败仗。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① 这里指出了主观与客观的矛盾是战争指导（即认识战争与实行战争）中的基本矛盾。指导战争的基本任务，就是要“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且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② 也就是要解决上述的基本矛盾。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62页。

关于战争运动中主客观矛盾的含义和内容，毛泽东作了精辟的概括：“军事的规律，和其它事物的规律一样，是客观实际对于我们的头脑的反映，除了我们的头脑外，一切都是客观实际的东西。因此，学习和认识的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①强调客观对象包括敌我两方面，说明了战争活动中主体的内在矛盾性，说明了实践主体与认识（研究）主体的区别。与“敌”相对应的“我”，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既是实践的主体，又是认识的对象。这一观点，大大提高了关于“主客观矛盾”概念的准确性。

毛泽东还指出了战争中主客观矛盾的特点。他说：整个战斗中主观指挥和客观情况“统统相符合的事，在战争或战斗中是极其少有的，这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双方是成群的武装着的活人，而又互相保持秘密的缘故，这和处置静物或日常事件是大不相同的。”②这一特点说明，战争中主客观之间的矛盾对立是异常尖锐的，它对人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的辩证过程

关于战争中主客观矛盾的论述，为正确地认识战争和实践战争奠定了理论基础。但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抽象地说明什么是战争中的主客观矛盾，而在于怎样地解决这一矛盾。为此，毛泽东第一次系统地论述了认识战争与指导战争的辩证过程：“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

①《毛泽东选集》第165—16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63页。

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和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①总之，认识活动不仅发生于作战行动之前，而且贯穿于整个作战行动的始终。整个认识过程建立在战争实践的基础之上，并与战争实践相统一。认识在实践基础上由感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再依据认识形成计划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继续得到检验，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毛泽东关于战争指导中认识辩证发展的基本观点，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重大贡献，这一思想，构成了他后来写的哲学名著——《实践论》的雏型。

正确地认识和指导战争，不仅需要明确认识战争的辩证过程，而且需要运用科学的思维方法保证这个过程的完成和发展。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如何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十六字”抽象法，而且大量地运用了矛盾分析法，如关于土地革命战争特点的矛盾分析，关于战争运动中强弱关系、攻防关系、进退关系、得失关系等方面的矛盾分析等。在实践基础上有了科学的思维方法，战争指导就有了基本的把握。

^①《毛泽东选集》第163—164页。

三、战争实践对战争指导能力的决定作用与战争实践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不仅把解决主客观矛盾的过程看成一个认识在实践基础上辩证发展的过程，而且十分重视知识和能力对解决主客观矛盾的意义。实践决定着人的认识，也同样决定着人的知识和能力。毛泽东说：“做一个真正能干的高级指挥员，不是初出茅庐或仅仅善于在纸上谈兵的角色所能办到的，必须在战争中学习才能办得到。”在指导战争中比较的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期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果。这一认识过程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种长期的经验，要了解和把握整个战争的规律是困难的。所以，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①毛泽东并不否认间接经验。即前人和他人的流血经验的重要性，但是他认为要“从自己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

指导战争，不仅有认识问题，而且有实践的问题。在战争实践即实行战争的问题上。除了战争运动的辩证法思想外，毛泽东还提出了一系列基本的作战实践原则，其中主要有“充分准备”、“慎重初战”和“主动地位”。这是对于一切战争实践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的三条方法论原则。关于准备，毛泽东说：“对于敌人的一次有计划的‘围剿’，如果我们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准备，必然陷入被动地位。临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5页。

时仓卒应战，胜利的把握是没有的。”① 准备是从战争认识向战争实践过渡的中间环节，没有充分准备，即使有了对敌我情况的正确认识，也不能在现实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反‘围剿’斗争胜利的程度，是和准备阶段中任务完成的程度密切地联系着的。”关于慎重初战，毛泽东说：“第一个战斗的胜败给予极大的影响于全局，乃至一直影响到最后的一个战斗。因此得出下述的结论”：“第一，必须打胜，必须敌情、地形、人民等条件，都利于我，不利于敌，确有把握而后动手。”“第二，初战的计划必须是全战役计划的有机的序幕。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才算败了。……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第三，还要想到下一战略阶段的文章。……那种走一步看一步的指导方式，对于政治是不利的，对于战争也是不利的。……退却阶段时必须计算到反攻阶段，反攻阶段时必须计算到进攻阶段，进攻阶段时又须计算到退却阶段，没有这种计算，束缚于眼前的利害，就是失败之道。”② 由此可见，慎重初战的原则，实质上是作战指导上照顾全局的原则。之所以慎重初战，就是因为初战或序战是一个影响全局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局部，初战的意义不在初战本身，而关系着整个战役以至战争的全过程。所以，不能把慎重初战仅仅理解为初战必胜，因为仅仅必胜，只能产生对敌我军队在心理上的震撼或鼓舞作用，而慎重初战的意义更主要的是战争计划和战争进程的影响。关

① 《毛泽东选集》第18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04—206页。

于主动地位，毛泽东说：“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的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①这里不仅说明了主动地位的重要性，而且说明了主动地位的客观性和保持主动地位的根本条件。主动性是军队的生命，而实现主动性的物质杠杆又是军队自身。所以，主动性从客观上看，就是有生力量即军队在战争中具有多大的活力与自由。从主观上看，则是指挥员的主观意志能在多大程度上支配战争运动，或对自己的军队有多大的自主能力，以及对敌人的军队有多大的左右权（“拨动敌人的算盘”）。在战争实践中，解决好了准备、初战和主动的问题，正确的认识就能充分发挥其作用，避败求胜的目的就比较容易达到了。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成熟期就是它达到理论化和系统化的时期，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战争观、战争运动规律论和战争指导方法论都系统地提出来了，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作为一个理论体系已经完成。

① 《毛泽东选集》第206页。

第四章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 的发展和具体化

第一节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具体化 的条件和代表著作

一、抗日战争的特点与军事哲学思想具体化的条件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理论上的具体化是以抗日战争的伟大实践为客观基础的。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至一九四五年九月二日，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时期，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反侵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以北平西南芦沟桥中国驻军对日寇的进攻奋起抵抗为标志，抗日战争爆发，抗日战争先后经过战略防御、战争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一九三七年七月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由华北、东南和华南向中国展开全面进攻，蒋介石采取消极抵抗政策，日寇先后攻战太原、上海、南京、徐州、武汉、广州等城市和大片中国国土。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八月在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先后改编红军为八路军、新四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八月至九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和一二九师先后出师，开赴山西抗

日前线，开展游击战争，并于太原失陷后，挺进华北平原，创建和发展了晋察冀、晋西北和晋冀豫等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也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开赴华中敌后，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第二阶段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到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日寇将主要力量用于进攻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八路军、新四军担负了抗日的主要任务。于一九二八年至一九四〇年，粉碎了日寇的“扫荡”、蚕食和封锁，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在敌后抗日最艰苦的时期，于一九三九年一月，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领导陕甘宁边区和晋冀豫区的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进攻。一九四〇年冬，日寇为准备太平洋战争，巩固其南进后方，英美为利用中国牵制日本，均对蒋介石采取利诱政策，蒋介石乘机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于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皖南事变”，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了坚决反击，巩固了抗日统一战线。抗日军民经过复杂的、艰苦的斗争，渡过了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第三阶段从一九四三年一月到一九四五年九月，八路军、新四军积极贯彻敌进我进方针，恢复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同时经过整风、大生产和军事、政治大整训，为大反攻做好了准备。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美军攻战冲绳，具备了进攻日本本土的条件。八月八日，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二十日东北解放，八路军、新四军举行战略大反攻，九月二日，日本被迫在投降书上正式签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抗日战争中抗击了百分之六十以上的侵华日军和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伪军，同时使自己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从而为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的特点，构成了军事哲学发展的极为有利条件。第一，抗日

战争是一场具有广泛的国际联系的全国规模的战争，它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既要研究敌后战场，又要研究包括国民党正面战场在内的全国战争形势；既要研究中国方面，又要研究日本方面；既要研究中日战争，又要研究整个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这样，对战争的认识就会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第二，抗日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参加战争的社会成份也极为复杂，使抗日战争成为一个庞大的社会矛盾体系，以往战争中主要是由敌我双方构成一对矛盾，而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的则是由敌伪、顽，我三方构成的三对矛盾，我既要同日、伪军作战，又要同反共顽固派进行反磨擦斗争。这样，战争与社会政治的本质联系就以更丰富具体的形式展现出来。同时，敌强我弱的严重形势，又使战争的军事性质十分突出地表现出来，这都为战争观和战争概念的具体化提供了条件。第三，抗日战争使凭借着不同物质基础的各种战争运动形式，同时展开并互相联系，如正规战争与游击战，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军队作战与群众作战，以及各种地形、各种技术条件下的作战等，都以具体的形式全面地揭示了战争运动中的各种矛盾关系及运动规律，这又为战争运动理论的具体化提供了条件。第四，抗日战争必然引起民族关系和阶级关系的大动荡，人们在战争中的利益冲突又必然地反映在对战争的认识和看法上，引起军事思想的大争论。这些争论，无疑是科学的军事哲学理论进一步完善、发展的巨大动力。如坚持抗战与妥协投降的争论，全面抗战和片面抗战的争论，持久取胜与亡国论、速胜论的争论，积极防御与消极防御的争论，都给军事哲学提出了新的问题，并作为新的动力，促使军事哲学的研究不断深入。总之，上述条件使军事哲学从不同角度遇

到了一系列新矛盾，军事哲学的具体化，就是这一系列矛盾关系以理论形式的展开。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的实践活动和一九三七年以来的理论研究成就，也是他的军事哲学思想完善化和具体化的重要条件。毛泽东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最主要的领导人，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的重要的战略家和指导者。他在战争实践中的特定地位，使他能够从最高和最近两种角度上观察和认识战争，从而使他对战争的感性知识更加丰富、全面，成为完善和发展军事哲学思想的经验基础。另外，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已经成为理论上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实践论》和《矛盾论》等哲学著作为他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大大增强了他对战争的洞察力和概括力。抗战爆发前后，毛泽东还大量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中外战争史和军事思想史，丰富了军事哲学的专业基础知识。在实践观察和理论研究的同时，毛泽东同抗日战争问题上的各种错误思想进行了积极的争论，并在批判错误的战争理论的过程中，把军事哲学的已有理论与新的战争经验熔入一炉，经过逻辑的锤炼，使他的军事哲学思想达到了高度完善化和具体化的程度。

二、军事哲学著作的繁荣与《论持久战》在军事哲学思想具体化中的意义

由于前述的主客观条件，抗日战争时期成为毛泽东军事哲学论著最繁荣的时期，不仅在许多著作中都包含着丰富的军事哲学思想，而且，毛泽东的四部著名的军事理论和军事哲学著作，有三部是在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九三八年一年之

中写成的。这三部著作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均完成于一九三八年五月，这是仅凭十个月战争经验就揭示出整个抗日战争发展规律的两部天才著作，是实践精神与科学思维结合的硕果。如果把这两部著作与八年抗日战争的实践过程加以对照，似乎它就是抗日战争这场活剧的导演剧本。《战争和战略问题》从分析国共两党的战争史入手，具体地阐明了战争的社会历史作用问题，尤其是战争与革命的关系，批判了在革命战争问题上的右倾机会主义观点，说明了研究战略和战争理论的意义和方法。

《论持久战》是毛泽东军事哲学的代表著作，它发展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军事哲学思想，也概括地包含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抗战时期其他军事著作中的军事哲学思想；它不仅系统地阐述了军事哲学的基本内容，而且充分地揭示了军事哲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的内在矛盾性，使军事哲学的理论内容在整体上达到理性具体的高度。《论持久战》对于军事哲学理论具体化的意义，不仅表现在它的思想内容上，而且表现在它的逻辑结构上。第一，它把“抗日战争”作为一个典型的个别，寓军事哲学的一般原理于其中。因此，它既是一部指导现实的抗日战争实践的具体纲领，又是一部全面、具体地论述军事哲学原理的经典论著。第二，它运用由抽象上升到具体、历史的与逻辑的相统一的逻辑方法，使理论内容的具体化得到明确表述，如从“抗日战争”这个较抽象的概念开始，进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这个指出了战争的两方面及其构成矛盾的时代条件的较具体的概念，再通过

对战争各方面内部的矛盾分析和对敌我双方的综合,得出了“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战争”这个包含着四对矛盾的更具体的概念。在此基础上,又得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个矛盾统一的具体结论。然后,又通过对中日特点的质的分析使“必胜”的结论具体展开,通过对中日特点的量的分析使“持久”的结论具体展开。然后,又由对战争认识的矛盾分析进到对战争实践的矛盾分析,使中日战争这一对矛盾展开为由一系列矛盾构成的庞大体系,这一“抗日战争”概念由抽象到具体的不断推进的过程,既是抗日战争由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解决、由认识战争到实行战争、争取胜利的历史过程;又是从战争概念到战争性质、战争形式、战争规律和战争条件等一系列军事哲学范畴的逻辑过程。第三,《论持久战》确立了以战争认识论为轴心的军事哲学体系。《论持久战》全文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回答“为什么是持久战”和“为什么最后胜利是中国的”,“大体上都是说‘是什么’和‘不是什么’”,解决对抗战的认识问题,即在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通过辩证的逻辑思维,实现了客观见之于主观的目的。第二部分回答“怎样进行持久战”、“怎样争取最后胜利”,“转到研究‘怎样做’和‘不怎样做’的问题上”解决抗日战争的实际问题。即把正确的认识变成正确的实践方法,解决如何使主观见之于客观的问题。总之,这种体系结构同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相统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完全一致的。这种以认识为轴心的体系,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已经有了雏型,而在《论持久战》中最后完善起来了。第四,矛盾分析法贯穿于全文的始终,矛盾分析法

的运用是毛泽东军事哲学著作的共同特点，然而在《论持久战》中则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成为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运动的内容和主要杠杆，而且同分析与综合的方法相统一。在这里，矛盾分析法已经不是简单指出矛盾的两方面，而是着重说明矛盾的质的特殊性和量的不平衡性，以及各种矛盾之间的系统性和矛盾运动的条件性。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是抗日战争中敌我之间的基本矛盾，整个《论持久战》就是一部由这些基本矛盾产生并统帅的一系列矛盾构成的矛盾系统论。总之，逻辑结构和逻辑方法上的成就，使《论持久战》成为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具体化的标志，同时也成为一部辩证逻辑的典范著作。据说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论持久战》是他的军事理论著作中最好的一部。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军事哲学论著，尤其是《论持久战》充分说明，毛泽东军事哲学理论在系统化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大步，达到了理论具体化的高度，《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较抽象的概念和论点所包含的内在矛盾性和一切潜在的方面，都被充分地揭示出来了。理性的具体不仅高于感性的具体，而且高于理性的抽象，但由于它源于感性的具体，并以理论形式全面地、本质地再现了感性的具体。所以，它离感性的具体不是更远，而是更近了。这就是理性的具体可以用带有感性色彩的语言表述出来，在其作为方法出现时，尤其是这样。这绝不是把理性具体降到了感性的具体，而是使理性具体的表述更加通俗。总之，军事哲学思想具体化的标志，在于理论的内在矛盾性的展开，而不在于表述它的语言和形式。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另一特点，就是它在指导战争的过程中现实化。与成熟期的总结过去的特点不同，完善发展期的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主要成就，是抗日战争初期的一九三八年，是应抗日战争实践的需要而产生的，具有明确的直接指导战争实践的目的，起着“开来”的作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与《战争和战略问题》，都是培养抗战指挥员的重要教材，而且很快从延安传到各抗日根据地，成为各级干部指导抗战的理论武器，并在人民抗战中得到现实化。

第二节 战争研究方法 with 战争观的具体化

一、战争研究方法的完善化与具体化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战争研究的方法论问题虽已提出，但还不够全面、具体，当时主要是针对军事上的教条主义和机械论的思想强调研究战争的特殊性，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对研究战争的方法论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全面、具体的论述，他说：“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是一切错误观点的认识论上的根源。他们看问题的方法是主观的和片面的。或者是毫无根据地纯主观地说一顿；或者是只根据问题的一侧面，一时候的表现，也同样主观地把它夸大起来，当作全体看，……因此，反对战争问题中的唯心论和机械论的倾向，采用客观的观点和全面观点去考察战争，才能使战争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① 这里，毛泽东从哲学基本问题和发展观基本问题的高度，从认识论根源上，说

^① 《毛泽东选集》第414~415页。

明战争研究方法问题上的基本矛盾，即“主观性和片面性”同“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的对立，前者就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方法，后者则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方法。“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看起来简单，但它作为研究战争的方法论，则在科学性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了全面性和具体化。“客观的观点”就是唯物论的方法。“全面的观点”就是辩证法的方法。它们浅显而具体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对人们认识和实践活动的基本要求。在抗日战争时期，战争研究方法不仅被作出明确概括，而且更广泛、更明确地运用于战争研究之中。《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都是从客观、全面地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开始的，在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争之所以“从战术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正是由于“处在进步时代”的“大而弱的国家”这个基本国情发生作用的结果，《论持久战》把中日国情概括为四对矛盾，并以此为“根据”，彻底驳倒了亡国论和速胜论，也是坚持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的结果，《战争与战略问题》中通过揭示出战争与阶级、革命互相依赖的关系，说明共产党坚持武装斗争，研究战争，注重军事的重要性，是更深入地坚持了客观、全面的观点，因为它不仅看到了中日之间的矛盾，而且看到了抗日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的阶级矛盾；不仅看到了当前的抗日战争，而且看到了抗日战争之后的人民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军事著作中，凡有思想分歧的问题，都注重揭示其分歧的方法论根源，如《论持久战》中在驳斥亡国论和批评速胜论时指出：“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

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①“然而速胜论者也是不对的，他们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了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往往这里也是主观性和片面性作怪。”^②毛泽东在批驳“唯武器论”时指出：唯武器论“是战争问题中的机械论，是主观地和片面地看问题的意见。”^③还有在计划性问题上批评战争“机械主义”和“战争相对主义”等，客观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的方法论，没有它，就不可能有军事哲学在其他方面的成就。

二、对战争本质二重性的揭示与战争概念的具体化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揭示了战争现象与私有制，阶级斗争之间的根本关系，指出了战争现象的历史地位和基本类型，确定了科学的战争本质观，但是，当时关于战争本质的理论还主要是对战争社会本质的研究，而对战争自身运动的本质尚未作出明确的概括。所以战争本质观还处在内容与形式相脱离的、较为抽象的程度。在《论持久战》中，战争的社会本质得到了更明确的表述。毛泽东指出：“这次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已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发展的基础上发生的，由于这种总危机，逼使各资本主义国家走入新的战争，首先逼使各法西斯国家从事于新战争的冒险。”^④“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要把战争延长到无尽

①②《毛泽东选集》第425～42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37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43页。

期，我们则要把战争在一个不很久远的将来给以结束。……这种希望不是空的，全世界社会经济的行程已经接近了这一点，只须加上多数人的努力，几十年工夫一定可以达到目的。”①这里把帝国主义时代的经济基础看成是战争规模空前扩大的根源和最后消灭战争、实现永久和平的根据条件。毛泽东还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但是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②“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③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关于战争与政治的关系的论述就更加具体化了，并且揭示了战争与革命的密切关系。毛泽东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④他说，蒋介石看军队如生命，在抓军事的问题上，他是我们的先生，共产党员要争党和人民的兵权。“我们是革命战争万能论者，……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⑤把以上的论述概括起来，就是：经济是战争的根源，战争是

①《毛泽东选集》第44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46、447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4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503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512页。

特定的经济关系的产物；政治是战争的社会内容，战争是政治以特殊手段的继续。这是对战争的社会本质的进一步明确的概括。这样明确的概括，是毛泽东深入研究列宁的战争观和关于帝国主义战争的理论的结果，也是他研究抗日战争实践的结果。然而，更重要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看到了战争本质的二重性，并揭示出了战争的军事本质。

毛泽东看到，仅仅对战争社会本质的说明，还不是对战争本质的完全意义上的说明。因为，战争的本质不仅指由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构成的战争的社会内容和社会目的，而且还有另一方面，即它是政治的“特殊手段”、“暴力”。它是“流血的政治”，它“即不等于一般的政治。”这就是说，战争还有它区别于其他社会政治形式的特殊本质，即军事意义上的本质。只有弄清这种特殊的本质，才能建立起完整的、具体的战争本质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党内的机会主义者就是由于只肤浅地知道战争的社会政治性质，而不懂得战争的军事性质，只知进攻，不知防御，结果造成了革命武装的重大损失。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革命和革命战争是进攻的”这一论断，“在政治上说来可以是对的（指对某一种情况而言——引者注），移到军事上就不对了。”^①这里他已经看到了战争的政治本质与军事本质的不同。而且他也提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的问题。但是，他明确论述战争的军事本质及其与社会本质的关系，则是抗日战争时期的事情，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充分论述了战争的社会本质和军事本质的关系，第一次把战争的军事本质明确地概

^①《毛泽东选集》第130页。

括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关于战争的军事本质同社会本质的区别，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战争的目的”一节说：

“这里不是说战争的政治目的，……这里说的，是作为人类流血的政治的所谓战争，两军相杀的战争，它的根本目的是什么，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① 这里说的战争的两种目的，也就是战争的两种本质。这两种本质是区别的，然而又是联系的，关于两者的联系，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说：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原则“在革命战争中是直接地和基本的政治原则联系着的。例如中国抗日战争的基本政治原则即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在军事上实行起来，就是以军事力量保卫祖国，驱逐日寇，为达到这个目的，在军队本身的行动上，就表现为：一方面，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尽可能地消灭敌人的力量。”^② 战争的社会政治目的决定着战争的军事目的，而政治目的的实现又依赖于军事目的的实现。而且，战争一旦进入实践过程，政治目的就转化为军事目的，关于战争的军事本质的内容，《论持久战》中进行了充分的论证，而后作出结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③ 值得注意的是战争的军事本质一提出来，就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不仅揭示了“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这两个战争运动的基本方面，而且揭示出了二者

①《毛泽东选集》第44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7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50页。

之间的辩证关系。把上述内容归纳起来，就可以看到：战争，一方面是政治的继续，另一方面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暴力运动，这就是战争本质的二重性。政治的继续，说明战争的社会内容和间接性的本质。以暴力手段进行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运动，说明战争的军事形式和直接性的本质。这样，战争概念就成为一个政治与军事、内容与形式、间接性与直接性相统一的具体概念了，它可以定义为：政治通过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暴力形式的继续。

三、社会政治条件对战争的决定作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对战争运动的条件作了全面概括，但分析还不够深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从战争运动的社会性和能动性两个方面对战争条件论作了重要发展。

关于战争运动的社会政治条件，毛泽东着重从党的领导、人民战争和统一战线三个方面作了论述。关于党的领导，毛泽东指出它决定着战争的进步性质，决定着人民的动员，决定着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也决定着战争的主观条件最科学、最充分的发挥。所以，它是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关于人民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已经把人民的条件看成反“围剿”的最主要的条件。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揭示了战争运动的力量源泉，抗日战争一开始，毛泽东就指出，只有人民群众参加的全面抗战，才能保证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一九三七年八月，他在党的洛川会议上提出了“十大救国纲领”，其中第三条就是“全国人民总动员。”“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实行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

识出知识。”①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他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指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所以，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②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的人民之前，使它象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③ 同在全国要看到人民的力量相一致，毛泽东强调在军队要看到士兵的力量，提出了“军队的基础在士兵”的观点，为了发挥人民与士兵的作用，毛泽东提出了“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人确定为“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总结抗日战争经验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拚命反对人民战争。”④

关于统一战线，毛泽东把它看成战争胜利的基本的社会条件，从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七年，毛泽东为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进行了积极而卓有成效

① 《毛泽东选集》第32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4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78～47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932、942页。

的努力。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则系统地提出了统一战线的理论，并使它成为军事哲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论持久战》的“结论”一开始就说：“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实力呢？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①统一战线思想的提出，是以战争中各种社会力量之间的利益关系为根据的，由于国内各阶级和除汉奸之外的各种社会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因而有可能建立国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由于国际上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德意日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敌国人民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矛盾，因而有可能建立国际的反日统一战线。总之，统一战线就是利用各种社会集团同敌人之间的矛盾，以扩大我之力量，缩小敌之力量。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他深刻地揭示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关系。首先，他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强调争取和坚持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因为统一战线本身就是不同的利益之间求得相对的一致，所以，统一战线成员之间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放弃独立自主原则，就会有在矛盾关系中被同化和被消灭的危险，不能增强抗日力量反而丧失自己的力量。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中，一切必须服从抗日的利益，这是确定的原则。因此，阶级斗争的利益必须服从于抗日战争利益，而不能违抗抗日战争的利益。但是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有些人否认这种事

^① 《毛泽东选集》第480页。

实,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这是错误的。”^① 因此,“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② 其次,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他在一九四〇年三月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一九四〇年十二月的《论政策》两篇文章中,对这一问题作了极精辟的论述,构成了他的军事辩证法思想的重要内容。他说:“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地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③ 这一真理包含了极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和极重要的现实意义,项英等人不懂得这一真理,结果在“皖南事变”中使新四军军部及所属部队九千余人全军覆没,除二千余人分散突围外,一部被俘、大部壮烈牺牲。这一沉痛的教训说明,嘲弄辩证法,用团结与斗争绝对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处理统一战线问题是要受惩罚的。单纯地从团结中找团结,结果是统一战线和我军的有生力量“鸡飞蛋打”,全部落空。关于同顽固派的斗争,毛泽东指出:“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必须注意下列几项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对于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干净、

① 《毛泽东选集》第49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50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703页。

全部地消灭之。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应懂得利用顽固派的矛盾，决不可同时打击许多顽固派，应择其最反动者首先打击之。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这时，我们应该主动地又同顽固派讲团结，在对方同意之下，和他们订立和平协定。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这三个原则，换一句话来讲，就是‘有理’，‘有利’，‘有节’”。①这些充满辩证法、闪烁着具体真理光芒的论述，对统一战线概念进行了深层次的矛盾分析：统一战线是与民族敌人对立的一个矛盾方面，然而其内部又存在着矛盾，如国、共两党的矛盾；在国民党这个矛盾方面内部又存在着进步势力与顽固势力之间的矛盾；在顽固势力这个矛盾方面内部又存在各派系、各山头之间的矛盾，等等。要巩固统一战线，就不能忽略其中的任何一个层次，并注意每一层次中矛盾的特殊性与不同的斗争方式。即使是对顽固派的斗争，也要“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②解决统一战线内部矛盾的目的，不是促使“统一战线”这个矛盾体破裂，而是使其更巩固，这又要求把斗争保持在度的范围之内，要“有节”和“适可而止”。不斗争，会被顽固派吃掉，统一战线会破裂；斗争过头，引起全面内战，统一战线也要破裂。而统一战线破裂，国共两党“鹬蚌相争”，抗

① 《毛泽东选集》第707～70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721页。

日战争就会彻底失败。所以，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①毛泽东关于反顽斗争的思想，达到了很强的理论性和很高的艺术性的统一。这些思想源于他的军事策略思想，而其基本精神又可以反过来指导一般的军事斗争和一般的政治斗争，因而具有哲学的或普遍的意义，所以说它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四、主观能动性在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中的决定作用

关于战争运动的能动性条件，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主观能动性在战争胜利的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中起着决定作用的光辉思想。毛泽东作出了这一重大贡献，是以敌强我弱和以弱胜强这个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情况为背景的，在敌强我弱，我之客观条件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如果不提出肯定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那就意味着只有失败一条路了，以弱胜强的概念就被根本地否定了。所以，在必要的客观条件的基础上，积极地、正确地、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在强敌面前争取胜利的唯一道路。

首先，毛泽东科学地规定了主观能动性的含义。《论持久战》的“能动性在战争中”一节说：“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

^①《毛泽东选集》第721页。

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① 这里概括了能动性的两个方面，即主观的方面（认识或知的方面）和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方面（实践或行、做的方面）。在主观的方面，又有“引出思想”和“提出计划”两个方面，前者总结了根据客观事实认识世界的过程，后者设计了按照主观愿望改造世界的过程，这样，“能动性”就概括了认识与实践、或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辩证统一和辩证发展的全部内容，从而成为一个具体的概念。这对于克服主观性和片面性，正确指导战争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毛泽东透彻论证了自觉的能动性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和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他说：“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② “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③ 这里，不仅说明了能动性在战争中的特殊意义，而且指出了发挥能动性的广泛性或群众性要求，把社会性条件和能动性条件统一起来了。他又说：“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是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④ 这就具体地说明

① 《毛泽东选集》第445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4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54～455页。

了主观能动性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所谓“一定条件”，就是敌我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等客观因素及其构成的战争胜负的可能性；所谓“决定作用”就是把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可以说，主观条件在以弱胜强的战争中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它是由胜利的可能性通向现实性的桥梁。

最后，毛泽东还通过“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说明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具体形式和具体方法。在战争指导中争取主动性，实现灵活性和计划性的过程，也就是同敌人竞赛主观能力的过程，“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努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① 战争的能动性条件就是正确的指导和胜利的战斗，它不是否定了、而是包含和发展了客观条件的基础性的决定作用，所以，它是一个放射着唯物辩证法光辉的具体概念，毛泽东关于能动性条件的论断，无论在哲学史上还是在军事思想史上，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三节 敌后战争的辩证法与战争

运动理论的具体化

一、敌后战争思想的根据和理论意义

开辟敌后战场，进行敌后游击战和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是中国抗日战争最主要和最有特色的形式，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关于战争运动理论的基本内容。“敌后战争”是一个包含着丰富的辩证内容的具体概念，它的提出，是毛泽东深入分析敌我矛盾的结果。首先，敌强我弱的形势决定了敌

^①《毛泽东选集》第459页。

后战争的必要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不可能用正面对抗的形式战胜强大的敌人，所以，必须到敌后去开展游击战争。其次，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的情形，又提供了开展敌后战争的可能性。中国地域广大和敌人兵力不足决定了在敌后必然出现很多空虚的地方，提供了在敌后开辟战场的空间条件。敌人在占领区的野蛮政策必然引起敌后人民的强烈反抗，敌后抗战必然深得人民拥护，这又提供了敌后战争的群众条件和经济条件，加上主观条件和自然条件，敌后战争就是完全可能的了。最后，敌人深入国境，同国民党军队形成正面战线，又决定了敌后战争的方向和形式。总之，“敌后战争”概念的提出是深入分析抗日战争中敌我矛盾的必然结果。从理论上讲，“敌后战争”概念是运用矛盾法则于战争的伟大成就，有着极高的军事哲学价值。

“敌后战争”的基本含义就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敌人战线内部求得生存条件和克敌条件的作战形式。从对立面中取得肯定自己，否定自己的对立面的条件，这与取之于敌，用之于敌的补充方针在方法论上是一致的，都是对立统一关系的具体体现，“敌后战争”思想使《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以弱胜强的理论进一步具体化，使其内容更加丰富。

二、战争后方理论的辩证法

敌后战争的特点，就是“无后方作战”，即离开自己的总后方，越过敌我对抗线，到敌人的后方单独作战，然而，战争与后方的联系是必然的或绝对的，绝对的无后方作战是不能持久的。毛泽东指出：“历史上存在过许多流寇主义的农民战争，都没有成功。在交通和技术进步的今日

而企图用流寇主义获得胜利，更是毫无根据的幻想。”^① 战争与后方的联系是绝对的，而抗日战争则需要脱离总后方，到敌人的后方进行无后方作战，这是一个矛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毛泽东根据敌后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提出了“建立根据地”的思想。他说：“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了。”^② 这里对敌后根据地的概念作了科学的规定，从而揭示和解决了战争后方理论的内在的矛盾性。毛泽东不仅科学地规定了敌后根据地的概念，而且具体地说明了建立敌后根据地的条件。在军事条件和社会条件方面，主要是武装部队，战胜敌人和发动民众。在自然条件方面，有山地、平原和水域地三种情形。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已经建立或正在建立或准备建立的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根据地都是。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③ 根据地思想说明，战争后方概念不仅有绝对性的一面，而且有相对性的一面。敌后战争相对于自己的总后方是“无后方作战”，相对于根据地则

① 《毛泽东选集》第387～38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8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88页。

是有后方的作战，根据地思想还说明，敌后战争不仅是把战争引向敌后，使敌人后院起火，而且是把后方移向敌后，在敌人的后方建立自己的后方，根据两种后方对立并互相渗透的局面，毛泽东又提出了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思想。发展根据地，就是扩大我的后方，缩小敌人的后方，建立自己的后方是根据地概念的直接含义，否定敌人的后方，把敌人的后方变成敌人的前线，又是根据地概念的间接含义，在敌之后方向我后方转化中，“游击区”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指出：游击区是根据地和敌占区“双方争夺的中间地带”，“这种游击区，经过游击战争的必要过程，……就转化成了根据地。”^① 极力扩大根据地和游击区，极力缩小敌占区，是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任务。这一任务的最后结果，就是完全否定敌人的后方，变我的无后方作战为敌的无后方作战，以达到驱敌出境，夺取整个战争胜利的目的。总之，从脱离自己的总后方在敌人后方进行无后方作战，到在敌人后方建立和扩大自己的后方，缩小和完全否定敌人的后方，把无后方作战转换给敌人，是一个战争后方转化的辩证过程。这个过程充分说明：“战争后方”是一个包含着辩证的矛盾内容的具体概念。

三、作战线理论的辩证法

作战线形式上反映敌我双方的空间关系，实质上则是敌我之间包围与被包围的关系。战争中，处于战略进攻地位的一方一般形成包围的作战线（外线），相反的一则处于被包围的作战线（内线）。这是抗日战争中正面战场上的日中态势。然而，敌后战争的开展则使这一基本态势之中出现了新的情况。敌后作战在敌后方开辟了新的战场，形成了新的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390～391页。

线，这就使敌人的外线出现了一个个大缺口，从而在战略外线中形成了新的包围与反包围，即矛盾着的相互外线的复杂关系，从整个战争来看：我在敌的包围中，但战役上，我又可以将敌之一路或几路包围起来，这是第一种包围与反包围；从根据地和敌占区的关系来看，我每一块根据地都处于敌的包围之中，但我之几块根据地联系起来，或我占之广大农村对于敌占之少数城镇来说，敌又在我的包围之中，这是第二种包围与反包围；另外，从国际战局看，还有第三种包围与反包围。这种包围与反包围的复杂关系，形成了“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这种形态反映了敌我作战线之间的矛盾转化关系。“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的；但是主力军和游击队的关系，则是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形成夹击敌人的奇观。各游击区的关系亦然。”^①而且，这种敌我战线的相对关系始终处于运动状态，在内线的正规战线后退、缩小的时候，外线游击战线则不断前进、扩大，并逐渐把敌人战略上的外线作战变为各个局部的内线作战，这种内外线的辩证关系，是敌后战争的重要特点。

四、由局部向全局转化的辩证法

这是敌后战争理论的本质内容。以进攻和防御、速决和持久等辩证关系为内容，通过局部否定全局的思想，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已经提出来了。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又对此作了更集中，更具体的论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都以专章论述了这一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已说过了，抗日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是的，这是完全对的，但这是一般的方针，还不是具体的方

^① 《毛泽东选集》第139页。

针。”在战争的前两个阶段，具体的方针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①毛泽东还根据敌我之间的基本矛盾，具体分析了采取上述方针的根据，战略的防御、持久、内线“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造成的。”战役战斗的进攻，外线“都是从敌小我大这一特点发生的。”战役战斗的速决战又是由敌强我弱的特点决定的，上述作战方针，深刻反映了战争运动的全局与局部、即战略与战役、战斗之间的矛盾关系：“战役和战斗的作战方针。一句话说完，就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对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说来，是相反的；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方针。”②这就是说，战略的即全局的方针要通过战役战斗的即局部的具体方针来表现，以局部的我攻敌防代替全局的敌攻我防，以局部的我强敌弱代替全局的敌强我弱，使全局的性质在局部被相反的性质所否定，最后再把这种局部的否定扩大，变为全局的否定，即把战略防御变为战略反攻和战略进攻。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这一理论上最主要的贡献，是说明了局部如何或怎样向全局转化的问题，这就是他的局部集合的思想，即把许多战役战斗的进攻战积累起来，最后达到战略形势的根本变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多次提到这一思想，他说：从整个抗日战争来看，只有将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集合了很多，才能达到战略防御之目的，只有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集合了很

①《毛泽东选集》第451～45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53页。

多，才能达到战略持久的目的。集合很多的歼灭战，才能转变敌我形势，将敌之战略包围，即敌之外线作战方针根本击破，集合许多小胜化为大胜，则是正规战游击战所共同的①。此段话中从四个层次上对“集合”思想作了反复说明，毛泽东还说：“我们的战争，在于力求每战争取不论大小的胜利，……把这些部分地消灭敌人的成绩积累起来，成为大的战略胜利，……”②“集合了许多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以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③这种“集合”局部以影响全局和改变全局思想，是量变引起质变的规律在攻防关系上的具体运用。总之，局部集合思想指出了由局部向全局转化的基本道路，说明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方法。

贯彻局部集合的思想，在游击战的战略条件下和在运动战的战略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要求。在分散的游击战的条件下，局部集合主要是指通过战术胜利的增加以影响战略形势，这种战术活动是分散进行的，不必纳入战略计划。而在大兵团运动作战的条件下，也要通过战役战斗的速决、进攻以实现和改变战略的持久、防御，但这里强调的不是渐进式或积累式的集合，而是突进式或合并式的集合，每次战役均可列入战略计划，其战果也直接产生战略影响。因为大兵团作战靠小战斗之胜利的积累去影响战略形势，只会变成“拚消耗”的做法，这对弱军是不可取的。土地革命战争中的反“围剿”

①《毛泽东选集》第378～37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5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54页。

时期，有人提出“胜利起始于战术”的理论，就是忘记了大兵团运动作战的特点。总之，任何战略战术思想的运用，都不能离开当时战争的基本形式和基本特点。局部集合思想既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又不能把抗日战争初、中期的模式机械搬运到其他时期的战争中去。

五、从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发展的辩证法

抗日战争对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来说，绝大部分时间里是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但是，抗日战争中游击战不是通常的小规模的游击战。而是遍及全国的包含着许多正规战要素的游击战争。因此，毛泽东从战略的高度，对这种游击战的概念作了具体的规定，并论述了它的战略地位及其与正规战争的关系。他指出，抗日游击战争是共产党领导的，以正规军队为骨干的、在外线（敌后）单独作战的，以根据地为基础和向正规战争发展的、广大持久的游击战争。这些特点说明，在游击战争概念中，包含着游击战和正规战两种对立的要素。战争初期，前一种要素占主导地位；战争后期，前一种要素下降，后一种要素上升到主导地位，使游击战争转向自己的否定形式——正规战争。

有正规战争的要素，而不采取正规的作战形式，这是由敌强我弱、敌小我大等矛盾决定的。敌强而占地广大，敌小而占地空虚，这样，采取游击战争就可以深入敌后，而且，游击战争分散作战的特点，可以缩小我的消耗面，扩大我的吸收面，在保存自己、壮大自己、持久作战方面远比正规战争优越。游击战分散作战的特点也可以扩大敌的消耗面，限制敌的吸收面，使其既不能速决取胜，又不能持久作战，所以，从战略上看，游击战是保存自己、发展自己的有利形

式。但是，游击战并非十全十美，它在保存自己方面优于正规战，而在消灭敌人、驱敌出境方面则不及正规战。“解决战争的命运，主要是依靠正规战，尤其是其中的运动战，游击战不能担负这种解决战争命运的主要责任、……游击战在整个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仅仅次于运动战，因为没有游击战的辅助，也就不能战胜敌人。这样说，是包括了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这一个战略任务在内的。……这样，游击战的战略作用就有两方面：一是辅助正规战，一是把自己也变为正规战。”^①这就提出了游击战向正规战发展的必要性。

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化的过程，就是游击战内部的否定因素——正规战要素对其他非正规战要素实行同化的过程。其中最主要的是作为游击战的中流砥柱的正规军不断在游击战中发展自己，即把广大的群众武装起来，再把群众武装和游击队有步骤地转化为正规军，如新四军基本上是游击队发展起来的正规军。毛泽东不是单纯地就游击战争自身来考察游击战争，而是从游击战争与它的对立面——正规战争的关系中考察游击战争，从而揭示出游击战争的内在矛盾性，以及它向正规战争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人民武装在抗日战争中的发展、壮大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人民武装不仅担负起了抗击日伪军的主要任务，而且使自己由四万多人壮大到一百多万人，为夺取中国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军事基础。

敌后战争的理论，就是在战略上从保存自己到发展自己，从保存、发展自己到消灭敌人、驱敌出境的理论。它是以弱胜强的战争运动理论的具体化，因而也是毛泽东军事哲

^① 《毛泽东选集》第466页。

学思想具体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第四节 战争指导方法论的丰富与发展

一、主动性与战争指导的根本原则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战争指导方面，着重研究的是如何正确地认识战争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战争指导方面则着重研究的是如何成功地指导军队实践战争的问题，从而在成熟期的基础上，使战争指导方法论得到丰富和发展。

在如何指导战争的问题上，毛泽东首先抓住了主动性这个核心问题，提出了指导战争的根本原则和成功地指导的目的和标准，他说：“这里说的主动性，说的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是用以区别于被迫处于不自由状态的。行动自由是军队的命脉，失了这种自由，军队就接近于被打败或被消灭。”^①这就告诉我们，主动性是军队作为有生力量的前提，失去主动，军队就如死物一般，决无力量可谈。反之，一个军队在战争中如果始终处于主动，即使面对着强大的敌人，也会有胜利的希望。有了主动，弱就可以变强，守就可以变攻，不利就可以变有利，弱军就会看到以弱胜强的曙光。所以，主动就是战争中的“胜利之神”，主动性如此重要，当然地就成了战争指导者必须首先争取的直接目标，毛泽东说：“为此缘故，战争的双方，都力争主动，力避被动。”^②

怎样才能得到主动呢？毛泽东对此作了唯物辩证的说明：“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45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55页。

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此外，也还有利用敌人的错觉和不意来争取自己主动和逼敌处于被动的情形。”①前一句话，坚持了主动观的唯物论，说明“主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不能分离的，而被动则和战争力量的劣势分不开的。战争力量的优势和劣势，是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②而前面所引的两句话，则坚持了主动观的辩证法，说明了主动与优势联系的相对性，争取主动性的多种可能性，根据对主动性与优势兵力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又提出了相对主动权的思想。他说：绝对的主动权，只有以绝对优势对劣势才有可能。“但在历史上，这类绝对优势的情形，在战争和战役的结局是存在的，战争和战役的开头则少见。”由于日本既有其强的方面，也有其不利的因素，于是在总的方面就只有相对的优势，“因而其主动权的发挥和维持就受了限制，也成了相对的东西。”③这种主动权的相对性，就为战争的另一方争取主动提供了可能。主动权是可以从敌人手里夺过来的，但是，“我要优势和主动，敌人也要这个，从这点上看，战争就是两军指挥员以军力财力等项物质基础作地盘，互争优势和主动的主观能力的竞赛，竞赛结果，有胜有败，除了客观物质条件的比较外，胜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正确，败者必由于主观指挥的错误。”④力量的优势是主动的基础，而主观能力正确和积极发挥则是争得和掌握主动的关键。对于一切战争的指导者来说，及时的争取主动，牢牢地掌握主动，就是指导战争的根本原则和夺得战争胜利的密

①《毛泽东选集》第456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56～457页。

③④《毛泽东选集》第457～458页。

诀。

二、计划性与灵活性是争取和掌握主动权的必要条件

毛泽东指出：“灵活性和计划性，都是为了争取主动权”，计划性对战争指导的意义，是与战争准备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已经指出了准备的重要性，在《论持久战》中他又指出：“优势而无准备，不是真正的优势，也没有主动。懂得这一点，劣势而有准备之军，常可对敌举行不意的攻势，把优势者打败。”^①而计划则是指导和检查准备的主观依据和标准。没有计划，准备就是盲目的，也就等于没有准备。所以，计划与准备同等重要。正如毛泽东所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②毛泽东不仅指出了计划的重要性，而且指出了战争中计划的特点、基础和条件。与常事相比，战争中计划基本特点就是它的基础的不确实性和不稳定性，对此，毛泽东都作了辩证的分析。他说：“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实性和，实现计划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战争没有绝对的确确实性，但不是没有某种程度的相对的确确实性。”有了这种相对的确确实性，“战争的计划性就有了客观基础。”^③关于战争的不稳定性对计划的影响，毛泽东指出，“由于战争情况只有相对的确确实性和战争是迅速地向前流动的（或运动的，推移的），战争的计划和方针，也只应给以相对的固定性，必须根据情况的变化和战争的流动而适时地加以更换或

①《毛泽东选集》第45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6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62页。

修改，不这样做，我们就变成机械主义者。”①然而，否认计划的相对的固定性，或否认计划的必要性，又是战争的相对主义，毛泽东关于相对确实性和相对固定性的思想。又在计划观上坚持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

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②灵活性既是计划应贯彻的一个原则，又是计划性的继续和补充，是具体实现计划的东西，“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③因此，它给指挥员或战争指导者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实现灵活的指挥，不仅需要正确的认识，而且需要很高的艺术水平，即不仅要能“审时度势”，而且要能“运用之妙。”这只有富有经验而又聪明的指挥员才能办得到。从哲学的意义上讲，灵活性就是在规律许可的范围内，主观能动性的最大限度的发挥，亦即规律性与能动性的高度一致。

总之，战争指导就是通过计划性和灵活性的实现，争取和掌握主动的。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是战争指导的缺一不可的三个环节，抓住并轮转了这三个环节，主观能动性才能得到充分地发挥，各种战争条件才能得到充分地利用，以弱胜强的目的才能达到。

三、造成和利用敌人的心理缺陷是战争指导的重要手段

战争是由人进行的，而人的一切活动和行为都受着其心理活动或心理过程的支配。通过主观努力，破坏敌人正常的心理状态，利用和造成敌人认识、情绪和意志等心理机能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463页。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461页。

紊乱和异常，是战胜敌人的重要方法。

同敌人进行心理较量，首先要健全自己的心理活动。这里重要的是提高对战争规律和对敌人心理状态的认识，为此，毛泽东首先强调了战争规律和敌情的可知性。指出“战争不是神物，仍是世间的一种必然运动，因此，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不管怎样的战争情况和战争行动，知其大略，知其要点，是可能的。”^①在加强我之正确认识，力争少犯错误和不犯错误的前提下，毛泽东指出了“乘敌之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说：“关于敌之可胜，就是在敌人的指挥方面也有其基础。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他在分析了日寇在十个月侵华战争中犯的五大错误之后说：“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之战争胜利又可在敌之指挥上面找到某种根源。”而且指出：“我乘敌隙，敌也以可乘我之隙，少授敌以可寻之隙，又是我们指挥方面的任务。”^②这是要我们利用敌人的错误去战胜敌人。

利用敌人的错误，不应当是消极地等待敌人犯错误，而应当是积极地创造条件，逼着敌人犯错误。毛泽东说：“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件事情。……造成敌人的错觉和出其不意的攻击，即是战争的不确实性给予敌人，而给自己以尽可能大的确实性，用以争取我之优势

①《毛泽东选集》第45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71~473页。

和主动，争取我之胜利。”①这就是说，要剥夺敌人的认识能力，使其不能得到我之真实情报，并迫使其接受我所制造的欺骗性“情报”或假情报，造成其心理混乱。这说呀，在军事斗争中，是排斥道德的，在敌人面前讲道德，只能使自己丧身。因此，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我们要把敌人的眼睛和耳朵尽可能地封住，使他们变成瞎子和聋子，要把他们的指挥员的心尽可能地弄得混乱些，使他们变成疯子，用以争取自己的胜利。”②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提出了“破坏敌军的气焰”和改变日本士兵的自尊心的任务。指出：“这种东西的破坏，需要一个长的过程。……破坏的方法，主要的是政治上的争取。对于日本士兵，不是侮辱其自尊心，而是了解和顺导他们的这种自尊心，从宽待俘虏的方法，引导他们了解日本统治者以反人民的侵略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在他们面前表示中国军队和中国人民不可屈服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战斗力，这就是给以歼灭战的打击。”③实现这一任务的目的，就在于打消敌人的骄横情绪和士气，挫败敌人的意志，使其发生心理上的崩溃。为此，毛泽东提出了“瓦解敌军”的方针，并作为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规定了下来。

心理战是战争运动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以弱胜强的战争中制胜强敌的重要方法。毛泽东把从心理上战胜敌人作为战争指导的一个重要任务加以论述，极大地丰富了战争指

①《毛泽东选集》第459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46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70～471页。

导方法论的内容。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完善期，就是它的理论内容的矛盾内涵充分展开，从而达到全面具体化的时期。《论持久战》的写作，是这一时期军事哲学理论具体化的基本标志。

第五章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进一步 发展和方法化的巨大成就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完成人民和民族解放事业而进行的一次战争。对解放战争的起止时间有不同的说法，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历史时期，解放战争起自1945年9月3日，止于1949年9月30日，但实际上，解放战争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一直延续到1950年5月19日解放舟山群岛才告结束。解放战争可分为几个战略阶段：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是争取和平民主，准备应付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全面内战，亦称过渡阶段；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我军实行积极防御；1947年7月至1948年7月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战争发生根本转折；1948年8月至1949年1月我军进行战略决战，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1949年2月至1950年5月我军实施战略追击，解放全国大陆。在过渡阶段，毛泽东同志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中共中央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关于重庆谈判》等著作中，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对敌斗争方针。内战全面爆发后，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等一系列著作中，提出了“一切

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制定了关于夺取全国胜利的纲领、方针和政策，毛泽东相继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制定了党在新的革命高潮中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行动纲领，在军事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经过三大战役后，蒋介石的主力已基本上被消灭，国民党统治集团陷于四分五裂，蒋家王朝面临覆灭的绝境。惯于使用反革命两手的蒋介石反动集团，再次玩弄“和谈”阴谋，争取喘息的机会。在此革命前进的关键时刻，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决不让革命半途而废。1949年4月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面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①

解放战争中，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中国的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不仅有辉煌的理论著作，而且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但他没有拘泥于已有的理论和经验去指导解放战争，而是运用这些理论和经验去寻求解放战争的新特点，根据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普遍规律的基础上，找出指导解放战争的特殊规律。毛泽东同志运用这种实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340页。

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思想方法，去研究、指导解放战争，从而取得了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理论宝库。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其最高层次的哲学思想，当然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如：对战争本质的认识更加深入；关于战争运动理论的系统化、方法化；战略进攻的理论和实践，完成战争指导规律的飞跃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

第一节 解放战争的特点与对军事哲学

思想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解放战争的特点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时期，是反帝反封建的人民大革命由局部的胜利走向全国胜利的时期，与过去几个革命时期相比有如下主要特点：

（一）解放战争是决定中国命运之决战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的前途如何呢？这将由中国革命的性质及国共两党矛盾运动的发展所决定。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从1921年算起，到抗日战争结束，奋斗了二十四年，经过了第一次、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三个阶段。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蒋介石是帝、官、封的总代表，他坚持独裁、内战和卖国的方针，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一切民主力量，维

护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蒋介石是被迫的，而且是怀有敌意的。他的企图，一是利用国共合作，用升官发财，腐蚀收买的办法使红军削弱变质；二是借刀杀人，利用日寇消灭红军。蒋介石曾扬言“在抗日战争中至少削弱共产党力量的五分之二”。恰恰相反，共产党的力量不仅没有被削弱，而且得到很大发展。这是蒋介石非常嫉恨的，也是使蒋介石所不容的，非消灭共产党不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日民族矛盾得到了解决，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又挥起了屠刀向人民杀来，所以日本一投降，蒋介石就疯狂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积极准备内战。他以“抗战最高统帅”的名义，连续发布反动命令，一方面命令八路军“原地驻防待命”，不许收缴日伪军的枪械；一方面令国民党的军队“一切按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向解放区开进。蒋介石为加紧内战准备，大量收编伪军，帮助其抢占地盘，并无耻地要求侵华日军在原地“作有效之防卫”，帮他看守地方。与此同时，蒋介石借口受降，从其大后方——西南、西北调动大批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进逼，企图首先在美国的援助下和日伪军的策应下，抢占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打通同蒲、平绥、平汉、津浦各铁路线，进军华北，分割解放区，尔后，实施大规模地全面进攻。同时，美国派遣9万多美军，陆续在塘沽、青岛、上海、秦皇岛等地登陆，还公开为蒋介石空运部队到北平、天津和南京、上海，海运部队到东北、华北、华东等沿海港口，抢先控制上述战略要地。我党采取针锋相对，力争和平，准备战争的方针，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党中央

指示我军，应集中主要力量迫使敌伪向我投降，不投降者逐一消灭之。猛烈扩大解放区，占领一切可能与必须占领的城镇与交通要道，夺取武器与资源，并放手发动与武装群众。实行“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积极整编与扩大人民武装，编组野战军，扩大民兵组织；实行精兵简政，精简机关，裁减老弱，加强基层，充实战斗部队，提高战斗力。

上述情况决定中国内战不可避免，国共两党要进行最后决战。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报告中指出：“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要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① 这场斗争是两个前途两种命运的最后决战，即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决战。这种决战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结果。蒋介石从1927年上台后，没有一天停止过对革命力量的“围剿”，企图把革命力量消灭干净。但与蒋介石的愿望相反，我党领导的革命力量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只有用国内战争的形式去解决，使中国革命进入了国内斗争的新阶段，也就是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即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决战。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28页。

（二）解放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

解放战争同过去几个战争时期相比，是一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直接掌握的军队很少，主要是以叶挺为首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独立团。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惨痛教训，使我们党深刻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没有革命的军队，便没有革命的一切。于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动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各地的武装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第二次国内战争初期，红军的主要作战形式是游击战，1930年6月以后，红军进行了第一次战略转变，即由游击战向正规战的转变。但当时的战略转变主要是对付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大规模“围剿”，如何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这次战略转变应该是以带游击性的运动战为主，但王明等“左”倾机会主义者，不顾当时我军的实际情况，开始要求以游击战一下子转到进攻大城市，打力不胜任的城市攻坚战，后来又变为阵地防御，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消极防御方针，结果遭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实际上直到遵义会议之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才得以顺利地完成了战略转变。

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第二次战略转变，即由运动战转变为游击战，并将游击战上升到战略地位。实行这一战略方针，要达成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消灭敌人，从战略上支援和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保存和发展我军的力量，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由于战争的性质变了，敌友我关系变

了，过去国民党是敌人，现在变成了朋友，而且在形式上还要听他的指挥，所以抗日战争是国共两党共同对敌的问题。

解放战争是第三次战略转变，即由游击战转变为运动战，而且还是一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为什么呢？这是由战争的物质基础决定的，因为战争的实力决定着战争的形式和规模。自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即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到抗日战争结束，国民党拥有430万人的军队，其中正规军248个旅，约200万人，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接收了日军100万人的装备和美国装备的45个师（旅））。国民党政府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3亿以上的人口，控制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占有现代工业和雄厚的人力、物力资源，并取得了美国政府在军事上和财政上的巨大援助。国内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反动派使用了其全部正规军的80%，即193个旅，158万人的兵力，向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企图首先消灭中原我军，然后攻占苏皖，再攻华北，“企图在三个月或六个月内解决关内问题，然后再解决东北问题”。

八年抗日战争中，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抗击着60%以上的侵华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付出了极大的牺牲，但在斗争中发展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抗战结束，我党领导的军队有120万人，其中正规军61万人，解放区人口1亿多，土地面积约占全国四分之一。虽然我军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仍处劣势，形势还十分严重，但我军的数量和质量亦非同昔比，在历史上是空前的，再加上政治和正确指挥等因素，是完全可以争取最后胜利的。

日本刚一投降，蒋介石就企图先独吞胜利果实，而后凭借他在军事、经济上的优势，以现代装备的军队，采取大兵团作战，气势汹汹地对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迫使我军非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不可。早在1938年《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抗战后期我军要由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的任务。由于日本突然投降，抗战迅速结束，这个转变没有完成，而是在解放战争初期才逐步完成的。所以客观情况决定了解放战争是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

军事哲学就是把战争的矛盾运动作为对象，研究战争的产生、发展和它内部的矛盾运动的客观规律，以及运用这些规律去指导战争的行动。而在战争诸矛盾中，主要是战争双方这一主要矛盾各自的政治、经济、军事条件决定的。但军事辩证法不是具体地解决战争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是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认识战争的矛盾运动，揭示它们的规律。抗日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同志就是用这一指导思想，去认识国共两党矛盾运动的发展，揭示出中国解放战争的特点，去规定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所以正确的军事哲学思想，是实行正确的战争指导的基础。

二、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发展的客观要求

军事理论来源于战争实践。无产阶级的军事理论不仅产生于战争实践，而且要继续经受战争实践的检验。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中所形成的毛泽东军事思想当然是指导解放战争的理论基础。但是，也要看到，任何军事理论的提出，都受一定历史条件和实践范围的限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理论，从来没有停留在一个阶段上，而是随着历史的

发展而发展，随着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军事理论包括作战原则，不可能一成不变地适用于一切情况。某些原则应该也必然被适合新条件的原则所代替。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是其军事思想中所包含的最高层次，是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每一个特殊规律中，归纳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规律。军事哲学对于具体的军事学术原则来说，虽然带有普遍性、方向性、指导性和稳定性的特点，但必须看到，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新的军事学术原则不断取代旧的军事学术原则，使军事哲学的内容更加充实。

解放战争是一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必须坚持马列主义的军事理论，坚持毛泽东同志的人民军队的建军思想、人民战争的指导路线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是不可动摇的。带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军事哲学和军事原则是指导解放战争的理论基础，继续发挥作用。但解放战争在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又是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有其特殊的发展规律，一部分属于更具体的有特定局限性的建军作战原则或方法，则因条件的变化而失去现实意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哲学理论为指导，找出解放战争发展的规律，制定出符合解放战争特点的战指导规律，是摆在战争指导者面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因为解放战争是中国革命战争走向最后胜利的时期，战争矛盾运动的发展，国共两党战争的力量向着各自的反面转变，将要发生质的变化，取得全国的胜利在望。但这只是可能性，要实现战争力量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必须通过解放战争的实践来完成。解放战争的客观实践，不仅促进军事理论的发展，而且对军事哲学的充实、丰富和发展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二节 无产阶级战争观的

丰富和发展

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句话通俗易懂，但仔细琢磨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它是毛泽东同志无产阶级战争观的深化和发展；是毛泽东同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阶级斗争历史的科学总结。

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人类全部历史，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发展的历史，是社会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到了阶级产生之后，便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所以，自从人类历史上阶级产生以来，“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①而阶级斗争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基于这种唯物史观，毛泽东早在1930年1月5日写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就批判了党内把革命力量看小了的悲观情绪，指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③毛泽东于1946年8月在《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更深刻地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回顾解放战争的历史，充分说明了这一论断的无比正确，当时对指导解放战争意义是重大的。1946年7月全面内战爆发后，当时蒋介石

①《共产党宣言》第2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93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478页。

石拥有 430 万军队，统治着 3 亿多人口的广大地区，控制了全国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接收了 100 万侵华日军的全部装备，而且有美帝国主义在军事上和经济上的大力支持，而我党当时只有 120 万军队，1 亿多人口的解放区，毫无外援，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战争形势十分严重。在此情况下，如何看待这场战争，敢不敢进行这场战争，能不能打败美蒋反动派，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①这是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看战争，从历史上、阶级本质上和长远观点上揭露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虚弱性，阐明了新生力量必然战胜腐朽力量的历史规律。国民党反动派代表中国最反动、最落后、最腐朽的社会力量，它违背历史发展的方向，处于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它表面上强大，本质是虚弱的，最终必然走向灭亡。革命力量虽小，但它是新生的朝气蓬勃的力量，经过斗争，必然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地发展起来，最后战胜反动力量。并以此思想为指导，进一步分析了敌我情况，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要有充分的信心。”^②就敌人方面来说，其军事力量虽然占着很大优势，又有帝国主义的援助，但这些都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而蒋介石所发动的是非正义的反革命战争，人心不顺，兵无斗志，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在军事上还

①《毛泽东选集》第109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033页。

有战线太长与兵力不足的矛盾，军队内部派系之间、官兵之间以及军民之间的矛盾等不可克服的弱点；再加上其政治上的腐败，和财政经济的困难，将难以支持长期的战争。就我们方面来说，我军在数量上装备上虽都劣于敌人，又无外来援助，但我们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自卫战争，是为国内和平、人民民主、国家独立而战的革命战争，因而人心所向，士气高涨，能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这是我们战胜蒋介石的基础，我解放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执行了正确的财经政策，因而我们在经济上也有办法。以上这些敌我双方的特点，基本上规定了敌我双方在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敌人必然首先向我进攻，我军必须实行防御，随着战争的发展，敌将愈战愈弱，我将愈战愈强，敌将由进攻转为防御，我将由防御转为进攻。最后蒋必败，我必胜，这就是人民解放战争发展的规律。同时，毛泽东同志又辩证地指出：“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从本质上看，从长远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①就是说在战略上藐视敌人，要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在战术上重视敌人，要善于斗争，要讲究斗争艺术。

以上就是解放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战争观，洞察革命战争新的历史阶段，以唯物辩证的方

^①毛泽东在1958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汉会上的讲话。

法，高瞻远瞩，研究和指导战争的光辉思想。

二、用战争消灭战争的彻底革命思想

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同志不仅对战争的本质作了科学论断，而且指出：“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究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①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无产阶级从事战争、研究战争的目的，出于要求消灭一切战争的志愿。毛泽东同志关于用战争消灭战争的思想，在解放战争中得以充分运用和发展。

1945年8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重要报告。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方法，深刻地分析了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和阶级关系，揭露了美蒋反动派的反动本质，指出内战危险严重存在，提出了我们党在新形势下的战略任务，制定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对敌斗争方针。为什么要实行针锋相对的方针呢？第一、蒋介石反动派的反动本质不会改变，必须同它们作针锋相对的斗争。毛泽东同志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

①《毛泽东选集》第15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022页。

益，它的反动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它不肯放下屠刀，也决不能成佛，直至它的灭亡。蒋介石拿刀，我们也拿刀，蒋介石磨刀，我们也磨刀。它来进攻，我们就坚决反击，把它干净、彻底、全部消灭掉。第二，历史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对反动势力必须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由于不敢斗争，对敌人妥协投降，而使革命失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血的教训。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由于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统治，对蒋介石采取投降退让的方针，结果把人民已经取得的权利统统丧失干净。革命的失败，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我党对国民党采取了又联合又斗争的方针，使自己的力量不断发展壮大。但新四军也有惨痛的教训，由于项英的右倾，酿成“皖南事变”的重大损失。解放战争初期，毛泽东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作指导，总结历次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对敌斗争要针锋相对，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压倒一切敌人的气概，不相信美蒋反动派的“好话”，不怕美蒋反动派的恐吓，领导全党去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解放战争经过三大战役，蒋介石的主力已基本被消灭，国民党统治集团陷于四分五裂，蒋家王朝面临覆灭的绝境。惯于使用反革命两手的蒋介石反动集团，于是再次玩弄“和谈”阴谋。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提出要在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的条件下，与我党进行和平谈判。在此革命前进的关键时刻，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文章，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决不能让革命半途而废。

毛泽东同志指出：“敌人是不会自行消灭的。无论是中国的反动派，或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都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①我们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决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毛泽东还指出，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只有彻底地消灭了中国的反动派，驱逐了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中国，中国才能有独立、民主、和平。这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彻底革命精神。

坚持无产阶级的彻底革命精神，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无论那一个阶级社会，敌对阶级的利害关系总是针锋相对，水火不容，根本不能调和的。无产阶级要求得自身的解放，必须进行顽强不懈的斗争，直至彻底消灭一切阶级。指导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武器——唯物辩证法，其本质是革命的，是批判的，是斗争的。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毛泽东同志说：“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②这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发展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③这是人民革命发展的逻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不仅对革命发展的前途，充满胜利信心，而且还必须具有最大的坚定性和彻底革命精神，遵循历史发展的规律，将革命进

①《毛泽东选集》第1265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375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376页。

行到底。

第三节 战争运动理论的方法化 和系统化

一、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灵活运用和发展

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毛泽东同志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唯一正确的方针，是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制定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战争指导规律，它是毛泽东同志以唯物辩证法思想解决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的光辉结晶，战争这个事物同其他事物一样是发展变化的，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我们党领导的各个革命时期和各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战略方针的提法有所不同，但都贯彻和反映了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

1946年6月底，国民党进攻我中原部队，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内战。7月20日，党中央根据战争总的形势，向全党发出了“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的指示。这是一个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内容的全面方针，它分析了解放战争敌我双方的基本特点，指出“我们是能够战胜蒋介石的。全党对此应当有充分的信心。”^①在军事上“战胜蒋介石的作战方法，一般地是运动战。因此，若干地方，若干城市的暂时放弃，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暂时放弃若干地方若干城市，是为了取得胜利，否则就不能取得最后胜利。”^②这里说了放弃地方和城市，就是诱敌深入，把敌人放到根据

^①《毛泽东选集》第108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083页。

地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这就是战略方针问题。从此以后，关于战略方针和作战方针有好几种提法。同年9月16日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中，提出了“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①“以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②的要求；1947年9月1日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说，战争第一年“采取战略上的内线作战方针”；③1948年12月底在《将革命进行到底》一文中又说，战争第一年“人民解放军采取了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是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正确的战略方针”；④1949年7月在《解放战争三年概述》中又说，战争开始时，我们实行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

上述不同提法，是从不同角度，说明解放战争时期我军的战略方针和作战方针的，但其中是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地方为主明确规定为战略方针的。这一战略方针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灵活运用和发展，正确处理了歼敌与失地的辩证关系。为什么要以歼敌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作为战略方针呢？其一，从敌我力量对比来说，一方面在军队数量上、装备上仍然是敌优我劣；另一方面，我党我军力量同历史上对比空前强大，在一部分干部和群众中存在着不愿意放弃地方的思想，因此，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还是保守地方为主，就成为当时战略指导上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09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9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12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263页。

主要矛盾，毛泽东抓住这个主要矛盾，并定为战略方针，就抓住了要害，解决了问题。其二，歼灭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是转变敌我优劣形势，争取胜利的关键问题。毛泽东于1946年10月在《三个月总结》中说：“……再歼敌25个旅左右。这是改变敌我形势的关键”^①；1947年2月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中说：“再歼蒋军四十至五十个旅，这是决定一切的关键”^②；1948年10月在《关于九月会议的通知》中又说：每年歼敌正规军一百个旅（师）左右，五年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师）左右。“这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③。

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方针，是贯彻解放战争全过程的。无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阶段，毛泽东同志都强调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我军于1947年7月起开始转入战略进攻以后，9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提出举行“全国性的反攻”^④，“执行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⑤；在阐述作战方针中，又提到“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⑥ 1947年12月25日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十大军事原则，说这是我们战胜蒋介石的主要方法。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歼灭战，战略决战的方针就是集中主

① 《毛泽东选集》第110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11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239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112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1126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1128页。

力，抓住战机，将敌人几个重兵集团逐次地分别包围，就地歼灭。1949年初，国民党军主力基本被消灭。国民党企图以和谈作为缓兵之计，阻止我军解放全国，这时党中央就提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军事方针就是战略追击，采取先城市后乡村，以战略上大包围。大迂回的方法，力求全歼残敌于大陆上，不使敌人主力逃往海外国外。

综上所述，解放战争的历史告诉我们，以歼敌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就是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思想的具体体现。解放战争第一年的战略防御阶段，面对强敌，为歼灭其有生力量，就要避实就虚，暂时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实行大踏步地进退，创造战机，各个歼敌，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把我军的战略防御导向战略进攻。在战略进攻中，虽然在各个不同的小阶段都有不同的方针，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贯彻了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思想，直到彻底歼灭国民党军队主力，夺取全国胜利为止。毛泽东同志关于积极防御的战略思想，就是彻底歼灭敌人，争取最后胜利的思想，是指导全过程的思想。所以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方针，不仅是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具体运用，而且是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上，紧密结合战争的新特点，具有新内容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二、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方法化的结晶

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同志根据十年内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初期的经验，在反攻时期提出来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十大军事原则，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是从人民战争实践经验中总结

出来的革命战争的指导规律，是在军事上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光辉典范。

军事理论由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波浪式的前进运动，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毛泽东同志根据指导解放战争的客观要求，将几十年战争经验形成的理论，再次升华，总结为既概括又具体的十大军事原则，可谓言简意赅的战略战术结晶。当然也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结晶。因为毛泽东同志以马列主义的哲学思想为指导，在解决中国革命战争问题的实践中形成的军事理论，是胶溶着军事哲学思想的，军事原则的具体化和军事哲学思想的方法化，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十大军事原则在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史上具有极重要的地位。方法化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一个突出特点，早在萌发时期，毛泽东就十分重视思想的方法化，形成许多口诀，便于掌握和实践，但那时的方法还是经验性的。成熟和发展时期，重在理论建设，方法化还不够普遍。只有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方法化才作为理性具体与新的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以高于理论的形式系统地出现了。这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进一步发展的标志之一。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为指挥各战场拟制了大批文电，其中包括着丰富的、方法化的军事哲学思想，这是同期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哲学思想的方法化，也形成了许多体现辩证法的典型战例，从而使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由逻辑的形态变成了历史的形态。

十大军事原则内容十分丰富，每条都有它的独立的意义。但各条之间互相联系，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但它以方法化的形式集中回答了我军作战的主要目标、基本战法、

作战形式、战斗作风以及战斗保障等一系列作战指导原则。

（一）作战目标。是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还是以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呢？这是根据解放战争时期，敌我诸矛盾中揭示出来的一个主要问题。十大军事原则的第3条指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①这是我军的基本作战方针。我们知道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手段。因此，正确处理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同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同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辩证的统一。在战争中，敌我双方有生力量的消长，对战争的胜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我们只有大量地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能有效地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有时暂时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正是为了换取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胜利。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全局性的胜利而作出局部的牺牲，为了全部地永久地不丧失土地而暂时地部分地丧失土地，正是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思想，是唯物辩证法在革命战争中的具体运用，是我军的取胜之道。十大军事原则是毛泽东同志将这些军事思想具体化、方法化。如1947年3月初，国民党集中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从南、北、西三面向陕甘宁解放区发动进攻，重点指向我党中央所在地延安，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决定我军暂时撤离延安。就在敌人占领延安之后的5个月内，我西北野战军避免正面的阵地防御，避开敌军进攻的锋芒，诱敌深入，与敌周旋，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连续打了7次大胜仗，消灭胡宗南部队3万余人，在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143页。

国各个战场的配合下，迫使敌人放弃了对我西北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到1948年春，我西北军民共歼敌10多万，使延安和其他许多失地再次回到我们手里。关于丧失土地问题，战争实践证明，“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

（二）基本战法。十大军事原则第4条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翼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灭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① 这条原则的基本精神是：战役战斗上，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以求得全部歼灭敌人。这是我军作战的主要战法。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这是实现歼灭战的重要条件。在战役上战斗上集中了绝对优势兵力，对敌形成四面包围，就能使我军具备全歼敌人的物质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② 在战争总体上敌强我弱，这是必须承认的，但在战役战斗上的一个局部造成兵力兵器的优势，不仅是必须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1143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06页。

而且是可能的，只有造成了这种优势，才能以多胜少，以强击弱，既有力量攻歼被围之敌和阻击援敌，又有力量应付意外情况，实施连续作战。在我军战史上，由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实行四面包围而全歼敌人的战例是非常多的。例如，解放战争初期的临（汾）浮（山）战役：面对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3个旅的进犯，我军就是以一部兵力牵制敌两个旅，集中3倍于敌的兵力，一举歼灭了敌人所谓的“天下第一旅”，加速了战役的胜利。

毛泽东同志指出：“主动或被动是和战争力量的优势或劣势分不开的。因而也是和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分不开的”^①。革命战争初期，往往是敌强我弱，敌优我劣，敌处战略主动，我处战略被动。然而这种形势是可以转变的，转变的办法就是实行战役战斗的歼灭战。我们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力求全歼敌人，通过战役战斗上的以多胜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就能够达到战略上的以少胜多，逐步剥夺敌人在战略上的优势和主动，而使我军在战略上完全掌握优势和主动，直到取得最后胜利。这就是战争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规律。历时3年的解放战争，我军在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和指导下，采取正确的战略方针，运用这一有效战法，打了很多闻名中外的出色的歼灭战，很快转化了敌我力量对比，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以小米加步枪战胜了敌人的飞机加坦克，消灭蒋军800万，就是一个雄辩的证明。

我们主张集中兵力，是不是说任何情况下都是兵力集中得越多越好呢？不是的。集中兵力的程度，应根据具体情况

^①《毛泽东选集》第455页。

确定。敌人有强有弱，战场有主有次，地形条件有有利或不利，集中兵力的要求也就有高有低。因此，每个战役战斗需要兵力优势的程度，不应当是固定不变的，而应根据敌情、地形及我情，以能否做到有把握歼灭敌人来确定。对于强敌，或关系紧要的战场作战，应以绝对优势的兵力临之；对于弱敌或不关紧要的战场作战，临之以相对优势的兵力也就够了。

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虽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战法，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当敌人比较集中强大，采取集团行动，或虽分数路但各路密接，我军暂时不能实行彻底的歼灭战时，为了消耗敌人，破坏敌人的行动计划，保障我军在主要方向上歼灭敌人，则可以采取给敌以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对敌人的正面或侧翼实施猛烈攻击，力求达到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这样做，即能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又能使我军避免被动，减少伤亡，利于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如解放战争初期，我太岳纵队及晋绥、太岳军区各一部，在吕梁山地区作战中解放了隰县、大宁、石楼等地后，胡宗南集中6个旅向大宁进攻，妄图驱走我军，稳定晋西南局面，尔后向延安进攻。当时，我军集中6个旅，除一部在北线监视阎锡山军外，确定主力给密集推进的胡宗南部队以歼灭性打击。经10多天战斗，我军歼敌一个旅部、一个整团和一个团的大部，其余敌军畏惧被歼，仓皇逃出吕梁山地区，其行动计划被我粉碎。

（三）作战形式。十大军事原则第7条指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

点和城市。”① 这条军事原则讲的是：我军的作战形式，应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与此同时，要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加强阵地攻击战术的研究和运用，以求大量歼灭敌人，广泛地夺取敌占据点和城市；它阐明了运动与歼敌、运动战与阵地战的辩证关系，反映了在地域广阔的中国进行革命战争的规律。为什么要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呢？这首先是因为，我军调动敌人脱离其作为依托的城市、据点和交通线，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② 的运动战的方针，可以使充分发挥指挥员的领导艺术和人的活跃性，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打运动战，我军就能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掩护下，高度发挥主观能动性，实行大踏步的前进和后退，以便迅速集中和分散，创造和捕捉良好的战机，集中兵力在运动中大量歼灭敌人。

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利于避敌之长，击敌之短，速战速决。运动之敌，脱离了既设阵地，一般是处于不意即无准备之中，兵力比较分散，地形比较生疏，使其优势的技术装备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因此，一般来说，运动中之敌比驻守中之敌好打。打这种敌人，更便于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充分发挥我军的特长和优良的战斗作风，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速歼敌。解放战争初期，东北我军一部坚决执行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指示，于1946年10月30日发起了新开岭战役，对进至辽宁以东新开岭地区的国民党第25师，突然发起攻击，开创了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战役中歼敌一个整师的先例。

①《毛泽东选集》第1144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214页。

运动战是我军的主要作战形式，但在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更为强调和重视运动战，并贯彻于战争的全过程。在战略防御阶段，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实行积极防御，主动退却，诱敌深入的方针，暂时放弃一些城市和地方，与敌进行运动战。自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头8个月我虽失去105座城市。但却取得了歼敌71万人的伟大胜利。如华东野战军主动放弃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取得莱芜战役的胜利和党中央主动放弃延安，转战陕北运动歼敌，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的胜利等，都是在运动中寻机歼敌的典型范例。1947年7月转入战略进攻后，实行以主力打到外线去，把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的方针，将中国革命推向新的高潮。为适应战略进攻的需要，我军不断组建和扩大野战兵团，使运动战的规模越来越大，从运动战的形式、规模及其正规程度，都有了很大发展和提高，一次运动战役能歼敌几万甚至几十万人，从而成为决定战争命运的主要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但不是不要阵地战。毛泽东同志在强调在运动战歼灭敌人的同时，还指出，应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战略进攻阶段，运动战发展了，阵地战也发展了。1947年夏，晋冀鲁豫野战军为配合山东、陕北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在豫北反攻和晋南反攻中先后攻克敌31座县城。1947年6月6日毛泽东在给担任晋南反攻的太岳兵团的电报中指出：“要准备打阵地战（以后运动战将大大减少），学会近迫作业，善于攻坚”。从此我军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阵地进攻战。1947年11月，在朱德指挥下，晋察冀野战军一举攻克有30万人口的石家庄，成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接着，我军连克运城、四平、临汾、洛阳、宜

川、宝鸡、潍县、兖州、开封、济南、锦州、天津、太原、上海等大中城市，阵地战地位逐步提高。特别是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战。

（四）战斗作风。十大军事原则第6条指出：“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即在短期内不休息地接连打几仗）的作风。”^① 这条原则的基本精神是：发扬我军的政治优势，以无产阶级所独有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彻底革命精神，压倒敌人，去夺取战争的胜利。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是我军的优良战斗作风。这种作风，是我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育、教导下，经过长期革命战争锻炼养成的。它是建筑在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觉悟的基础上的。

有了优良的战斗作风，就能战胜任何艰难困苦，压倒一切敌人。战争，是敌我之间的生死搏斗。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我们要克敌制胜，除了有正确的作战指导思想和正确的作战方针、计划外，还必须具有“勇敢牺牲英勇向前的精神和动作”。这样，才能排除万难，一往无前，攻则无坚不摧，守则屹立不动，完成作战任务，彻底歼灭敌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长征途中，我军以惊人的革命毅力，爬雪山，过草地，历尽千难万险，转战11个省，进行380多次战斗，打破数十万敌人的尾追、围攻和堵截，长驱二万五千里，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我解放区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进行大规模

^① 《毛泽东选集》第1143页。

的“清剿”和“扫荡”。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我解放区军民一起，团结战斗，英勇杀敌，不怕流血牺牲，终于渡过了难关，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长期革命战争形成的优良战争作风，在十大军事原则中，毛泽东同志用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十六个字作了高度概括，在解放战争时期又得以发扬光大。如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从1948年3月11日至22日，发起了以攻取周村、张店为中心的胶济路西段战役；接着又于4月2日至5月8日，进行了以歼击潍县之敌为主要目标的胶济路中段战役；尔后又从5月29日至7月18日，实行了进攻兖州等地的津浦路中段战役。在四个多月的连续作战中，广大指战员坚韧顽强，长途跋涉，乘胜扩张战果，共歼灭敌人14.8万余人，解放了大片地区，从根本上改变了山东的敌我形势。

我军的优良战斗作风，充分体现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不是物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①所以优良的战斗作风是人在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重要方面。

（五）战斗保障。战斗保障主要是指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十大军事原则第9条指出：“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②这条军事原则告诉我们，我军在作战过程中进行武器装备和人力的补充，也要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从我军发展的历史来

① 《毛泽东选集》第43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144页。

看，当我们没有取得全国政权的时候，我军武器装备和人力的补充主要地并不是依靠后方接济，而是依靠作战的俘获和在战区就地解决。依靠前线作战解决人力物力的补充问题，可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有利于根据地人民休养生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支持长期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防御阶段，当战争主要是在解放区内进行时，由于我不断歼灭敌人，从俘获中解决部队人力物力的补充，就相对减轻了解放区人民的负担。如在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中，全歼国民党美械装备的整编第26师和第一快速纵队以及其他部队共5万余人，其中生俘敌3.9万余人；缴获榴弹炮48门，山炮，野炮41门，坦克24辆，汽车474辆。而当我军由内线作战转到外线作战，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以后，我军作战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资源，又大量地从国民党方面和国民党统治区内解决，这样就大大减轻了老解放区人民的负担。

在革命战争中，对俘虏的敌军人员进行改造并补充自己，这是毛泽东同志为我军确定的解决兵源问题的一个正确方针。我军的兵员，首先是依靠根据地的贫苦农民子弟大批参军。他们是我军的基本成分和坚强骨干。此外，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从战场上俘虏的并经过教育审查的国民党军中的士兵中补充来的。我军自建军以来就有熔化战俘、实行火线扩军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同志还说：“红军象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我军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军队是人民军队，我们进行的战争是革命的正义战争，而且我们是用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观点看俘虏人员的。国民党军队的士兵，绝大多数是被抓丁拉夫当兵的劳动人民，经过教育，很快即可转化为人民军队。

三、歼灭战思想的系统化

歼灭战思想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基本内容之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从建军开始起一直坚持的基本作战原则。但在抗日战争时期，根据我军在敌后实行以游击战为主的战略方针，所以我军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主，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辅。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情况变了，作战方法也应改变，我军以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为主，以分散兵力打游击战为辅。而在蒋军武器装备加强的条件下，进行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正规战，我军必须特别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为指导解放战争的客观需要，毛泽东同志从1946年7月至1949年初，在有关军事问题的指示、文章、谈话、电报中，从战略部署、战役决心，及至战役、战斗的指示和经验总结，都是围绕着一个中心内容，就是如何保存自己，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所以解放战争时期，歼灭战思想是构成毛泽东军事理论著作的主要内容，并与其他军事辩证法思想相融合，形成了一个以歼灭战为核心的战争运动理论体系。这个体系的基本思想，就是以十大军事原则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它是建立在人民战争的基础上的，如何实行革命力量由弱变强转化的军事辩证法。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就是集中兵力打歼灭战。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之所以是指引中国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普遍原则，是因为毛泽东以唯物辩证的方法，不但研究了一般战争的规律，而且立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不断研究和掌握了中国革命战争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但十大军事原则中的歼灭战思想，较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都大大丰富和发展了。十大军事原则，对“消灭敌

人，保存自己”这一战争本质体现得更加明确、深刻；对实行歼灭战的作战形式、条件、内容和方法等方面阐述得更深透、详尽，是歼灭战思想的系统化。

（一）歼灭战体现和贯彻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基本原则。

消灭敌人与保存自己，是一切战争的共性。古代战争用矛用盾，今天战争用子弹攻防的武器装备，都是这个战争共性的反映。克劳塞维茨认为这对范畴属于“战争的纯概括”，即撇开战争政治内容的一般战争概念。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战争的目的不是别的，就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消灭敌人，就是解除敌人的武装，也就是所谓‘剥夺敌人的抵抗能力’，不是要完全消灭其肉体）。”^①他不仅指出了战争的根本目的，而且进一步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②与此同时，毛泽东同志还对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作了精辟的阐述。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因为只有大量地消灭敌人，才能有效地保存自己。”^③“保存自己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而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④所以，二者是对立的，又是互为依存的矛盾统一体，从战争目的，揭示战争的本质，加以科学的抽象，这正是哲学的范畴，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在

① 《毛泽东选集》第449页。

②③ 《毛泽东选集》第450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465页。

这个问题上他比前人的认识有了本质的、飞跃的不可缺少的发展。解放战争中这一思想更加系统化，十大军事原则中规定，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和夺取地方为主要目标，就是这一战争本质的具体体现。只要我军能够将敌人有生力量大量地歼灭了，就有可能恢复失地，并夺取新的地方。因敌我双方构成的战争主体，敌人的军队是作战对象的实质内容，而有生力量即有活力的武装着的人又是军队的实质内容。只有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就从根本上解除了敌人的武装，使其失去抵抗能力，最后取得战争的胜利。如在解放战争第一年歼灭国民党军 112 万人，战争的第三年歼灭敌人 305 万人，到整个解放战争结束时我军共歼敌 800 余万人，从而使蒋家王朝归于灭亡。这就是歼灭战的本质。

（二）歼灭战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

因为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歼灭战，每条都与实行歼灭战有关，从整体上说，十大军事原则就是一个完整的歼灭战思想体系，每一条都是达成歼灭战必不可少的内容。但就其主要的和直接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运动战是实行歼灭战的基本作战形式和基本条件。

毛泽东指出，运动战是歼灭战的基本形式和实现歼灭战的基本条件。因为只有在运动中，才能暴露敌人的弱点和内部矛盾，限制敌人的长处；也才能发挥我军的长处，便于我对各种战争条件的利用。毛泽东同志一贯提倡运动战的思想，解放战争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并作为主要作战形式在十大军事原则中明确提出，贯彻于解放战争的全过程。

2、集中优势兵力，是实行歼灭战的物质基础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是双方依靠自己的全部物质力量

和精神力量所进行的“以剑代笔的政治”^①。马克思主义明确指出，暴力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的胜利是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②。在十大军事原则中，对他提出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不仅更加强调，而且进一步的方法化、系统化。鲜明地体现了创造克敌制胜的物质基础的光辉思想。解放战争时期，在客观上要求歼灭的规模即量的规定性空前扩大，而且要求速决全歼。为此，毛泽东同志不是一般地提集中兵力，而是强调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一文中说，“在战役的部署方面，当着敌人使用许多个旅（或团）分几路向我军前进的时候，我军必须集中绝对优势的兵力，即集中六倍、或五倍、或四倍于敌的兵力、至少也要有三倍于敌的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敌军的一个旅（或团）。 ”^③十大军事原则第4条指出：“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④集中兵力的倍数反映了敌我之间的一种量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把集中兵力作了量的规定，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是集中兵力是歼灭战的第一要素。这样，使歼灭战概念从强调战役、战斗的敌我兵力对比关系，到强调绝对优势于敌的具体倍数关系，对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①：列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

②《毛泽东选集》第20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093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143页。

3. 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是达成歼灭战的主要战法。

集中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就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加上人的主观能动性，才能达成歼灭战。集中优势兵力这一物质基础，是指人和武器两个方面说的，马克思主义所说的战争物质基础，是人和物的辩证统一。恩格斯曾指出，

“形成作战方法，是两种物质因素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一种因素是人员，另一种因素是武器。”^① 列宁说：战争使人们懂得“占上风的是拥有高度技术装备、组织性、纪律性和头等机器的人。”^② 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战争的客观物质基础就是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也是把人和物都包括在内的。只有人和物的有机结合，才能构成战争的物质力量。四面包围敌人，是战术，是作战原则；是精神的东西，但不是物质的东西。四面包围敌人，是包围诸路进攻之敌的一路，或一路中的一部，以我之集中对敌之分散，造成局部上的绝对优势，以便各个歼灭敌人，才能形成变全局上的劣势为局部上的优势，也就增强了歼灭战的物质基础。

毛泽东同志说：“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③ 这就是说，集中优势兵力和包围迂回战术，二者是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集中兵力，是打歼灭战的根本保证和先决条件；采取包围迂回战术，是打歼灭战的基本作战方法。集中了优势兵力，又采取了包围迂回战术，我们就能始终保持战场上的优势和主动，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91页。

② 《列宁全集》第27卷第17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21页。

战而胜，再及其余，依次各个击破，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最后赢得战争的胜利。

4. 歼敌目标，要先打弱敌，后打强敌

十大军事原则第一条首先提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第二条又指出：“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这就明确规定了在歼灭敌目标的选择上，应“先打弱的，后打强的”。

在对敌作战中，虽然敌军内部是个有机的整体，但必定存在有内部力量分布的不平衡性，这就为我们选择歼敌目标创造了有利条件。即使一时无可乘之机，但还可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采取声东击西、主动等灵活机动的战术调动，引诱敌人，从中寻找可乘之隙。强弱是相对而言的，强弱是可以转化的，先吃弱敌，即好打又可将强敌转化为弱敌，因为敌军内部这个整体，是由各部分有机联系构成的，强弱相依存在，先消灭了弱敌，强敌亦变弱。先打弱敌便于我军形成优势，能够速战速决，再及其余，促进整个形势向有利我的方面转化，为歼灭强敌创造了条件。但不论是打弱敌或强敌，都应从弱处开刀，强中有弱处，弱中亦有更弱处。

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是一条完整的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原则。前者是为后者创造条件，后者是前者发展的必然趋势。没有前者，就不能够削弱敌人，壮大自己；没有后者，就不能够从根本上打败敌人。我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四节 战略进攻理论的提出和完成

战争运动全过程的思想

1936年12月发表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是毛泽东同志为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而写的。它是中国革命战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阐明了人民战争的发展规律和指导规律，给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奠定了理论基础。《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可以说是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第一部著作，不但有巨大的军事价值，而且有巨大的哲学价值，可以说是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唯物辩证法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军事哲学。据毛泽东同志说，本书只完成了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政治工作及其他问题，因为西安事变发生，没有工夫再写，就搁笔了。在战略防御一文中，毛泽东同志在论述积极防御战略方针中指出，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包举了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两个阶段，在防御时又包举了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毛泽东同志把战略进攻作为一个阶段是非常明确的，他指出：“反攻原则，是在敌人进攻时应用的。进攻原则，是在敌人防御时应用的。”^①虽然战略进攻同战略反攻都是以进攻手段消灭敌人，但它们分属不同的战略阶段，具有不同特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进攻，是从战略防御发展而来的，它通常与战略反攻相连接。

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主要作战形式是“围剿”反“围剿”的反复。毛泽东同志说：“在一次‘围剿’中，敌人以进攻反对红军的防御，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这是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00页。

‘围剿’战役的第一个阶段。敌人以防御反对红军的进攻，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这是反‘围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任何的‘围剿’，都是包括这两个阶段的，而且长期地反复的。”^①所谓红军以防御反对敌人的进攻，就是反“围剿”的第一段，也就是战略防御阶段。实际上反对一次“围剿”是一个战役，常常由大小数个以至数十个战斗组织而成。但从一块根据地来说，它是一个战争的全局，是战略问题。战略防御包括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打破敌人的“围剿”即完成了战略防御的任务。红军以进攻反对敌人的防御，即是战略进攻阶段。当粉碎敌人的“围剿”之后，在敌人处于防御态势时，红军为巩固扩大根据地，主动向敌人实施的进攻。但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进攻，同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进攻是两种不同规模和形式的战略进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战略进攻，是根据地在已将敌之进攻打破，而敌人新的进攻尚未到来时，红军向边缘地区实行攻势行动的小规模战略进攻，目的是巩固反“围剿”的胜利，扩大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则是全国规模的战略进攻，目的是歼灭敌军重兵集团，向全国进军，解放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我军持久战略的三个阶段中，在中后期由于有利我的国际条件的变化，敌人投降了我军才转入战略反攻，而且时间很短，因此，我军还未完成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战争就胜利结束了，没有战略进攻阶段。所以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进攻，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完整的战略进攻阶段，解放战争也是中国革命战争史上唯一的一场战争发展过程完整的战争。战略进攻的理论和实践完成战争运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77页。

理论的飞跃。毛泽东同志虽没有来得及系统地总结战略进攻的丰富经验而形成完整的理论著作，但是，通过学习他组织指挥战略进攻的实践以及有关的文电，仍然可以使我们领略到毛泽东关于战略进攻的光辉军事哲学思想。

一、关于适时转入战略进攻，促进战争历史转折的思想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就是要逐步实现革命力量由弱到强、由量变到质变的转化。由于实行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战略防御阶段，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造成了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但还必须将这种有利态势继续发展，促进战争历史的转折。因此，战争指导者应适时将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和进攻，为战略决战创造条件，最后彻底歼灭敌人。

人民解放战争经过一年作战，全国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敌军在遭到我大量歼灭后，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减少为370万人，其正规军由200万人减为150万余人；士气低落，战斗力大为削弱；敌在南线发动重点进攻，其主力深深陷在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遭到严重打击，脱不了身，连接两个战场的中间地区，经过我军豫北、晋南反攻后，战略协同更加困难，防御力量薄弱，这个两翼进攻中间防御哑铃形的态势，愈来愈不利，而战略纵深的中原，江南地区异常空虚；敌在政治上、经济上也陷入严重危机。我军由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余人，正规军达100万以上，并完全可以用于机动作战，装备也得到很大改善，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士气高涨，人民拥护，无后顾之忧。但战争深入到解放区里，解放区遭到破坏，损失很大，我军人力、物力资源日趋紧张。以上就是当时形势发展的主要特点。

蒋介石为了改变不利形势，于1947年7月4日发布了总动员令，在国民党统治区加紧镇压，并进一步搜刮人力、物力和乞求美援，企图依仗其军队数量上、装备上的暂时优势，维持重点进攻，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使我党我军不能持久作战，进而消灭我军，改变局面。

我党中央针对敌人这个毒辣的反革命计划，决心紧紧抓住整个战局的有利形势，我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以主力打到国民党的统治区，实行外线作战的方针。1947年9月1日，党中央发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全面阐述了我军战略进攻的方针，指出，“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灭敌人，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我军第二年作战的部分任务是：以一部兵力和广大部队继续在内线作战，歼灭内线敌人，收复失地”^①。

在中国革命战争中，我军第一次转入战略进攻，这是有关革命的全局变化，即达到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是一个伟大的历史事件。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是有自己的特色的，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通常是在战争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实施防御的一方粉碎了对方的进攻，迫使其转入战略防御之后才开始的。解放战争则打破了这个常规，是在敌人全面进攻虽被粉碎，但其军队的数量和装备仍优于我，且在集中主要兵力对我实施重点进攻的情况下，由战略反攻直接转入战略进攻的。采取这种敌进我进的方针，

^①《毛泽东选集》第1126页。

既有力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又使敌仓猝转入防御，来不及组织体系，这样对促进战争历史的转折，是具有重要作用的。这是毛泽东同志善于审时度势，灵活运用作战原则的典范。它闪耀着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光辉。

二、关于战略决战，实现战争力量根本转化的思想

战略决战是敌我双方使用主力决定战争胜负的作战。它是战略进攻的高潮，是夺取战争力量根本转化的手段。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进入第三年以后，毛泽东同志及时地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军队展开了战略决战。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历时142天，歼敌正规军144个师（旅），非正规军29个师，共154万余人。在这个期间，其他战场的人民解放军也都展开了进攻，歼灭了大量的敌人。在战争的头两年，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8个旅左右。到了这时，人民解放军每月平均歼灭敌军已是38个旅了。这三大战役，使国民党赖以发动反革命内战的精锐部队基本上归于消灭，大大地加速了解放战争全国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同志以其军事哲学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了战略决战中一系列重大关键问题，体现了毛泽东同志的战略决战思想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现从以下几个方面作简要阐述。

（一）及时地抓住决战时机，正确地确定决战方向

解放战争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由于人民解放军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到1948年6月敌我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更进一步地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从1946年7月的120万人增加到280多万人；国民党军队由430万人减少为365万人，其中用于第一线的只有170余万人。解放区面积已扩大到235

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面积的四分之一；人口增至1.68亿，占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此时，国民党军已被迫放弃“全面防御”的计划，而进行所谓“重点防御”，企图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和工事固守战略重点防线。敌人为了避免遭受歼灭，以精锐部队为核心，兵力靠拢，猬集一团，想使人民解放军“吃不掉，啃不烂”；同时，裁并“绥靖”区、扩大兵团、吞并杂牌军；裁减机关，以求增大机动兵力；并在国民党统治区大量抓丁，扩充二线部队，以便整顿和补充力量，进行垂死挣扎。

这个时候，人民解放军虽然在数量上还少于国民党军队，在装备上还低于国民党军队，但是，在两年多的内线和外线作战中，已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战斗力。人民解放军消灭了大量的敌人，缴获了大量的现代化武器，加强了自己的装备，建立了强大的炮兵和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在石家庄、四平、开封等战役中，取得了攻坚经验，不但能打运动战，而且能打阵地战。经过诉苦、三查和群众性练兵的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部队军政素质大大提高。在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的数量虽然还多于人民解放军，装备虽然还比人民解放军好，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所发动的反革命非正义战争，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极端腐朽性，国民党政权已经陷入摇摇欲坠的境地。国民党军队在人民解放军的大规模进攻面前，已无法摆脱战略上全面被动的地位。国民党军队的五大战略集团，即东北的卫立煌55万人，华北的傅作义60万人，华东的刘峙60万人，中原的白崇禧35万人，西北的胡宗南30万人，已被人民解放军分别牵制在五个战场上。互相间很难在战役上配合支援。在其战略后方，仅有36个

旅，计23万人，分别守着许多点线，也难以机动。

这种敌我力量对比的形势表明，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到来，为了继续大量地歼灭敌人，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人民解放军就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城市，必须同敌人的强大机动兵团作战。国民党1948年8月南京军事会议曾经议论过撤退东北，确保华中，坚持沈阳到10月底，以观时局发展，原则上不放弃沈阳，同时亦作撤退准备的作战指导计划。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是让敌人实现他们把现有兵力撤至关内或江南的计划，使我们失去时机，以增后患，还是在敌人还没有来得及决策逃跑之前，我们就当机立断，抓住大好时机，组织战略决战，各个歼灭敌人的强大战略集团呢？这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形势的科学分析，毅然决然地抓住了这个战略决战关键时机，先后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

毛泽东同志在紧紧地抓住决战时机的同时，又正确地选定了决战方向。当时全国各战场的形势虽然在不同程度上都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但敌人在战略上却企图尽量延长坚守东北几个孤立要点的时间，牵制我东北人民解放军，使我军不能入关作战；同时，敌人又准备把东北敌军撤至华中地区，加强华中防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我军受到华北、东北敌人的两大战略集团的夹击而陷于被动；如果我们把战略决战的方向首先指向华北战场，则会使东北敌人迅速撤退，而实现他们的战略收缩企图。因此，东北战场就成为全国战局发展的关键。当时东北战场的形势对我又特别有利。在敌军方面，孤

立分散，态势突出；地区狭小，补给困难；长春被围，无法解救；或撤或守，举棋未定。在我军方面：兵力优势，装备较好；广大地区，联成一片；土改完成，后方巩固；关内各区，均可支援。所以，将战略决战指向东北，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由于迅速而顺利地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就使全国战局急转直下，使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

（二）着眼特点，灵活制定作战方针

东北战场在辽沈战役开始前，敌军据守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我军进攻的方向应先指向哪里呢？从局部看，长春孤敌，为我久困，是东北战场的弱点，消灭该敌可解我后顾之忧。但敌人却企图以长春来牵制我军，掩护沈阳、锦州敌军改善态势，并且进行撤退的一切准备工作。我作战方向如首先指向长春，就会中敌人的诡计；而攻下长春，又会将沈阳、锦州的敌人迅速吓跑，影响战役和全国战局的发展。锦州的敌人兵力比长春多，周围亦有若干据点；攻锦州时，华北敌军可增援，敌人亦可由海上支援，若不能迅速攻下锦州，就会陷我军于被动地位。但是，锦州至山海关段上各点的敌军，孤立分散，攻歼取胜确有把握；在北宁线上作战，可吸引长春、沈阳敌军来援，有利于战役发展。锦州是东北敌军通向关内的咽喉，打下锦州这一战略要地，就等于关上了东北的大门，就能封闭蒋军于东北，实现就地各个歼灭的目的。基于上述分析，锦州才是东北敌军的真正弱点、致命弱点。因此，毛泽东同志制定了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此方针的关键是控制北宁线，首

先攻克锦州，进行“关门打狗”。

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敌人重兵密集，便于机动，增援迅速。若要攻歼其任何一部，必须首先挡得住敌人的援兵，才能赢得时间，保持主动。这是华东战场与其他战场截然不同的特点，也是影响战役胜败的关键。当时黄伯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南靠江淮、北面山东的陇海线上，是刘峙集团右翼劲旅。如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则使刘峙丧失一臂，并可吸引徐州敌人东援，在运动中歼其一部。因此，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①。在兵力的使用上，毛泽东同志采取了巧妙的部署，指示我军“要用一半以上兵力，牵制、阻击和歼敌一部，以对付丘李两兵团，才能达到歼灭黄伯韬兵团3个师的目的”^②。一般情况，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的目标上，毛泽东同志却在我有足够兵力及敌军兵力集中的情况下，采取了相反的方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灵活地运用了集中兵力的原则，因而顺利地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取得了歼灭黄伯韬兵团的胜利，为战役的尔后各阶段，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华北战场的国民党军，在我华北人民解放军的牵制和打击下，又受到了辽沈、淮海两大战役的震撼，已成惊弓之鸟。国民党军将主力配置平绥路东段和平津塘地区，以保持

^① 《毛泽东选集》第1245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246页。

其西窜或南逃之通道。因此，不使敌人西撤南逃就成为平津战役的关键。毛泽东要求平津战役“应采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将敌人分割包围在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五地，然后各个歼灭之。毛泽东同志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结束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配合华北人民解放军出其不意地对华北敌人实施战略包围，力求将敌全部就地歼灭。毛泽东同志在《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中指出：“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①。“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因此，在目前两个星期内一般应采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的办法”②。为了不使敌人逃跑，又着重指出：“尤其不可将张家口、新保安、南口诸敌都打掉，这将使南口以东诸敌迅速决策狂跑，此点务求你们体会”③。为着造成敌人的错觉，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的敌军南下，又令华东战场我军对杜聿明集团残部在两个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又令山东方面集中若干兵团控制要点，做好防止敌军向青岛逃跑的准备。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军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取得了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

（三）着眼发展，达成战争力量的根本转化

由于战争形式的发展，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完全改变了长期以来敌人战略围攻我军的情况。特别是当战略决战时机已成熟，敢不敢打我军从来没有打过的大仗，敢不敢攻克

① 《毛泽东选集》第12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257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257页。

敌人的大城市，敢不敢歼灭敌军的强大集团，已经成为我军当时战略决策的重大问题。毛泽东同志从最后消灭敌军主力，达成战争力量的根本转化，必须攻击敌人坚固设防的大、中城市，并与敌人强大机动兵团作战的情况出发，从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必须夺取政治、经济的中心城市的情况出发，把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歼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起来，把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结合起来，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密切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灵活运用“十大军事原则”指挥战略决战，得到完全的成功。如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是转变敌我优劣形势的根本战法。在三大战役中，我军采取对敌人实施战略包围的同时，进行了战役和战术上的分割与包围。在战略上将敌人分割在几个战场上，而在各个战场上又把敌人的强大集团肢解为若干孤立部分，集中优势兵力，逐次予以歼灭，以至迅速地消灭全部敌人。辽沈战役中，我军利用东北敌人分散孤立的态势，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歼灭了锦州的敌人，继而转用兵力各个歼灭了廖耀湘兵团等部。淮海战役中，我军首先割裂、阻止了敌人各兵团之间的联系，使其不能相互支援，集中主力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逐次转用兵力各个歼灭了黄维兵团和杜聿明集团。平津战役中，我军把敌人分割包围在平绥、平津线上的各点，逐次歼灭之。这是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和发展，使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全部歼灭敌人强大兵团密切地结合起来。

在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且

夺取了敌人占领的城市和地方。由于攻克锦州，不仅歼灭了敌人、解放该城及附近地区，而且迫使长春敌人的一部分起义，其余全部投降，解放了长春，并为全歼卫立煌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黄伯韬兵团被歼和黄维兵团被围，迫使徐州敌人弃城逃跑，解放了徐州，为全歼刘峙集团打下了基础。由于新保安、天津被攻克，歼灭了守敌，解放了两城，为全歼华北敌人打下了基础。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结果”，①“一切敌人守备坚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②这些原则的实际运用，使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和夺取城市与地方密切地结合起来。

三大战役中，我军不仅进行了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且进行了大规模的阵地战。辽沈战役，东北人民解放军以6个纵队的兵力在大量炮兵支援下，攻克了坚固设防的锦州。同时，在锦州以南的塔山地区，以近3个纵队的兵力，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敌人9个师在海、空军配合下的增援，在黑山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住了廖耀湘兵团12个师的增援。攻克锦州后，我军转用兵力，以8个纵队在运动中全歼廖耀湘兵团。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华东人民解放军以11个纵队，在运动中侧击、攻击、截击的方法，将西撤的黄伯韬兵团包围于徐州以东的碾庄圩附近地区，同时以强大的兵力在徐州以东地区，用阵地防御战阻止了丘清泉、李弥两个兵团共12个师的东援，将野战阵地防御中的黄伯韬兵团9个师全部歼灭。第二阶段，华东人民解放军6个纵队，以运动战将北援的黄

①《毛泽东选集》第1143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144页。

维兵团中途包围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附近地区，突破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黄维兵团全部歼灭。第三阶段，我华东人民解放军以10个纵队的兵力对由徐州突围的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平行追击，在运动中将敌人包围在永城东北的陈官庄地区。集中11个纵队彻底摧毁了敌人的坚固野战阵地，将杜集团14个师全部歼灭。淮海战役的三个阶段，都是以大规模的运动战开始，以大规模的阵地战结束。平津战役，东北人民解放军以6个纵队的兵力，在强大的炮兵支援下，攻克了由10个师13万重兵坚守的现代化设防的天津市。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①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已经把大规模的运动战和大规模的阵地战很好地结合起来了。

一切战争的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正是由于毛泽东同志根据战争形势的发展，进行了灵活的战略指导，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严格遵循和运用了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战略战术原则，因而使我们在三大战役中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三、关于战略追击，彻底消灭敌人的思想

战略追击，是对战略退却之敌的追击。它是战略进攻的继续，其性质属于进攻范畴。及时而坚决地实施战略追击，对彻底消灭敌人，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具有决定意义。

三大战役后，我军基本上歼灭了蒋介石赖以进行反革命内战的主力兵团，“整个国民党军在长江以北的战略上的

①《毛泽东选集》第1144页。

战线已经崩溃”。^①但是，国民党仍然占据着长江以南和西北、西南广大地区。在此形势下，国民党反动派集团一方面伪装和平，发出求和声明，一方面收集残部，布置长江防线，妄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依托长江天险，实行隔江而治，保住“半壁江山”，以便卷土重来。国民党军在上海至宜昌间沿长江布防，其总兵力为70万人，以汤恩伯集团担任湖口至上海段防御，白崇禧集团担任宜昌至九江段防御。另有舰艇133艘，飞机300余架，构成所谓陆海空联合防线，以守沪杭为重点，采取持久战方针，以待国际事变。毛泽东号召我党我军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当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后，我军即于当晚实施强渡长江，4月21日公布了毛泽东和朱德联名下达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勇敢前进，向全国进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②中共中央决定，以第2、3野战军全部100万人的兵力，分为东、中、西三个集团在长江下游实施渡江作战，直捣南京，夺取京沪杭，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前出浙赣线及赣北、闽北广大地区。另以第4野战军第12兵团及中原军区部队，在武汉正面牵制白崇禧集团，配合作战。我军保持重兵在宁沪地区，既可集中力量直捣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又可在渡江后有足够的力量，对付美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扰。

1949年4月20日夜，人民解放军中集团首先在裕口至棕

①《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2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340页。

阳镇段发起进攻；21日，东、西集团同时发起进攻，顺利渡过了长江，22日，解放了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渡江战役至6月1日结束，粉碎了敌人的长江防线，解放了苏南、皖南、浙江、闽北、赣中等广大地区，并攻占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大城市，歼敌40万人，为我军继续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渡江战役后，国民党的残余军队，包括其正规军、地方部队和后方机关等都算在内，尚有150万人，盘踞在台湾及中南、西南和西北的若干省份内。美蒋对其在中国的失败是不甘心的，积极组织其退到中南、西南、西北及台湾等地的残余力量，企图负隅顽，等待时机，东山再起。同时封锁我沿海港口，轰炸我大城市，阻碍和破坏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①为了迅速彻底地歼灭敌人的残余势力，不给敌人以喘息机会，并防止帝国主义可能的干涉，中央军委指示继续向西北、西南、东南、华南等一切尚被敌人占领的地方进军，追歼敌人，解放全中国。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任务是：第3野战军除以主力位于京沪杭地区，准备对付帝国主义的入侵，以有力兵团进军福建，完成解放华东大陆的任务，并建立攻取台湾的基础；第2野战军待沿海城市解放，美帝国主义出兵干涉的可能性减少时，即进军西南，在第18兵团的协同下，解放与经营川、黔、滇、康四省；第4野战军并指挥第2野战军第4兵团，歼灭中南地区残敌，解放中南全境，经营豫、鄂、湘、赣、粤、桂等省；第1野战军完成解放西北五省的任

①《毛主席诗词》：《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务：第20兵团开赴秦皇岛、塘沽地区布防，防止美帝登陆。

在我处绝对优势，敌处绝对劣势，革命即将在全国取得彻底胜利的形势下，敌人是尽量避免与我军作战的。根据这一新的形势和敌人的企图，中央军委指示：我军在消灭残余敌人的作战中，必须实行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的作战方针，只有首先断敌逃跑，才能彻底歼灭这些敌人。同时还要注意采取以政治解决的方式作为战斗解决的辅助方式，以避免伤亡和破坏，加速战争的进程。至1950年6月，全歼大陆上的残敌，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战略追击的最后胜利，即是战争运动过程的终结。它不仅标志着毛泽东战略进攻的理论和实施的伟大胜利，而且是毛泽东整个战争运动理论和实践的完善与成功。

毛泽东亲自组织指挥解放战争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取得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哲学思想为指南，全局在胸，善于依照战争情况（规律）的实际发展，把自己的注意重心，始终放在全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和行动。他通过对决战时机、决战方向、战役重点的正确选定，投下了战略进攻的每一着好棋。战略进攻实践经验的总结，就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完善与发展。

第五节 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 战略决策的光辉范例

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既反对战争不可知论，又反对战争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认为战争存在有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人们通过战争实践可以认识它和掌握它；又指出战争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客观条件的

变化而变化。我们研究和应用依据战争规律制定的作战指导的理论和原则，必须着眼其发展。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指挥员要成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智勇双全的将军”。做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但也不是高不可攀的，关键在于有一个虚心学习的态度，同时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重大战略决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一、被动中的主动

中原突围是解放战争的起点，关系全国战局。人民解放军中原部队突围是被逼的，但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突围部队的行动也是主动的。中原突围的胜利，不仅使中原部队摆脱了困境，化险为夷，而且从战略上配合了其他地区解放军的作战。

1946年6月，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全面发动内战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决定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扬言三到六个月消灭我军。为了实现这一企图，蒋介石以其全部正规军的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准备向我解放区展开全面进攻，计划首先消灭中原我军，然后攻占苏皖，再占华北。党中央根据敌人企图及敌我战略态势，其战略计划是：南线我军首先在内线主要以运动战歼灭敌人，打几个胜仗，取得经验后，山东、华东野战军主力出击津浦线徐浦段，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切断陇海线，出击豫东。中原军区部队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区牵制敌人，配合内线作战。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不断对我中原解放区实行蚕食和进攻，解放区大部分为国民党军队占领，我中原军区部队主力逐步转移至以宣化店为中心的地区集结。至6月下旬，国

国民党军以30万人的兵力，将5万余人的中原军区部队分割包围在纵横不足百里的狭小地区内。因此中原部队是国民党军进攻的首要目标，处境困难，十分被动。是株守抗击还是迅速突围呢？从《中原突围愈快愈好，生存第一，胜利第一》^①的几个电报中可以看出，中原部队突围是党中央战略计划的重要部分。6月1日至7月15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央起草的指示中原军区部队突围的六份电报，可充分说明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原突围的战略决策思想。6月1日电报指出：“必须准备对付敌人袭击及突围作战，预拟突围后集中行动及分散行动两个计划”。6月19日电报指出：“宁周恩来电称，蒋决定大打，你处须随时注意敌情，准备突围”。6月21日中原局致电中共中央决定实施主力突围，请复示。6月23日复电指出：“二十一日电悉。所见甚是，同意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7月13日电报指出：“我中原军之任务，是以机动灵活之行动，在鄂、豫、皖、川、陕广大地域内，在外线牵制反动派大量军队，帮助我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在中原部队胜利突围后，毛泽东同志在7月15日的电报中高度评价了中原突围后的重大作用，指出：“你们这一行动已调动程潜、刘峙、胡宗南三部力量，给反动派以极大震动与困难。故你们的行动关系全局甚大”。这个电报的最后指出：“西安息，一战区政治部主任顾希平，警备司令赵才标在宴会上说：李先念之企图系占据陕南，控制关中，响应陕北，进展甚速，威胁甚大，国军预计在两礼拜内进攻陕北，现已被破坏等语，足见你们对大局帮助之大”。毛泽东同志引用敌人的反映进一步说明中原突

^①《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280~283页。

围帮助全局的重大作用。

中原突围，是在国民党军即将发起全面进攻之关键时刻，党中央毛主席从战争全局出发，正确地处理了全局与局部，失地与保存军力的辩证关系，被动化为主动，在战略决策上投下的一着好棋。中原突围拉了解放战争的序幕，调动了武汉的程潜、郑州的刘峙、潼关以西的胡宗南共32个旅。从而使我华北、华中主力渡过了敌人进攻最困难的时期，起了极大的战略作用。是毛泽东战略决策思想的伟大胜利。

二、打敌要害，弱处开刀；周密部署，密切协同

1947年7、8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这一行动，是毛泽东同志战略进攻的英明决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科学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一个光辉的发展。毛泽东同志以唯物辩证的观点洞察全局，高屋建瓴，在指导解放战争中所表现的那种英明和伟大气魄，是史无前例的。

千里跃进大别山，毛泽东抓住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有利时机，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敌人的薄弱地区和要害部位，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着眼战争全局，它同东北、华北、西北、华东等战略区的反攻和进攻相配合，形成了对敌人的全国规模的巨大攻势。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为外线作战，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扭转了整个战争形势，为夺取全国性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为了实现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战略计划，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周密战略部署：以晋冀鲁豫野战军

主力强渡黄河，在鲁西南地区大量歼灭敌人，配合华东野战军粉碎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尔后跃进大别山，在鄂豫皖实施战略展开；以晋冀鲁豫野战军陈（赓）谢（富治）集团为右后一军，在晋西渡过黄河，挺进豫陕鄂，配合西北野战军粉碎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豫西、陕南、鄂西实行战略展开；华东野战军主力，由陈毅、粟裕率领为左后一军，在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后，首先在鲁西南地区牵制敌人，掩护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向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尔后挺进豫皖苏，实行战略展开。三支大军在江、淮、河、汉之间，布成“品”字形阵势，互为犄角，密切协同，机动歼敌。同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调动进攻陕北之胡宗南集团北上，以华北野战军一部在胶东积极钳制敌人，其主要目的是配合南线我军主力的战略进攻行动。

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在刘伯承、邓小平同志的正确指挥下，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深深地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前途。陈谢集团、华东野战军主力都按计划挺进豫陕鄂、豫皖苏并开辟了根据地，站稳了脚根，完成了战略展开。我中原三军互相配合，机动作战，共歼敌19万人，解放县城100余座，在4500万人口的江淮河汉广大地区建立了中原根据地。此后，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军区部队继续坚持大别山根据地的斗争，及时将主力转出大别山，同华东野战军和陈谢集团会师，实行大规模的机动作战，纵横驰骋，扫荡中原，使逐鹿中原的斗争跨进一个新的阶段。

这种以围绕跃进大别山为主要目标的战略行动，实行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部署，战略上的有机配合，行动上的密

切协同，实为战略英明决策的楷模。

三、全局在胸，统筹兼顾

三大战役所取得的伟大战略决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的结晶。毛泽东同志在组织、指挥三大战役中，全局在胸，统筹兼顾，正确地处理了全局与局部，强与弱的辩证关系；着眼特点，着眼发展，灵活运用原则；根据全国各战场的具体情况，抓住了不同的关键问题，正确地确定了决战方向，制定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这样，使三大战役之间和各战役的各阶段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一环扣一环地，一个胜利接一个胜利地向前发展，取得了战略决战的伟大胜利。

毛泽东同志统观战争全局，将决战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的卫立煌集团，这就将战略决战的初战胜利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东北战场，敌我兵力对比，我居优势，锦州是东北敌军的弱点，而且是致命弱点。歼灭了东北敌军，就能粉碎敌人战略收缩的企图；就能实施战略机动，有利于华北、华东战场的作战；就能以东北的工业支援全国战争，使人民解放军获得战略的总后方。这样，决战首先从局部的优势开始，进而争取全局上的更大优势。这是毛泽东同志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好棋子。正当辽沈战役方兴未艾之时，毛泽东同志在华东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济南战役胜利之后，又组织了淮海战役。这是以歼灭华东战场刘峙集团为主要目标，进攻矛头指向国民党腹地的战略部署。华东战场敌人刘峙集团，以重兵猬集于徐州附近地区，形成所谓一点两线的部署，企图阻止我军南下，以屏障南京。淮海战役的胜

利，使国民党反动政府的首都——南京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从此，国民党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恰当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毛泽东同志又组织了平津战役。华北敌军是国民党在战略上唯一可能机动的兵力，因此，蒋介石一方面企图利用这个集团阻止我军南下，以便掩护他们在江南重整军力；一方面又企图诱使这个集团经塘沽海运江南，增援华东战场，以解刘峙集团之围或扼守长江，进行垂死挣扎。所以迅速完成对华北敌军的战略包围，将国民党主力分别消灭在东北、华北、华东三个战场上，也是全局战略部署中的重要一环。毛泽东同志利用华北敌军认为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进行休整，不能迅速入关的错觉，令东北人民解放军于辽沈战役后不进行休整，迅速秘密入关。采取了“围而不打”和“隔而不围”的作战方针，并对华东战场上的杜聿明集团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这样，就稳住了敌人，完成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使华北敌军完全陷入收不拢、逃无路之绝境。“兵贵神速”和“出敌不意”的军事原则，为一般军事家所熟知，但毛泽东同志运用之妙，却超乎寻常。这更表现了毛泽东同志军事指挥上的高超艺术，而为一般军事家所望尘莫及。

四、慎重初战，掌握关键

毛泽东同志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说重要，说有决定意义，不能按照一般的或抽象的情况去规定，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去规定”。①抓住了最重要的，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其它一切问题就迎刃而

①《毛泽东选集》第160页。

解了。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在组织指挥三大战役中，又给我们作出了榜样。在组织作战中，初战问题就是最重要的问题。从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出发决定初战，初战的胜负又对战争的全局和战役的全局的胜负有决定意义。这就是两者的辩证关系。三大战役的辽沈战役，是战争全局的初战，辽沈战役的初战是打锦州，淮海战役的初战是歼灭黄伯韬兵团，平津战役的初战是攻克新保安和天津，都是从全局利益考虑决定的。三大战役的作战指挥，根据三个战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针，抓住影响全局的关键问题，都是初战与全战役计划的密切联系的体现。所以，初战必须建立在确有胜利把握的基础上，同时，初战的胜利又必须有利于全局的发展，这是照顾局部和全局关系中最吃力的问题。总之，没有全局观念，就没有好的初战计划。正因为毛泽东同志处理好了初战与全局的关系，初战胜利后，就势如破竹地分别取得了三大战役的胜利。在战争指导中如何照顾局部与全局的关系，如何在复杂的情况中去找出和掌握关键问题，毛泽东同志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范例。

五、能动性在战争中

能动地认识客观存在的战争规律，又能动地运用这些规律于战争行动，这就是战争中人的“自觉的能动性”。客观存在的战争规律是人的自觉能动性的依据，正确的主观认识来自客观，客观决定主观。人的自觉的能动性，依靠对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反过来可以组织和使用客观物质力量进行战争，驾驭战争的发展变化，实现自己预定的作战目的。这是主观影响客观，反作用于客观。巧妙的指挥，能够以寡敌众，转弱为强，说明在一定条件下，精神力量又可发挥着决

定作用。战争是一场既斗力又斗智的极其激烈的较量。胜利总是由于正确的战争指导而得来的。从这一点说，战争就是敌对双方凭借既定物质条件而进行的一场智力竞赛，智高一筹者胜。毛泽东同志就是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充分发挥人在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的。而在三大战役中毛泽东同志这种“自觉的能动性”发挥得更为突出。决战阶段的斗争，是全战争或全战役中最激烈、最复杂、最变化多端的，也是最困难、最艰苦的，在指挥上说来，是最不容易的时节。毛泽东同志在三大战役中，不但对我军指挥自如，而且善于制造和扩大敌之弱点，使敌军完全听我调动，就我范围。例如：攻锦州的时候，我们估计沈阳的敌人可能出来援锦，而沈阳的敌人果然来援，结果取得了辽西的大胜利。又如：围歼黄伯韬和黄维兵团的时候，我军坚决阻击丘清泉、李弥、刘汝明、李延年等兵团的增援，敌军果然不能越“雷池”一步，结果使黄伯韬、黄维兵团全部被歼。再如：平津战役开始的时候，我们打算先稳住敌人，而华北敌人果然未能东逃西撤，结果全部被我解决。所有这一切，都是毛泽东同志智高敌人一筹而胜，这也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了“运筹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度。

第六章 建国后毛泽东军事哲学 思想的继续发展

第一节 建国后武装力量的建设及其规律

武装力量的建设及其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辩证法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毛泽东同志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军队建设理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建军路线，使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逐步发展壮大，从而取得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胜利，这是当时大家所熟知的。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是否还要加强武装力量建设，其规律是什么？这是许多同志所不清楚的。毛泽东同志预见到全国胜利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复杂性，及时警告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将成为对无产阶级的主要危险。对军队建设也会松劲，产生和平麻痹思想，认为全国胜利了，革命成功了，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安安稳稳地过舒服日子。针对上述情况，于1949年3月5日至13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①“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

^①《毛泽东选集》第1328页。

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对军队的建设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的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对于这一点不能有任何的误解和动摇。人民解放军又是一个工作队，特别是南方各地用北平方式或者绥远方式解决问题的时候是这样。随着战斗的逐步地减少，工作队的作用就增加了。有一种可能的情况，即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将要使人民解放军全部转化为工作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估计到。现在准备随军南下的五万三千个干部，对于不久将要被我们占领的极其广大的新地区来说，是很不够用的，我们必须准备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这样，干部就够用了，广大地区的工作就可以展开了。我们必须把二百一十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②。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③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又多次指示，为了保卫祖国，战胜侵略者，“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

这些指示，给建国后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是毛泽东建军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①《毛泽东选集》第1328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1316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6页。

一、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

(一) 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保证。

毛泽东同志说：“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①是指在有阶级存在的历史长河中，国家必须保存有强大的武装力量，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认为，战争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世界上只要存在有阶级，战争就不可避免。所以，为了保障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顺利进行，对内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对外要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必须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所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永远是一个战斗队。

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学说的观点认为，军队是国家政权的主要成份。谁想夺取国家政权，并想保持它，谁就应有强大的军队。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我国革命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夺取政权需要枪杆子，保卫政权，建设国家也需要枪杆子。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首先必须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因为国家政权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无产阶级建立了国家政权，就获得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强大工具。

我们国家建立什么性质的政权呢？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全国解放后，在彻底打碎蒋介石旧的反革命国家机器的基础上，毛泽东同志提出建立全国范围的无产阶级

^①《毛泽东选集》第1316页。

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就是对敌人实行暴力，任何一个专政，如果不直接凭借暴力，就不能实现，也就不能维持。反革命的专政是这样，革命的专政也是这样。什么是暴力？这就是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等。而军队又是专政的柱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常备军和警察是国家权力的主要强力工具，但是——难道可能不是这样吗？”。①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军队、警察、法庭等项国家机器，是阶级压迫阶级的工具。对于敌对的阶级，它是压迫的工具，它是暴力，并不是什么‘仁慈’的东西”，②所以，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保证。

（二）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工作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要求。

早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特别是现在，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③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起来》一文中说：“我们有打仗的军队，又有劳动的军队。打仗的军队，我们有八路军新四军；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我们有了这两支军队，我们的军队有了这两套本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17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1365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84页。

领，再加做群众工作一项本领，那末，我们就可以克服困难，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垮”。①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提出人民解放军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建国后，毛泽东又进一步强调说：“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②从而可以看出，在不同历史时期，毛泽东同志对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有不同的提法，但其本质是一致的，都反映了毛泽东的建军指导思想，这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建军问题上的具体运用和体现。

在建国前夕，提出把军队变为工作队是完全正确的，它适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要求。因为在解放初期，为了胜利地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适应革命形势的飞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干部到解放的广大新区工作，去大规模地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去接管广大乡村，以便迅速地建立革命政权，巩固和发展胜利。毛主席指出这个干部来源问题，主要依靠军队本身来解决。毛泽东同志在1949年2月写的《把军队变为工作队》一文中指出：“军队不但是一个战斗队，而且主要地是一个工作队”③。“我们现在正在准备五万三千个干部随军南下，但是这个数目很小。占领八九个省、占领几十个大城市所需的工作干部，数量极大，这主要依靠军队本身自己解决”④。所以，根据毛泽东的建军思想，把中国人民解放军建成既能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还能从事生产建设，成为一支举世无双的，战无不胜的英雄军

①《毛泽东选集》第882页。

②转引自1968年5月4日《解放军报》

③《毛泽东选集》第1295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1296页。

队，是史无前例的。

二、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认为，战争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的胜利是以战争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战争的客观物质基础就是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经济十分落后，我们接收国民党的是一个千孔百疮的烂摊子。1949年全国解放时，全国钢产量只有15.8万吨，原煤产量只有3242万吨，粮食2162亿斤，棉花889万担。这样，国家的财政收入就很少。另一方面，由于人民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又接收了国民党大量军政人员，所以，军政费用的开支相当大。因此，恢复国民经济是当时面临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同志早就指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①1950年6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召开了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根据毛泽东同志在会议上确定的党在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方针任务和战略策略，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只经过三年的时间，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52年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解放前最高水平的22%，其中，钢达到134.9千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46.2%，原煤达到6649万吨，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长7.4%，粮食和棉花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分别增长11.3%和53.6%。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的巩

^①《毛泽东选集》第1318页。

固，为我国进行大规模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了有利条件，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这是毛泽东同志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对立统一的规律，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种矛盾即十大关系。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上，毛泽东同志作了精辟地阐述和辩证的分析，提出了加强国防建设必须建立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基础上。

毛泽东同志说：“国防不可不要”①。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为了防御帝国主义和其它一切反动派的侵略，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建设，保卫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必须要加强国防建设。使我们的国防现代化，我们不仅要建立一支强大的陆军，而且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毛泽东同志说：“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②。怎样加强国防建设呢？毛泽东同志说：

“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③。就是国防建设必须是建立在经济建设提供大量的物质基础上。如坦克、飞机及先进的武器装备，必须有钢铁和先进的技术设备，这些只有靠发展经济建设才可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1页。

达到的。国防建设离开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你对原子弹是真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①毛泽东同志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的深刻论述，提出了正确的方针原则，是加速我国国防建设，实现国防现代化的重大战略决策。毛泽东同志正确地解决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辩证关系，是他军事哲学思想在武装力量建设上的新发展。

三、加强民兵建设是武装力量建设的重要内容

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我们赢得革命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同志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②“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发动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③“兵民是胜利之本”，^④“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⑤军民一体，天下无敌，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毛泽东历史唯物主义战争观的具体表述。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不论战争样式和作战对象有什么变化，不论是核战争或常规战争，不论武器技术装备有什么大的变化，毛泽东同志所指明的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是不会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72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932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122页。

④《毛泽东选集》第476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478页。

改变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指导下，赢得了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全国胜利后，我们是否还需坚持人民战争？答复是肯定的。如何坚持人民战争呢？我们不仅要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还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发挥我国人口众多的战略优势，把人民组织起来，共同筑成牢不可破的钢铁长城。建国后，毛泽东同志非常重视民兵建设，用民兵的形式把人民群众组织到人民战争的行列中来，实行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并对这种体制不断进行调整和加强，这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人民战争，实行人民战争的好方法。毛泽东同志在《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帝国主义如果竟敢发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那时我们就将实行全民皆兵，民兵就将配合人民解放军，并且随时补充人民解放军，彻底打败侵略者”。1958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对新华社记者的谈话中说：“帝国主义者如此欺负我们，这是需要认真对付的。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们寸步难行”。后来，毛泽东同志又要求民兵工作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这就是著名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的原则。所以，民兵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协助军队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中、历次自卫作战和边海防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林彪、“四人帮”出于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妄图把民兵从我国武装力量的体制中分裂出去，搞所谓“第二武装”，严重干扰和破坏了民兵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认真调整了民兵组织，缩小了民兵建制的范围，简化了民兵组织的层次，压缩了参加民兵组织的年龄，严格了民兵的政

治条件和身体条件，改革了民兵的训练方法。通过组织调整和训练改革，民兵队伍精干了，军政素质提高了，战备措施逐步落实，从而提高了民兵在现代化条件下人民战争中的战略地位和作用。新的《兵役法》规定，我军实行以义务兵役制为主体的义务兵与志愿兵相结合、民兵与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既坚持了我国传统的民兵制度，又恢复和健全了预备役制度，既有利于平时加强后方力量的建设，保持雄厚的预备兵员，更有利于战时快速动员，是实现平时少养兵，战争多出兵，做到寓兵于民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这又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新发展。

第二节 抗美援朝战争中毛泽东

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

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援助朝鲜人民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保卫祖国安全而进行的战争。

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百废待兴。正致力于医治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创伤，恢复经济，巩固政权，亟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而美帝国主义蓄意同中国人民为敌，竟将战火烧到中国人民头上。这场战争的主要对象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大工业强国的具有第一流技术装备的美国侵略军，它既握有制空权，又握有制海权，并掌握着原子弹。它所实施的完全是现代化陆海空军联合作战，并声称要使用原子弹，进行恫吓。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战争初期既无空军，又无海军，后来虽然有了少量的空军，但只能掩护主要交通运输线，还不能直接配

合地面部队作战。陆军装备也相当落后，部队机动基本靠徒步进行。

面对上述情况，怎么办？敢不敢出兵朝鲜进行作战，能否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家安危的重大决策问题，党中央毛主席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形势，正确处理了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的辩证关系，毅然决定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战争。

一、抗美援朝战争的特点及其规律

朝鲜，位于亚洲东部的朝鲜半岛上，1910年8月，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沦为日本的殖民地。1945年8月8日，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对日宣战。14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为划分对日本占领地区受降范围，经苏、美协议，在朝鲜，以北纬38度线为界，8月下旬，苏军解放了三八线以北全部地区；9月下旬，美军分别在仁川、釜山登陆，占领了三八线以南地区。这样，南北朝鲜成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整个朝鲜南北长约1000多公里，东西蜂腰部约200公里，东北高原，西南平原，且多河流。

抗美援朝战争同国内战争比较，有以下三个显著的不同特点。一、作战区域是个狭长半岛，三面环海，回旋余地小，利于敌人的海、空军活动，而不利于我军的运动战，并对我后方造成严重威胁。二、武器装备敌优我劣，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拥有大量的航空兵、坦克兵和炮兵，握有制空、制海权，火力强，机动快；我军是以步兵为主，技术兵种很少，而且装备落后。三、后勤运输、供应困难。朝鲜城乡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极为困苦，我军所需

一切物资都要从我国运去。这些新特点，对我出国作战都是不利的，如何趋利避害，化被动为主动，成为战争指挥者面临的新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的战略决策，不是一帆风顺的，对是否出兵，战争的前途如何？是有截然不同的主张的。当美帝国主义扩大侵朝战争，对我国构成日趋严重的威胁的情况下，党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作战的主张。这一正确主张，却遭到了林彪和高岗的反对。他们认为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三倍、四倍于敌人的炮兵和装甲兵，就不可能顶住进攻的敌人。现在同美国打仗是“冒险”，是“引火烧身”、“惹祸上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否定了林彪、高岗的错误意见，以无产阶级的伟大气魄和胆略，高瞻远瞩，深刻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并从国际无产阶级整个利益和我国长远利益出发，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故毅然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出国作战。历史证明，这一战略决策是非常英明正确的。同一问题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结论和看法呢？这是从不同立场、观点去观察、分析战争，而所得出的截然不同结论。林彪等人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以见物不见人的形而上学观点看待战争，认为进行抗美援朝战争，我们没有强大的炮兵和装甲兵，顶不住敌人的进攻，是“引火烧身”，是“惹祸上门”。毛泽东等同志以无产阶级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去看战争，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这是何等的鲜明对比呀！

抗美援朝与保家卫国，是唇齿相依的关系，唇亡而齿

寒。美国侵略者发动朝鲜战争后，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向我国边境疯狂进攻，还出动飞机，侵犯我国领空，轰炸扫射我国人民，这已将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了。所以，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企图，不是以我们出兵与不出兵为转移的，不是“引火烧身”，而是火已烧身，不是“惹祸上门”，而是祸已临门。我们只有抗美援朝，才可保家卫国，要想保家卫国，必须抗美援朝，这就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辩证法。抗美援朝战争的规律是什么呢？我们能否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呢？毛泽东同志指出，“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在武器装备上的劣势给志愿军作战带来了很大困难。但是，美帝国主义进行的是非正义的侵略战争，失道寡助，在持久作战中，军队士气日趋低落，内部矛盾日益加剧；而中朝人民军队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内部团结，士气高昂，面对技术装备绝对优势之敌，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最后胜利是属于我们的。这就是抗美援朝战争运动规律的必然结果，这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战争观，也是毛泽东同志关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思想的运用和发展。

二、抗美援朝战争中积极防御战略思想的新发展

朝鲜战场的特殊情况，决定着战争的特殊形式。抗美援朝作战我军经历了两个阶段：1950年10月19日至1951年6月10日为第一阶段，即战略反攻阶段，战略方针是：“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的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1951年6月11日至1953年7月27日为第二阶段，即战略防御阶段，战略方针是：“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一）利用初战的突然性，争取先机之利

战略上的后发制人，是我党一贯坚持的原则。抗美援朝战争是在美国侵略者的战火殃及我国领土，中国人民忍无可忍，要求派遣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我们是正义之师，进行的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这是无可非议的。坚持战略的后发制人，利用初战的突然性，达成先机之利，这是毛泽东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高明之处，也是这场战争取得初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27日，美国宣布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继又纠集15个仆从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帜扩大了侵朝战争规模。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打的比较顺利，不到两个月时间，解放了南方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国土。9月15日，美军在仁川登陆，28日占领汉城，朝鲜人民军后方补给线被切断，迅速北撤。10月初，敌军越过三八线，北朝鲜处于危机之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仗，就是在朝鲜战局处于十分危机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我军人生地疏，又没有对美军作战的经验，原定作战计划是首先抢占平壤以北的龟城、泰川、德川、宁边一线，控制要点，构筑工事，组织防御，阻止敌人的进攻，稳定局势，取得经验，然后再相机消灭敌人。但我军入朝后，敌军前进的速度很快，我军已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的防御地区。此时，敌人尚未发现我军入朝，仍毫无顾忌地分兵冒进。彭德怀同志遵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精神，顺应新的情况，迅速改变计划，作出新的部署，以部分兵力钳制东线之敌，集中主力于西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进行战略反攻，利用初战的突然性，争取先机之利。战斗中，先打战斗力较弱的伪军，后打战斗力较强的美、英军，运用战役迂回分割包围敌人，使我

军一开始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经过12昼夜英勇顽强的战斗，歼灭敌军1.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赶回清川江以南。

（二）在特定条件下由战略反攻转入战略防御

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是首先进行战略防御，实行诱敌深入，在战役战斗上实施进攻，逐步转化敌我力量对比，然后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这就是积极防御。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一开始就是战略反攻，是否叫积极防御呢？志愿军的战略行动，要同敌人对北朝鲜大举进攻联系起来看，不要孤立地看。1950年10月初，敌人越过三八线进入北朝鲜，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到退却后期我军入朝参战，协同朝鲜人民军对进攻之敌转入战略反攻，这是完全符合毛泽东同志的战略理论的。这正是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

我军入朝参战后，第一次战役开始稳定了战局，掩护朝鲜人民军的休整；第二次战役初步扭转了战局，奠定了抗美援朝胜利的基础；第三次战役突破了三八线，解放了汉城；第四次战役进行机动防御，粉碎了敌人的全面进攻，取得了歼敌7.8万余人的巨大胜利；第五次战役粉碎了敌人企图向我侧后登陆，把战线推向平壤、元山一线，置我军于困境的阴谋。这五次战役构成了战略反攻阶段。五次战役后迫使敌转入战略防御，我军也转入了战略防御阶段。敌我双方都实行战略防御，我方也没有转入战略进攻，彻底歼灭敌人，最后以双方就地停战而告终。这些都是由朝鲜战争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因为将敌人赶回三八线以南之后，权衡敌我力量，我要彻底消灭美李伪军，解放南朝鲜，是力不从心，短期难以实现的；美帝国主义要想越过三八线，吞并北朝鲜，取得朝鲜

战争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三八线附近稳定下来，为配合朝鲜停战谈判，争取主动，双方又进行了较长时间的攻防战斗。

所以，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首先进行战略反攻，而后转入战略防御，最后通过谈判达成停战协议而结束战争，这又是毛泽东同志着眼特点，着眼发展，指导战争的光辉范例。毛泽东军事辩证法思想，就是对不同时间、地域和性质的战争，既要研究其共同的一般规律，又要着重研究其不同的特殊规律，这样才能对战争实施正确的指导，忽视其特点而套用一般战争规律或照搬别的战争经验，必然招致战争的失利甚至失败。所以，战争和战争规律的特殊性，表现在战争存在着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

（三）运动战的新特点，歼灭战的新发展

歼灭战是我军作战的基本方针，也是根本目的，运动战是作战形式，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是毛泽东十大军事原则主要内容，是作战目的与作战形式的统一，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我军在创造战机、捕捉战机、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方面，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如：诱敌深入，围城打援；声东击西；蘑菇战术等。抗美援朝战中，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还是必须坚持的，但是否可以照搬照用原来的经验呢？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指出，当着我们研究一般战争规律的时候，既要看到它对特殊战争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又不可把它绝对化，不可把一般看做即是个别，不能把一般战争规律硬往一切特殊的战争上套用，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当我们研究特殊战争规律的时候，既要看到

到它包含着一般战争规律，又不可任意把它普遍化，不可把个别看做是一般，不能把一些只适用特殊战争的具体经验到处搬，否则就会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抗美援朝战争与国内战争有不同的特点，前面已作过叙述，主要是侵朝美军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火力强，运动快，有制空权；作战地域是一个狭长半岛，三面环海，无回旋余地；后勤保障困难。这些特点就决定了志愿军进行运动战不可能象我国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踏步的进退和战役上的大迂回大包围；也不可能像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一样，一次歼敌几十万人的大歼灭战，而应实行战术上的小包围小迂回，小口小吃的办法歼灭敌人。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如第一次战役，我军曾企图歼灭美军2个师、英军1个旅及伪军4个师，结果，仅歼敌1.5万人，成建制大部歼灭的美军只有1个团。第二次战役，我军企图歼灭敌人六、七个师，结果，只歼敌3.6万余人，其中成建制全歼的美军只有1个团。虽然一度形成了包围敌人的有利态势，但后来敌人大部分突围逃走了。第五次战役，我军企图在第一阶段歼敌5个师（其中3个美军师），2个旅第二阶段歼敌6个师，结果，两个阶段只歼敌4.6万人，其中大部分歼灭的只有伪军1个师，美军团以上建制单位一个也没有。当时，我军曾分别包围营团规模的敌人十多股，但敌人在大量航空兵、炮兵、坦克兵的支援下，大部突围逃跑了。毛泽东同志总结了志愿军五次运动作战的经验，提出了实行战术小包围的理论和打歼灭战的方针。他于1951年5月26日指出：“历次战役证明我军战略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以达到任务。”“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在一次

作战中歼灭美、英、伪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营，也就够了”。

“还须经过几次战役才能完成小歼灭战阶段，达到大歼灭战阶段。”除此，志愿军在运动战中还充分发挥夜战、近战的特长，广泛采用渗透战术，分割包围敌军，速战速决。

（四）攻防结合的坑道战

抗美援朝战争进入相持状态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彭德怀同志指出：在大规模运动战中歼灭敌人的可能性减少了，我们必须准备持久战，要学会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这种阵地战的作战形式。在防御作战中应是积极防御，对每一阵地必须反复争夺；同时采取反击及小出击，歼灭敌人。但在防御作战中，在敌人大量的航空兵、炮兵、坦克兵的毁灭性的轰击下，能不能守得住，就成了对我军的新的严峻考验。为了有效地保存自己，杀伤敌人，火线上开展军事民主，大家出主意、想办法，开始在野战工事里挖“猫耳洞”掩体，后来逐步挖深，形成一条条互相连接的小型坑道。对此，领导发现后极为重视，并在全军推广。在统一的计划和要求下，全线掀起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经过全军指战员创造性的艰苦劳动，在200多公里的防御正面和东西海岸及其纵深地带，构筑了战斗坑道总长1250余公里，经过不断增加工事的强度，完善工事的结构，逐步形成了以坑道为主与野战工事相结合的支撑点式的完整的防御体系。这一宏伟的防御体系的形成，使我军的防御获得空前的稳定，使敌人的无数次进攻归于失败。志愿军部队依托坑道，守，能抗击敌人的进攻；攻，能向敌人实施反击。1952年8月，毛泽东同志指出：“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

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坑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们极大的杀伤。”①在1952年的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依托坑道工事，在两个加强连的阵地上，抗击敌人约6万多人。在飞机、坦克配合下的轮番攻击，激战43天，歼敌2.5万人，胜利地守住了阵地。我军还以坑道为依托，多次对防守坚固阵地的敌军进行攻坚战，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歼敌12万人和收复土地240平方公里的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9月12日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②

（五）阵地防御与有限目的的进攻

· 依托坑道进行阵地防御，以顽强抗击粉碎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还进行有限目的的进攻，二者有机结合，是战略防御阶段，进行积极防御的特点。所谓有限目的的进攻，就是适时进行战术和战役反击，采用“零敲牛皮糖”的办法，分散歼敌，积小胜为大胜。1952年9月到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全线举行了战术反击作战，对敌50个连排支撑点和个别营防御阵地进行进攻作战77次，打敌反扑作战480余次，歼敌2.7万余人。毛泽东同志总结这次作战经验时说，要“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02页。

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①。“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②。

第三节 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 是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在新的 历史条件下的成功运用和发展

全国解放后，我国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我们需要一个安定的国内形势和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就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战争的，但毛泽东同志一刻也未放松战争警惕。毛泽东同志在开国大典上庄严宣布：“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③。因为只要世界上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消灭，阶级还没有消灭，战争就不会消灭。为了有效地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毛泽东同志领导制定了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保卫祖国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仅是革命战争时期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继承，而且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成功运用和发展。

一、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和发展

建国后不久，发生了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战争。我国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在国内既要进行经济建设又要进行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为了节省军费开支，加强经济建设，1950年党中央对军队采取了减少数量、提高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0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70页。

③《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6页。

质量的方针，对部队进行了复员工作，并多次进行整编。从1949年至1959年陆续地建立了各军兵种机构和军队院校系统，建立了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体系，使我军走向了现代化的轨道。1956年的3月，在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彭德怀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针对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制定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规定主要作战形式是“以阵地的防御战与运动的进攻战相结合”。这一方针仍然是贯彻战争全局的方针，即：它要求在战争爆发之前，加强战争准备，采取积极防御措施，制止或推迟战争的爆发；战争一旦到来，采取持久的人民战争，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以积极的作战行动，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从而转入战略反攻，并发展为战略进攻，彻底打败敌人。1956年在全国实行了义务兵役制度。1958年在人民公社化的基础上，党中央号召实行“全民皆兵”，“大办民兵师”，此后又多次强调加强民兵建设工作，以强化人民战争的基础。

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上台主持军委工作，不久就批判了彭德怀同志主持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另外提出了一个所谓“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这个方针曾受过毛泽东同志的批评。六十年代初期，苏联赫鲁晓夫集团，推行大国沙文主义，妄图控制中国，并与1962年4、5月在我国新疆连续制造了暴乱事件。从此，引起了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警惕，要注意对苏联设防。1958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捷克；1969年发生了苏军入侵我国领土珍宝岛事件。对此，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曾做出了美帝、苏联共同进攻我国的准备。为了对付苏美两霸的侵略，1969年4月，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提出：“大打，我们主张让出点地方来”的方

针。毛泽东同志说这样“不仅有理，而且有利，好打，使它陷在人民包围之中间”。这就是要在积极防御战略思想指导下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

1972年2月，由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签署了中美上海公报，中美关系得到改善，后来中日关系也逐步得到改善。这时，苏联的霸权野心恶性发作，在我国边境陈兵百万，直接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在这种形势下，1974年2月，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其基本精神是：突出苏美两霸，强调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重点打击苏霸。根据这个基本思想，在1977年12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同志代表中央军委正式提出了以苏联为主要作战对象的“积极防御，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

二、新的积极防御战略方针，是着眼于未来反侵略战争客观实际的科学预见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军委在邓小平同志的主持下，根据国际和国内各种条件的发展变化，制定了新的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明确了一系列战略指导原则。这是毛泽东积极防御战略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一成功地运用和发展，是我军一次重大战略转变。

新的战略方针，同建国前历次战略方针相比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1、非常强调战争初期的战略地位。历次战争中，战争初期不是十分重要，而未来战争初期的地位作用大大提高了。苏军把从军事行动起，到达成当前的战略目标（歼灭对方战略第一梯队，夺取海、陆、空战略主动权）为止的这段时间叫战争初期。我们是从战争爆发，到完成战略掩护任务这段时间叫战争初期。苏军认为“战争初期是战争最重

要的阶段”，“是整个战争的发展和结局的基本决定性的时期”。同时，非常强调先发制人的突然袭击，认为“突然袭击是未来战争最有效的方式”，可以“起到战争初期短时间内达到主要的政治目的和战略目的”，“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决定条件”。所以，战争初期我们主要的战略任务：抗住敌人的战略突击；保存有生力量和战争潜力；制止敌人的长驱直入，赢得一定时间，掩护我军战略展开和国家转入战时体制，初步稳定战局。因此，战争初期非常重要，对我们是个严峻的考验。2、战争初期的主要作战形式是以坚守防御的阵地战为主，并且同运动战、游击战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战略指导上的一个重大变化。3、明确了战争初期在战略上不能实行“诱敌深入”。我们在过去的国内革命战争中，把“诱敌深入”作为弱军战胜强军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步骤，甚至有时把它作为战略全局的指导方针，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现在与从前的情况不同了，我们已经建成了统一的国家政权，又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有了很大一批家业；再之根据战争初期敌人作战特点和我们的战略任务，就决定了我们不能搞“诱敌深入”。这也是毛泽东战略思想的一个重大发展。

综合上述，可以清楚看出，毛泽东同志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按照战争的实际情况决定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方针，作战原则和作战形式；同时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地改变方针和战法。正如朱德同志1945年在《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中所说：“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什么时间地点打什么时间地点的仗”。这就是

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的用兵方法。

第四节 实现我国国防现代化建设中 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同志虽然与我们长辞了，但他的军事哲学思想与其他思想一样永放光辉。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的过程，是战争的主观指导与战争的客观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只要世界上存在战争，就必然会产生那种客观需要的战争指导规律。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所获得的成就虽是超乎前人，但并未穷尽和包容一切，它在新的战争过程面前将始终处于起点的位置。这个起点对于人们认识战争和指导战争是十分重要的。没有它，不可能有自觉的战争指导，也不会有今后更高形态的军事哲学。因此，必须把毛泽东同志已建立的军事哲学思想，作为新的起跑线，向更远的征途奋进！

一、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思想

如何看待战争与和平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当前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依据，战争与和平是相对的，和平中孕育着战争，战争可以保卫和争取和平。毛泽东同志对什么是战争，战争的规律与本质，以及我们对待战争的态度，都有明晰的论述，是我们认识、分析当今世界形势的起点。但长期以来，我国基本上处于平时时期，由于在没有战争或大规模战争的条件下，不能为新的军事哲学思想的产生直接提供实践的根据，人们的思想往往落后于客观实际，习惯于用以往的战争经验看待战争，指导国防建设。由于我们的认识没有跟上急剧变化的世界形势，一

个相当长的时期，我国过分强调世界大战的危险性，认为大战迫在眉睫，因而定下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略决策，使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长期在“临战状态”下进行，延缓了国防现代化的进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通过拨乱反正，使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以无产阶级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逐步扭转了对世界形势的看法，对当前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是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新发展。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的谈话中指出：“我们多年来一直强调战争的危险。但是现在我们的观点有点变。我们感到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同年5、6月间，他又指出：“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判断有个转变，也就是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认识有了变化，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邓小平同志在1985年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明确指出：“本世纪末大战打不起来，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但世界大战是可以推迟的，经过努力是可以避免的”。因此中央军委决定，要实行国防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利用平时时期，从根本上加强国防建设。决定减少军队员额100万，并对国防现代化建设制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方针、政策和措施。

为什么说世界大战可以推迟，经过努力可以避免呢？这是邓小平及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着眼于世界形势的特点得出的结论。制约世界大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第三世界的崛起等。但必须看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是制约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和平是怎样得来

的呢？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恩赐的，而主要是力量均衡的结果。苏美争霸是发生世界大战的根源，但又是制约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相互转化的辩证法。苏美为争霸世界，双方都要在军事上夺取优势，军备竞赛不可能停止。苏美争霸不停止，就存在爆发世界大战的祸根。竞争的结果，到目前为止，苏美军事力量是旗鼓相当，保持着均衡状态，因此，谁也不敢先下手。现在世界核武器的总当量为美国用于日本广岛那颗原子弹当量的350万倍，其中苏美两国占97%。就洲际导弹和核弹头拥有量来说，美国为1640枚和8086枚；苏联为2367枚和8830枚，都可毁灭对方好几次。因此，核武器的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改变着人们传统的战争观念。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要通过暴力达到用和平手段达不到的目的。帝国主义发动战争的本质是掠夺和占有。如果苏美发动世界核大战，不但达不到它的目的，反而使自己“同归于尽”。这样一来，核武器的发展，又成了制约世界大战的重要因素。和平与发展虽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但仍不能忽视“战争的危險是存在的。”因为当前世界和平是相对的，并不稳定，它是在苏美均势抗衡状态下的充满火药味的和平。世界战争虽然可能避免，但危險依然存在，局部战争仍不断发生。目前我国边境也不安宁，所以我们决不可放松警惕。我国国防建设指导思想战略性转变，并不是我军建军宗旨和历史任务的转变，而是为了加快我军“三化”建设。

二、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是辩证的统一

1981年6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一届六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同年9月19日，他代表

中央军委，提出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任务：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杨尚昆同志也明确指出：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化三化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缺一不可的，是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的。这些指示，对我军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他们所以强调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三位一体，是因为在三化建设中，革命化是基础，现代化是中心，正规化是条件，三者是辩证的统一，同时也是人与物的辩证统一。

为什么以现代化为中心呢？因为实现现代化是现代战争的客观需要。当前我军建设中的主要矛盾，是当代战争的高度现代化与我军现代化水平不高的矛盾。现代化水平不高，不仅是指武器装备问题，还包括人员素质、训练水平、编制体制、学术研究、军事理论等方面存在的问题。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军武器装备更新缓慢，编制体制不够合理，人员素质不高，学术研究落后于形势的发展。虽然经过近几年来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不论常规武器、尖锐武器，特别是在高技术方面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相当差距。现在又面临新技术革命的挑战，军事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这对我军建设是一场严峻的考验，如不奋起直追，将使我们继续保持落后状态。

现代化是个总概念。在不同国家及其不同历史时期，是各有其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与标准的。当前我军所要实现的现代化的内容，就是要把我军的武器装备、军人素质、部队编制体制、军事理论、军事科研等，达到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能与现代化战争需要相适应。这些内容，概括起来说就是人与物的现代化。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落后了要挨打。武器装备的发展应从未来战争的需要出发，未来战争可分为不

同层次，如世界性的核战争，中小规模的常规战争，高技术特殊局部战争等。我军也应有应付不同层次战争需要的武器装备。所以，既要从全局上规划整体国防现代化建设，从根本上加强国家战争实力，又要有武器装备发展的中、近期具体规划，以实现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与此相适应还必须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也可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技术水平的现代化，就是要造就一批能掌握和运用不同层次武器装备的各种人才。如既要有持枪操炮掌握常规武器的战士，又需有掌握尖锐武器的技术兵；既要有驾驶舰艇驰骋海洋的海军人才，又需有激战长空的空军人才，既要有现代化的战斗员，更要有现代化的指挥员，这些都是现代化武器装备发展的客观要求。二是军事思想现代化，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使毛泽东军事思想与现代化战争的实际相结合。科学预见和分析世界战略发展的趋势，建立新的军事理论和原则，研究如何坚持和进行现代条件下的人民战争，如何以劣势武器装备战胜武器装备优势的敌人。现代化的实现，不是人与物两个现代化的简单相加，而是人与物两个因素的互相渗透，相辅相承。

现代化离不开正规化。正规化是指与现代装备和现代战争特点相适应的军队管理诸方面的科学化和规范化。正规化是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又是现代化的保证。在我军历史上，军队建设的现代化和正规化任务，始终是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的。武器装备水平和作战形式的每一步发展，都必然提出一定程度的正规化要求。今天我军的正规化建设，就是要在“五统”、“四性”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向更高的水平发展，在武器装备、体制编制、人才培育、政治工作、作

战指挥、教育训练、后勤和技术保障、规章制度、作风纪律等诸方面管理的高标准和高效率，实现军队管理的科学化。所谓管理，无非是管人管物两个方面，通过管好人去管好物。物质条件越是现代化，对管理的要求越高。所以正规化建设，依然是人与物两个因素的辩证统一。

革命化是我军的优良传统，现代条件仍然需要依靠政治工作来促进各项工作的发展和保证我军的建设方向。革命化就是以进步的精神贯注于军队之中，激励广大官兵，在平时能积极完成训练等各项任务；在战时能发挥最大限度的战斗热情，夺取战斗的胜利。在军队现代化建设中，掌握现代军事科学技术同样需要坚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去保证。科学技术的发展不能代替人的主观能动性，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渗透到教育训练中去，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便能成为掌握科学技术的动力。在军事科研中，也必须有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指导，使我们科学地认识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根据现代战争的特点，研究探索符合战争实际的战略战术。武器装备的发展，将大大提高战斗的杀伤力、破坏性，使未来战争变得更加激烈、复杂、残酷，平时要教育干部战士养成英勇杀敌、孤胆作战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养成坚定、沉着、刚毅的气质，保持科学的头脑，战时才能不慌张、不动摇、不恐惧、不蛮干，保证战斗任务的完成。

建设军队是为了打仗。我军现代化建设的一切工作，都不能脱离“提高战斗力”这个总目标。战斗力是由人和物两个基本因素构成的。表现于战场上的战斗力，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靠平时工作点滴积累增长起来的。平时的建设工作做得越好，战场上的战斗力才能越强。所以，在现代化建设

中，在人和物两个因素中，孤立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都是片面的。然而，人与物这两个因素相较，人是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现代化更带有主导性和根本性。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去创造条件，增进和加速物的现代化，提高物的效能；而仅仅具有现代化的物的条件，却不会使人也自动地“化”起来。这就是我们的一切工作都必须以人为基点的道理所在。

除上所述，邓小平及中央军委领导同志，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军事哲学思想，辩证地处理了国防建设中其它一些重大问题。如根据毛泽东同志关于“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思想，把国防建设进一步纳入国家建设的总体规范化之中，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相适应。在集中力量进行国民经济建设的同时，应以适当的财力、人力，加强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把两者的发展关系辩证地统一起来；国防建设既要立足现实，又要面向未来；在军队建设诸任务，诸因素中应以现代化为中心；既要坚持我军优良传统，又要努力改革创新；等等。总之，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从1985年军委扩大会议后，军队在指挥体制、编制、教育训练、政治工作、后勤建设、国防科研、军事院校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重大成就。这些成绩，都是邓小平同志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精神、斗争经验和远见卓识，指导国防建设的结果。对毛泽东军事哲学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当前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的革命事业任重而道远。战争也没有排除于人类生活之外，我们面前革命战争的路程并没有走完，只有在集前人大成的毛泽东军事

哲学思想基础上继续探索，才有可能一步步地接近驾驭战争的自由王国，直至消灭一切战争。